

YANHUANGCHUNQIU

# 炎黄春秋

1993/3(总第12期)



赛珍珠的中国心

我因胡风蹲大狱

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

泸沽湖有个神秘的土司夫人

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邓小平说：要抓住机会



我因胡

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  
泸沽湖有个神秘的土司夫人  
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邓小平说：要抓住机会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锬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副部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印刷：国家统计局印刷厂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编：100802

封面设计：李科平 刘少波

· 专稿 ·

新春命笔 共著华章

——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春茶话会暨  
《中华文化通志》百志著者大会上的讲话

/萧克 ..... 2

· 春秋笔 ·

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靳树鹏 ..... 4

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

/杨闻宇 ..... 75

· 英杰谱 ·

邓小平说：  
要抓住机会

/曹士生 成 平 王界临 ..... 12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

/舒云 ..... 32

· 殒星篇 ·

我因胡风蹲大狱

/孙钮 ..... 24

· 人海浪 ·

梦回北大荒 /王正 ..... 62

· 轶闻录 ·

金门岛的秘密

/竹繁..... 79

泸沽湖有个神秘的土司夫人

/字心..... 83

陈香梅在初恋时

/杨耀健..... 71

· 他山石 ·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

美国人/张彦..... 56

赛珍珠的中国心

/刘宏伟..... 42

· 神州光 ·

来辉武与“红兜肚”

/荏苒 晓寒 方美..... 89

· 古今谈 ·

湘江战役中的白崇禧

/黄汉星..... 94

中国殡葬

/谭中英 夏玮..... 51

奕诉在晚清政坛三起三落

/杨益茂..... 40

· 时代风 ·

四访大邱庄/永革..... 37

· 古镜台 ·

老子故乡话老子/朱秀海... 68

· 文荟园 ·

紧箍中的回旋

——当代杂文史钩沉/蓝翎... 54

敬礼，伟大的奶奶们！

/候岱..... 23

努力办好刊物 适应新的形势

/本刊记者..... 70

本刊中南发行部在湖北成立

/邢耀章..... 22

· 下期要目 ·

- 开国第一重大行动
- 1938· 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
- 胡耀邦——中国人民的儿子
- 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下野之后
- 我和邓颖超的花之缘
- 多瑙河畔的中国“淘金者”
- 动乱中的动乱：偷传信息
- 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



尊敬的来宾，诸位顾问、理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去年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总结工作、畅叙友谊、展望未来；今天，我们在京顾问、理事又同来自全国各地热心于中华文化事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欢聚一堂，庆祝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新春开笔。我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1992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大大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宏伟目标鼓舞下，正在努力奔向繁荣富强。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会全体成员，同心协力，勤奋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编撰工作进展顺利，《炎黄春秋》杂志，已成为炎黄儿女喜读的刊物。炎黄文化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都获得新的进步。这一切，使我会弘扬炎黄文化的事业，在海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些成就是在大家献计献策、热情关怀、大力支持、积极参与之下取得的。我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 新春命笔

——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春茶话会暨

关于我会1992年的工作进展情况和1993年工作的安排已给大家送了书面报告。在这里我着重就《中华文化通志》谈几点意见。

中华民族创造了优秀的文化。在我们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华优秀文化的奇葩！中华民族文化，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区域广阔、丰富多彩的独特风格，为全球炎黄子孙所珍视与自豪，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为世界所瞩目，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扬其精华，去其糟粕，经过再创造，用来为我们的建设事业服务。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改革和开放事业正在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要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健康、更迅速，就要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发展规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和分析，这是中国国情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这一切，便不能科学地认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

编纂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正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起这样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推动我们的人民、干部，更积极、更自觉地去发掘和利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为祖国的四化大业服务。中国历史上

虽然编过《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等，这只是文献的汇集；名著《史记》、《资治通鉴》等，却侧重于政治历史，而较少注意到文化。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领域，也出版了一批丛书、词典和专著，而比较全面、系统地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的大著作尚未问世。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是，它上面也蒙有不少灰尘。今天，世人对于东方仍不时有一种神秘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总结、传播工作做得很不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更加绚丽多姿、生机勃勃地走向世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很需要一部全面、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著作。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在自己发展进程中，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也很有益处。

弘扬中华文化，还将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的沟通，有力地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研究总结中华文化，对于全球炎黄子孙了解中华，热爱中华，为中华巨龙腾飞，也将作出重要贡献。

由此可见，我们的工作是很很有意义的。我们编纂的这部著作将阐明中华文化由初创直至现代的历史沿革，阐明它所包含的各区域、民族的文化以及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它不仅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包括制度形态的

# 共著华章

《中华文化通志》百志著者大会上的讲话

· 萧克 ·



文化、物化形态的文化。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决定承担这个重任，组织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编纂这部著作。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包含十典百志预计将达三千万言的《中华文化通志》，这一宏大工程，现在终于正式开工了。

## 一

《中华文化通志》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系统总结的大工程，完成这项工程，我们已具备了四大有利条件。

首先，我们恭逢盛世。盛世修典，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党的十四大刚刚开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形势，使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人充满了信心。这为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

其次，经过四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较雄厚的资料基础和研究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海外研究中华文化的成果有更多的了解，对世界其他各大文化系统也加深了认识，我们有条件在更高的水平上对中华文化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我们组织了一支水平高、素质好、年富力强而又精干的作者队伍。这次我们引进竞争机制，公开招标，严格评审，确定了百志著

者，极大多数作者四五十岁，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在本领域都是颇有建树的专家；各典主编，更是当代著名学者。精兵强将，可以打好这一仗。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关领导和海内外有识之士对我们这项事业的有力支持。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要求重视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各界有识之士在经济上大力资助，为编撰《中华文化通志》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慨然承担了全书出版任务，保证准时、高质量出版这部著作。在这里，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这么大一个工程，还需要各界热心人士继续支持；需要各级领导对这项工程继续积极关心和爱护。

## 三

要使《中华文化通志》能孚众望，必须群策群力。我们提倡奉献精神。默默奉献是中国人民的美德，更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美德。为了编纂《中华文化通志》，我们给主编和各志作者都发了一笔经费，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需要大家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为了中华民族的事业，埋头苦干，甘于奉献，拿出最好的、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来。

为了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还应照协议办事。中国知识分子，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不轻言诺。

我们研究会和主编，主编和各位著者都签署了协议。定了的事，应该认真去办。我希望大家要有一种集体荣誉感。编撰《中华文化通志》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许多企业家共同的事业，是炎黄子孙都关注的事业，共襄义举，胞族同辉。我们的成果将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将要接受历史的检验，我们的工作要向人民负责，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历史负责。

我希望大家认真地研究国内外有关中国文化的科研成果，打破门户之见，全面吸收世界研究成果之精华来丰富自己，在尊敬和继承前辈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使《中华文化通志》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准。

最后，希望大家按照编委会通过的编写规范，在技术上把好关，为《中华文化通志》在1996年底前全部顺利出版而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质量是《中华文化通志》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事的同志，从一开始就要特别注重保证质量。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让我们大家以这句古语为训。

最后，在这新年伊始之际，我衷心地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中施展才华，同心协力，为弘扬中华文化，团结炎黄子孙，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更大的成绩。

敬祝大家万事顺遂，阖家欢乐，健康幸福！

1993年元月6日

# 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 靳树鹏 ·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在中国独领风骚，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连任五届总书记，后来被开除出党，接着成了中国“托派”首领，再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坐了4年多监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提前释放，辗转入川，贫病乡居，1942年5月27日病逝。

陈独秀发妻高大众生3男3女。随后又与高大众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结合，生1男1女。陈独秀还有14个孙儿孙女，7个外孙外孙女。

陈独秀的一生及其逝世后的岁月，中国大地苦历沧桑，对他个人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因时而异，抑扬不一，他的一些儿孙不能不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那么，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 两烈士英名长存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15年，陈独秀创办在中国开一代风气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兄弟俩来上海读书。当时延年17岁，乔年13岁，他们克承庭训，天资又高，读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国学很有根底，到上海后即入震旦大学，并在法国巡捕房同学法文。他们兄弟在上海受的是新式教育，其中就有陈独秀所主张的“兽性主义”。陈独秀对“兽性主义”的解释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



△陈独秀

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他提倡“兽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妖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状况。陈独秀不仅说说，而是在自己子女身上付诸实施。

陈延年兄弟，一面打工，一面读书，每月每人到亚东图书馆领取父亲规定的5元钱生活补贴，晚上就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常常啃冷烧饼喝自来水以解饥渴。

1919年深秋的一天夜里，北风大作，天气奇寒。当时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也学法文，法文班散课他走出来，只见昏暗的路灯下有一团

寒气向他袭来，走近一看是陈延年，潘赞化摸了摸他的肩，原来还穿着夹衣。

“延年，你不冷吗？”

陈延年拱手站立路旁说：“还可以。”

“走，到我家去，给你找一件棉衣。”“不需要。多谢潘叔叔！”

“听说你父亲因为五四学潮在北京被捕，你知道吗？”“听说了。”

“你怎么想的，不害怕吗？”“既做不怕，怕则不做。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危险乃意中之事。何怕之有？”

“如果同人援救无效，你如何想？”“中国失去一有学识之人，当然可惜！”

他们议论的是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亲自散发他们起草的反对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一事。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影响极大，震动全国。他这次被捕，经全国各方营救，监禁三个月后被保释。陈延年如此冷静谈论自己父亲被捕，不能不令人惊异。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吃住，感情上过不去的还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高君曼是延年、乔年的姨母，也是继母，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住在家里，与她自己生的两个孩子陈子美、陈鹤年一样。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

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何以非把自己的亲骨肉摒之门外呢？高君曼苦说多次也说服不了陈独秀，就找到潘赞化说：“望你以老朋友的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会好于我自己所生。”

她说着说着悲泣不止。潘赞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还是不同意，并说：“妇人之仁，徒贻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1919年底，陈延年、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春，他们兄弟与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1924年和1925年先后被派回国内工作。



▲青年时代的陈独秀（1904）



▲陈独秀于南京狱中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1937）

他们兄弟堪称是我党早期革命家中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们在法国一面做工一面读书。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老先生看到中国名流的孩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大发感慨说：“陈独秀的两个儿子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沾酱油吃！”陈氏兄弟确实是勤工俭学生中的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他们到莫斯科后，吃饭、穿衣、住房、理发、洗澡、洗衣都是学校供给，每月还发给少许零用钱，虽然开始时吃的是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勉强吃下去，三四天大便不通。陈延年却对人说：“我一生未曾过这样好

的生活。”陈延年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离开安庆老家之后。陈延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南方区委书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是革命的中心，许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任职，领着不薄的薪金，一些人身着军装，吃得起大菜。陈延年还是穿一身半旧的粗哔叽学生服，脚上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钉底翻毛皮鞋，卧房里只有一张木床，一条席子，一条粗毛毡，一条被子，黄色皮包当枕头，床下还有只小皮箱。他在广东工作三年，一直穿这套衣服，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领、袖破烂，油迹斑斑，同志们劝他做一套新衣服换一下，他只点头微笑。由于工作忙，饮食无定，有什么吃什么，他从不挑剔。他当时二十六七岁，有的女同志很羡慕他，有人对他提婚姻问题，他总是推说工作忙。

他们兄弟间的感情绝非一般兄弟可比。小时延年内向、沉静，性格倔强，与人落落寡合。乔年却活泼好动，他常常教同自己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唱戏，唱伍子胥过关时，先戴黑胡子后换上白胡子。唱完后他告诉小朋友，伍子胥过不去关，一夜之间愁白了胡子。到上海后，每月到亚东图书馆领取那5元钱。延年总是等在外面，乔年进屋到柜台去拿。乔年善于说故事，延年却很腼腆，只有同很熟的人才说笑。

陈氏兄弟最初相信无政府主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很有研究，对当时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均深恶痛绝。兄弟俩与其父也存芥蒂。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名重一时，可陈延年却对人说：“吾父亦不过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官何异？”言辞虽偏激，但也说明他们少时已能独立思考。兄弟俩对陈独秀在中国筹组中国共产党并不赞许，陈独秀

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和斗争也令他们反感。1920年秋，陈公培等人到法国，华法教育会派延年到码头来迎接，陈公培向延年出示陈独秀的介绍信时，他却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他们兄弟终于跳出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泥潭，走到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与父亲的隔阂也就消除了。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氏兄弟同时加入，延年还担任“少共”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出版《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他写的字规范秀美，使这个油印刊物竟能与铅印的媲美。延年回国后任中共南方区委书记，后到上海接替罗亦农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央将江浙区委改成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委后，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八七会议后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他们兄弟二人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延年任南方区委书记期间，使广东的党组织从几十人发展为几千名党员，并领导着近百万工农群众。1925年6月19日，在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延年



△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

亲自参加并指挥了6月23日在广州举行的10万群众的大示威。英帝国主义侦知我党在南方的领导人是陈延年，因延年脸有细微的疙瘩，就以麻子称之，并写成传奇小说对他大加诋毁。1927年6月，延年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逮捕，吴稚晖去电视贺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憨就逮，佩服之至。”可见反动派对延年畏之如虎，恨之入骨。乔年在中共北方区委工作时，亲自参加了1926年党所领导的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就在奋争的人群之中，胸膛上挨了军警一枪柄，被人扶走了。他们兄弟人生短暂，但都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延年于1927年7月4日，乔年于1928年6月6日，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两位先烈的弟弟陈松年家中有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元月份颁发

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道：“查陈延年、陈乔年两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之尊崇。”落款系手写的“主席毛泽东”，并钤有：“中央人民政府”大印。延年壮烈捐躯时29岁，还是个童男子。乔年壮烈捐躯时仅26岁，有子一岁，夭折。

## 陈松年历尽沧桑

陈松年是陈独秀第三子，与陈延年、陈乔年为同母所生。他的前半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老子革命，儿子遭殃。

陈松年生于1910年，小于两个哥哥十来岁，长于同父异母的弟弟陈鹤年三岁，当他呱呱落地时，陈独秀已与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后陈独秀再没有回过安庆，松年出世后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直到多年以后陈独秀被关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他去探视，父子才得以相见。陈松年没有像哥哥弟弟那样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读过书，仅在安徽大学肄业，但因家学渊源之故，他的文化修养也很高。松年3岁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任仇嗣冲为安徽都督，他曾大肆通缉搜捕陈独秀等人。当时陈独秀嗣父陈普凡刚去世，还停棺家中，安庆统领马连甲就带兵查抄了陈家，把陈普凡珍藏的字画抢去大半，声言要斩草除根，非抓住陈独秀的儿子不可。延



△北大学生在街头宣传



年、乔年从房上跳下逃走。松年太小，跌落在邻家澡盆里。陈家待人厚道，乐善好施，邻里关系非常融洽。邻家的夫人就势给松年洗澡，如同给自己儿子洗澡一样，才算掩护过去。陈独秀长子陈孟吉之子陈永年与陈延年年龄相仿，被误抓，坐了4年牢，还陪斩过，吓得精神失常。松年17岁时，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安庆的国民党党徒、地痞、流氓掘进陈独秀的家，要霸占这所宅第，后经陈独秀嗣母谢氏电请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出面说情才了事。可是，大哥、二哥死难的噩耗又相继向他袭来。松年23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攻占安庆，不得已由谢氏做主卖掉了“大洋房子”。松年又托乡下亲戚弄了9只小船把家中的财物运往乡下祠堂里，并封上了祠堂大门。日本人来后，还是撬开祠堂大门，两次洗劫，好东西都被抢光。抗日战争胜利后松年携妻儿回来时，仅用一只船装回几件家具。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被一位本家留下，1978年，松年又动员这位本家将其交给安庆市博物馆。

松年经历了一个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吓，几多愤懑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松年的祖母最担心死时不能由儿子抱头送终，为了克尽孝道，也为了避开日本人铁蹄的践踏，经陈独秀先后来信催促，松年乃携祖母、妻子和刚1岁的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从武汉乘船到重庆，辗转投奔陈独秀。可此时的陈独秀已穷困潦倒，事事靠朋友。松年却不得不接受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陈独秀刚从重庆搬到江津县时，曾被他的至交邓仲纯的夫人闭门谢客，后来陈独秀一家还是住进了邓仲纯开的延年医院后宅，但也

常有口舌之争。纷争之起，当然因素很多。如邓仲纯一家，他弟弟一家，还有陈独秀一家，三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主要是邓氏兄弟负担；再如大热的天，男人多赤背穿裤头，三家人在一起，也多有不便；但很大的因素还是邓仲纯夫人最看不惯陈独秀与潘兰珍这样的老夫少妻。后来陈松年到江津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工作，举家迁往江北，陈独秀与潘兰珍也迁到鹤山坪石墙院（即江津的五举乡石墙村）居住。陈独秀一生颇少“儿女情长”，此时却不同，他常把松年夫妇及两个孙女和一个侄孙找来团聚，这给他寂寞的晚年平添了不少欢乐。可儿孙们一来，潘兰珍就不高兴，有时当着众人面，就同陈独秀吵嘴。陈独秀为了不使大家不愉快，就辗转嘱咐松年夫妇尽量少去。陈独秀的嗣母终于得由陈独秀抱头送终。松年非常尊重父亲，也尊重潘兰珍，他称潘兰珍为母，他的儿辈则称为二奶奶。松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对陈独秀身后诸事，如各方致送的奠仪、手稿、书籍等，都尽量托付何之瑜操办处理。在清理陈独秀的遗物时，松年想留下父亲的两枚印章作纪念，也被潘兰珍所拒绝。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松年是苦水自吞，最能委

曲求全的。

松年遵父亲的遗嘱，于1947年在陈独秀友人帮助下，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营葬，怕国民党人士见到“陈独秀”三字捣乱，在陈独秀的棺木上标写的是其科举时的官名“陈乾生”。

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陈家也到了清寒之境，松年当过会计，教过书，后任窑厂技师。他们夫妇已有1男3女，一家6口，生活拮据，不得已把北京的房子也卖掉了。鉴于家境，他的长女陈长玮、次女陈长琦都曾提出不考大学。松年却支持自己的女儿上大学。松年夫人寡居光，也坚持要保住陈家世代书香。她说：“我就是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要供你们上学。”她说到做到，曾同小女儿去抬土、修路、糊火柴盒、绞手套等来贴补家用。她太辛劳了，患有多种疾病，过早去世。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时，曾对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有过功劳，如有后人应予照顾。此后政府每月给陈松年补助30元，帮助他们一家克服了临时困难。陈松年退休后，被选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又被选为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作者（右）和陈独秀长孙女陈传祥（左）合影  
中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任建刚

松年的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在一钢铁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因努力工作，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是工程师。次女陈长琦大学毕业后在一军工厂从事技术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儿子陈长琦大学毕业后，在一工科大学任教，现在是讲师。小女儿陈长璞因文化大革命没能上正规大学，但文辞秀丽，文字端庄古朴，现在安徽省某图书馆工作。

松年生于清末长于民初，经历了军阀混战，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也曾在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下举家逃难，兄弟捐躯，父亲祖母病丧，他的夫人也先他而去，更深深地感受了“陈独秀”三字给一家生活罩上的阴影和带来的欣慰。他历尽沧桑，深知人生的艰辛，当然也就能豁达乐观。他爱哼京剧，常到市工人文化宫自敲板鼓自演唱，还参加过市老干部合唱团的演出。他去世前不久，在医院里动手术时，还在病房里唱京剧。他终于活到80岁高龄。

虽属偶然，但也有趣：陈独秀的发妻高大众是霍丘县名门之女；陈松年的夫人窦珩光也是霍丘名门之女；陈松年的儿子陈长琦娶妻还是霍丘之女。

## 陈鹤年独居香港

陈鹤年是陈独秀4个儿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一位。

1991年8月，陈鹤年在大陆的长女，在北京某高等学校任教的陈祯祥，去香港探望父亲。

祯祥说：“爸，我今天陪您去看电影吧！”

陈鹤年老先生非常惊奇地说：“看电影？我三十年来不看电影了，为什么今天要去看电影呢？”

“这是一部大陆拍的片子，写的是我爷爷。”

“大陆过去都说你爷爷的坏话，拍的电影也是糟蹋他，有什么可看的？”

“这部电影不同，是新拍的，您还是去看看吧！”

鹤年经不住女儿的劝说，终于在祯祥的陪伴下，走进了在香港很出名的星光电影院。大概全世界的电影业都处于萧条阶段，这天算上鹤年父女全场只有7位观众，上映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片《开天辟地》。这是一部上下集的长片，放映时间近3个小时。可从影片开演，80高龄的鹤年老先生没有靠过一下椅背，聚精会神到极点，直到把影片全看完，看完之后他好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

究竟是什么这样强烈吸引着他呢？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了母亲的艺术形象，或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父亲没有被歪曲的艺术形象？还是影片使他想起了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代走过的火热坎坷的人生道路？最主要的大概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纠正过去宣传中“左”的偏颇的极大勇气吧？

陈鹤年终于说了话：“你爷爷不太像，丑了点，脸没有那么宽，鬓角还要高一些。你奶奶一点都不像，她比那个演员小巧秀气，也漂亮。她性格好，古诗词好，也很善良。”

鹤年生于1913年，他与比他大一岁的姐姐陈子美对陈独秀的感情也存在着某些芥蒂，这是因为在他们十来岁的时候，陈独秀同他们的生母分居，高君曼带着他们姐弟二人去了南京。

或者是高君曼的主张，或者是他们姐弟自己的主意，或者是友人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更重要的大概也因为生活不充裕，总之，他们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陈独秀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之一，即“职业主义”。他们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读，进了

职业学校，子美学的是妇女科，鹤年学的电讯。

鹤年学完电讯后又在扬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时转到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政法系，并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是预备党员。他积极参加了由党所领导的有数千学生参加的“12·9”爱国救亡运动，他就是在学生运动中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并同她恋爱结婚。许桂馨当时是民先队队员。陈鹤年刚读到大学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时他与许桂馨爱情的结晶，他们的长女祯祥诞生，所以他们夫妇未能像不少参加“12·9”运动的爱国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去了北京西山游击队。鹤年在西山负责收发电报并培养收发报人员，许桂馨则组织妇女做军用手套。1938年底，鹤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作编辑、记者并兼收发报，以“哲民”之名发表许多文章，后又回国到桂林，也是编报、教书、收发报。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全家又到香港，他进《星岛日报》工作，并定居香港。

鹤年后来升为译电室主任，工资提高了，又顶一层楼，开始办少年出版社，先出《学生文丛》月刊，是社会科学性的，后改为《青少年》月刊，1978年底改为《科学模型》月刊，内容也改为自然科学，该刊已到100期。这个刊物是个严肃的科普读物，不登广告，也没有一点花里胡哨的东西，在香港当然是赔本生意。

鹤年在香港40多年，对政治不予闻问，但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这从他办的刊物就可以看出来。1949年12月广州刚解放不久，他就把长女祯祥和次女祯荣送回祖国。1952年，他与夫人许桂馨商量后，决定由许桂馨带着他们的3个女儿和1个儿子回大陆定居，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大陆受教育，在

新中国长大成人。他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是30年没能再相聚首，他更没有想到，他在大陆的夫人和子女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

鹤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让他夫人和子女回大陆，可他自己何以没回大陆呢？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三十年代以前，斯大林在苏联清洗和镇压托派，躲在墨西哥城郊区考约阿康的托洛茨基本人亦未能幸免，中国也于1952年末把大陆的中国“托派”全部逮捕。陈独秀虽然在1937年出狱后，曾申明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对“托派”反对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非常不满，但他毕竟曾是中国“托派”的首领。所以，在建国之初，陈独秀还是政治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为了避开这个问题，可能是鹤年当初没回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鹤年也是可以回来的，可他至今未归来，那原因可能更复杂些。

鹤年除了在大陆的4个子女外，在香港还有6个子女。

## 陈鹤年在大陆的

### 子女噩梦醒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在北京读初中的陈祯祥刚13岁，她既未征得父母同意，也没有听从师友的劝阻，毅然报名参军，要去朝鲜前线，当然不能被批准。过了不到一个月，11月23日，她被接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此后她每年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五一”、“十一”庆祝游行，特别是1957年五一节的庆祝游行，更令她不能忘记。她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作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员，站在天安门东侧的华表下，热烈欢呼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细心聆听彭真同志

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整风决定。

五一节过后不久，祯祥读书的北京某大学学院党委召开动员大会，发动全院师生给党提意见。天真幼稚的祯祥同别人一样，在会上提了些学院图书资料少，新教师多，教学质量不高等意见。她万没有想到，很快就贴满了围剿她的大字报。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就是否定党的教育事业！”

“否定党的教育事业，就是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陈祯祥向党进攻是有阶级根源的！”

学院成立了陈祯祥专案组，班上党支部帮助她提高认识，大会促、小会帮。

“陈祯祥，你首先应该端正态度！”

“你与别人不一样，你祖父是陈独秀，如果党不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可你现在只好上这个学院，因此，你必然对党不满，对党怨恨！”

“陈祯祥，你必须承认事实，你是陈独秀的孙女，你父亲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祯祥惊呆了。她是陈独秀的孙女，父亲是在香港，这都是事实。但她连陈独秀是个什么模样也不知道。难道陈独秀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老子在香港，子女就不是好人？

这个“天生的右派”，最后当然被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

许桂馨女士在北京某职工医院任药剂师，已感到陈独秀问题对她有些压力，但万没想到陈独秀还牵连到他的孙辈子女。她为了使大

的另外3个子女不再遭到祯祥那样的厄运，毅然提出要和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离婚，与陈家断绝亲情。后经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于1958年批准协议离婚，规定陈鹤年每月给其子女60元生活费。

许桂馨虽然与陈鹤年脱离了夫妻关系，可她的子女仍然因陈独秀问题入不了团。她的三女儿陈祯庆1964年在北京某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为她批判陈独秀的材料写得少，迟迟不给分配工作，让她到植物园去劳动锻炼。为了表示彻底同陈独秀划清界限，全家又决定，由二女儿祯荣写信通知在香港的陈鹤年，每月60元的生活费也不要了。他们全家长长吐了一口气，以为彻底划清了界限，可以安生了。他们太天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照样受株连，全家无一人能幸免。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祯祥所在中学的造反派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陈祯祥是陈独秀的孙女，要她交出陈独秀的照片。

陈祯祥从来没有陈独秀的照片，也从没见过爷爷的照片，她第一次看见陈独秀的照片，还是13年后，在北京党史展览馆的大厅里，她同众人一样伫立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肖像前，只是她比别人更动感情，两眼湿润，激动万分，直到展览馆关门她才离去。

因为祯祥工作努力，教学质量好，曾受过校长的表扬，造反派就把她、她爱人和校长打成反党“三家村”，还在报纸上发表攻击污蔑她的文章。她至爱的丈夫竟被迫害致死。

她大妹祯荣被扣上为陈独秀翻案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定为“5·16”分子，关进学习班，拷打审问半年多。她小妹祯庆，因为买毛主

席像章时说6角钱一个太贵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批斗，在全区游斗。当时她是第一次怀孕临产，她和她丈夫及孩子的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至今留有严重的后遗症。祯祥的小弟祯祺，文化大革命开始刚18岁，他积极参加红卫兵，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孙子，被剥夺了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但他并不灰心泄气，写了血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结果被分配到内蒙古。他谨言慎行，吃苦耐劳，可还是不准他参加贫下中农会议。他难过得哭了，但仍然发奋努力，白天劳动，晚上加班，第一年就干了460个劳动日。但他怎样拼命劳动，刻苦努力也不行。他快满25周岁时，怕超过年龄，又最后一次写了入团申请书，仍未被理睬。1974年北京派人去内蒙古知识青年插队的县社招工、招考教师，尽管县社一致推荐陈祯祺，但招考的人却说，他这号人不适合当教师，也不适合回北京。到1976年时，与他同去插队的300多知识青年中，只有他一个人还是靠挣工分吃饭。他前后三次参加高考，都是因为陈独秀的孙子而不予录取。

陈鹤年在大陆的女儿终于噩梦醒来。1979年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怀下，北京市委组织部派人调查，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终于在1979年7月给陈祯祺一家落实了政策。现在，陈氏三姊妹都在北京工作，其中有两位是副教授。她们的弟弟陈祯祥已全家去香港，正在他父亲主办的《科学模型》月刊上连载他自己关于电子计算机的科普著作。

## 陈子美天涯何处？

陈独秀有4个女儿，除两个早殇外，长女陈玉莹只活到28岁，病逝上海。陈独秀的次女陈子美，乳

名“蟪子”（一种蜘蛛名），也作“喜子”，有时也写成“洗子”，她如果健在，今年刚好是80周岁。

原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已90多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知道陈子美，但从未见过她。郑老先生与子美的父亲陈独秀交谊很深，也见过陈独秀发妻高大众。他同鹤年只见过一面，同松年青年时和老年时都见过面，他同延年、乔年都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同时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一起去苏联，又差不多同时回国工作，可谓情同手足。但郑老先生对子美的人生经历却不详知。这大概因为子美的一生有些神秘，有些奇特，也有着太多的酸甜苦辣，才鲜为人知。郑老先生审阅此文初稿后，来信说：“我从你的文章第一次知道陈子美有子女留在国内已经长大成人，这样看来，陈子美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会设法与子女联系的呢！”可子美的一部分子女从1960年就与母亲失去联系。30多年过去，仍然没有接上这种联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天涯何处，也不知道她是死还是生。子美的长子张肇山1933年出生，1951年在上海念高中二年时参加军事干校，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习，他后来被人陷害，进了监狱，1960年病死于狱中。20多年后这起冤案才得以平反，组织上给了120元抚恤金，张肇山没有结婚，这笔钱应交给父母，可父亲已经故去，母亲又在何方？

子美生于1912年，在她十二三岁时，她的父母陈独秀与高君曼协议分居。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紧张阶段，陈独秀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子美很少能见到父亲。子美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张国祥相识、定亲、结婚时，高君曼已经病逝，她的婚事是由外婆（高君曼生母诞生氏夫人）做主定下来的。1932年10月15日夜，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

党中统特务逮捕，押往南京。子美曾带着她的“白马王子”张国祥到狱中去探望陈独秀。张国祥生于1902年，比子美大10岁，出身于菜农家庭，后来念书，此时正在银行和旅行社供职，家境不错。不知为什么，陈独秀对女儿的这桩婚事并不十分赞许，为此父女俩还在狱中争吵起来。子美的性格很像父亲，刚烈、倔强。此后，子美的行踪就很少有人知道，都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已死。后来笔者从可靠的渠道得知，子美并没死，被人用汽车轮胎偷渡到香港，又从香港去了加拿大。后来又得知她的医道很高明，在加拿大开的妇产科医院很受欢迎。又20多年过去，她如果健在亦是一幡然老嫗，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张国祥认识子美前已经结婚，但他对子美隐瞒了。1936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二女儿张树德诞生后，家庭经济拮据，子美始知丈夫已有妻室子女。子美对此不能容忍，于是张国祥与原配蔡氏离婚，但蔡氏离婚不离家。从此，他们的家庭生活笼罩上一层阴影。抗日战争爆发后，子美与张国祥已有2子3女，他们举家逃难到重庆。子美在重庆进一步学习深造妇产科。1939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他们全家差点遭难。他们一家匆忙逃离重庆时，未来得及从友人家领回刚两岁的三女儿张树范，从此失散。子美一家终于取道香港回到上海，不久子美与张国祥分居，她带着4个子女租房另过，这期间她的长女张树仪摔坏了右腿，子美更加怨恨张国祥。后来子美带着子女迁往南京下关居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子美终于和张国祥正式离婚，由于张国祥不愿意给抚养费，子美又养不起4个儿女，无可奈何，只得孤身离去。

子美也好，张国祥也好，都不

对子女谈他们的外祖父，他们的子女也不知道外祖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

子美后来认识了李照焕先生，并同他结婚，他们有了两个儿子李宝堃、李莹堃后，子美就做了绝育手术。

50年代初，子美和张国祥生的长子、长女张肇山、张树仪参军离开上海，在上海只有他们二女儿张树德。母子情是人间至情，子美找到了张树德，张树德也曾偷着去看母亲，被父亲知道后还挨了顿揍。1953年张树德初中毕业时要填履历表，父亲才告诉她外祖父是陈独秀。张树德念高中的三年是寄宿，这三年中她常偷着去看母亲，还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活和照看宝宝和毛毛（李宝堃、李莹堃乳名）。这期间张树德为了证实外祖父是否是陈独秀，曾问过母亲，结果受到了斥责。1956年张树德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大学，即将离开上海。这时陈子美才给他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外祖父陈独秀，另一张是她四舅夫妇（陈鹤年和许桂馨）及3个女儿的合影。陈子美指着照片上的陈祯祥对她说：“她和你年仿。”不久子美和李照焕全家迁居广州。1957年暑假，张树德曾到广州母亲处小住。可二三年后，她同母亲彻底失去了联系。

笔者只知道李照焕先生现居广州，对他本人或对他与陈子美生的两个儿子的近况都不确知。只听说子美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迫害，被游斗游街，丈夫照焕也被抓关牢，不然子美也不会冒险出走海外。

子美与张国祥的5个子女中，长子屈死狱中。三女儿在重庆失散，后来知道音讯时已病歿。其他3个：长女张树仪、次女张树德、次子张肇山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被人尊重的职业，其中两位是教授

学者，也有着美满家庭和自己的子女。

子美的丈夫、子女、弟弟及侄儿侄女，都可以去寻访她的下落，但这是很困难的，如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出面寻访，就方便些。子美是值得去寻访的，因为她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

## 陈独秀和子女间的感情世界

电影《开天辟地》中安排了一个情节：陈独秀悄悄去看自己的两个儿子，他看见陈延年、陈乔年小小年纪在拉大锯，很受感动，热泪盈眶，他把卖茶蛋的老太太的茶蛋全买了下来，叫老太太给儿子送过去，自己转身走开。编导者的心意是好的，但这并非事实。

尽管和子女们有某些隔膜，陈独秀是很爱自己的子女的，但不娇惯，更不溺爱。陈独秀在北大时，陈延年从上海来找他，照一般人看来，儿子见老子，跑到身边去就是了。陈延年却不同，先递上一张片子，写上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当时北大有人开玩笑说，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了。

陈独秀是不想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八旗子弟，是希望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自谋生路，自创生活。陈松年是会计为职业养家的，陈鹤年是靠收发电报的技术起家的，陈子美是靠妇产科自创生活的。

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大革命时期，以延年为代表的我党在广东的领导人赞成北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中央对北伐不积极，陈独秀还写过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广东方面除陈延年而外，没有一个人敢于直接反对陈独秀的主张，多是唯唯诺诺，只是陈延年敢于直接反对，敢于说对

总书记不满的话。1925年春，廖仲恺被刺后，延年来上海，但他找不到中央。俄国领事馆已通知中央，延年到上海几天了，于是大家恐慌起来，害怕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岸上谋害他。后来《国民日报》上登了一个小广告，是林木找马道甫的。林木是延年在法国时起的化名，马道甫是郑超麟在《响导》上写读者来信时用的假名。张伯简先看到这个广告，就去旅馆找到陈延年，把他送到郑超麟家。郑超麟就带着他去闸北中央秘书处见陈独秀。父子二人就在天井中坐下谈起来，似乎同陈独秀接见其他干部没有什么不同。郑超麟当时的感受是，父子二人见面的那种感情是很难形容的，他就避开了。如果说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也有偏爱的话，他最钟爱的就是延年和乔年，在他们兄弟身上寄托着他自己莫大期望。他常说，蒋介石杀害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陈氏兄弟壮烈捐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和感情，没见诸任何文字记载，也没听谁谈起过。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杨扣在西安时，陈独秀在狱中非常兴奋，叫人买来酒和菜，先祭奠大革命以来死难的烈士，然后他说：“延年啊，乔年啊！为父的为你们俩酌此一杯！”他说完将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从没有人见他如此痛哭过。陈独秀的子女也很爱他们的父亲。延年有一次从广东到上海来向中央汇报工作，可陈独秀却同中央失去联系好多天，大家以为陈独秀一定被秘密逮捕暗杀了。延年找到陈独秀老友汪孟邹，汪孟邹也不知其下落，延年当时就哭了。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鹤年去探望并告诉父亲，准备组织人劫狱救他出去，被陈独秀斥为胡闹。松年对父亲更是极为孝顺。

（责任编辑：刘家驹）



# 邓 小平说： 要抓住机会

曹士生  
成平  
王界临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1992年南巡讲话，如春风、春雨和春雷，吹遍、浇透和震动了中华大地。他的这个著名讲话，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又针对什么事说的呢？请看他在南巡中的重要一站——珠海，看到、听到和说了些什么？  
——编者

##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1992年，南海早春。小平同志视察过深圳经济特区，又风尘仆仆赶到珠海来了。

快艇在浩瀚无际的伶仃洋上划出了一道浪花飞溅的银练。

八年前的一切似乎再次重现。1984年1月29日，小平同志也是由深圳启程来珠海视察，也是横渡百里珠江口，走的是这条航线。

伶仃洋上，洪波连连，天水一色。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悲恨长歌，在这片大

洋上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伶仃洋上叹伶仃”，伶仃洋使人想起冷风恶浪，也使人想起风云变幻莫测的人生之旅。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舞台上，在失败、受挫后再度崛起的人物是有的，但多数失败者即便再起，也难重振雄风。

此时此刻，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再过伶仃洋，却有另一番感慨。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走过的曲折历史，小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地就跟上了。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搞掉了。”

邓榕坐在爸爸的身边，感慨地问爸爸：“您在历史上几次受‘左’的迫害呀？”

小平同志声音提高了：“三次啊！”他伸出三个手指在面前激动地晃着，接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珠海市委副书记黄静同志坐在小平同志的身边，仔细地聆听小平同志与谢非书记、梁广大市长的谈话。

小平同志愈讲思路愈清晰，他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窗外，海风骤起，伶仃洋后浪簇拥前浪，快艇在波涛翻滚中飞驰。

## 要抓住机会， 现在就是好机会

小平同志在梁广大的陪同下驱车浏览珠海市容。

“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座小桥，



一条小路，现在没有了，变了。”小平同志指着景山路昔日的白沙河桥说道。他在回忆8年前的珠海。

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小平同志又指了指窗外说：“我八四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他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实在令梁广大惊叹。

是啊！珠海变化太大了。8年间，珠海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多亿元，开发城区面积达60多平方公里。这里每一方寸土地都凝聚着开拓者的汗水心血，闪烁着建设者智慧的光环。

8年间，珠海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27倍！翻了近5番。这就是珠海工业发展的速度，这就是珠海开放改革的经济硕果，这就是珠海人民在特区建设中创造的奇迹。

汽车由凤凰路桥转入即将竣工的海湾大道。这条连接珠海香洲和唐家、金鼎等生活小区的纽带，全长10多公里，宽30多米，清一色的混凝土路面，沿途姹紫嫣红、郁郁葱葱，犹如青山绿水间的一条漂亮的彩虹。1984年小平同志来珠海时从唐家码头上岸，就是沿着这条路进入市区的。

小平同志指着一座座漂亮的村

民住宅，问道：“广东的农民收入有多少？”

“去年全省人均收入1100元，”省委书记谢非答道。

“我看不止这个数。”小平同志肯定地说。“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洋房，买不起这么好的、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正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小平同志马不停蹄在珠海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

小平同志的这番话引起了珠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共同。

紧紧抓住时机不放，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绝不松劲。这就是

珠海这8年来加快特区建设步伐的指导思想。

试办特区以来，国家用于珠海投资不到3000万元，而珠海累计向国家上缴各种税利超过50亿元。

去年，珠海市人均收入比1979年增长5倍至8倍，提前步入小康水平。

珠海人用自己的神奇般的美好现实，向世界证明小平同志倡导的试办特区，对外开放的决策英明。梁广大在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说：“珠海今天的一切都是靠你的英明决策。我们是按照您指引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走过来的。我们一定坚持把您的决策贯彻到底。”

小平同志听后笑着谦虚地说道：“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 中国应该每一年 每一天都有新东西

24日上午9时40分，一列车队奔驰而来，齐刷刷地停在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的大门前。

厂长迟斌元疾步上前紧紧握住小平同志的手说：“我们全厂职工盼着您来啊！我们能够有今天，是您指引的结果。”

小平同志微笑地摆摆手：“过奖了。”

随后，小平同志拿起装凝血酶的小药瓶，提出种种询问。

迟斌元过去是泌尿研究室主任，研究如何碎肾结石。他是个有创意的人，曾尝试过用化学的方法来溶解结石。国外有一种溶石的药物，虽然可以溶解结石，同时会造成肾盂出血。从资料上，他得知凝血酶有止血作用，他自己就使用过从人血和牛血中提炼出很粗的凝血酶。

小平同志对摆在桌上的凝血

酶，看得很认真，很仔细。迟斌元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现在这个厂生产的凝血酶，是种新的方法，从猪血中提取，成本降低了，效果很好，可以替代进口产品，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

谈到这里，迟斌元的内心没法平静。

想起当初作试验没有离心机，缺冷冻机……。牛血来源少，成本又贵，他才想到改作猪血提取凝血酶的试验。多少个寒暑，多少次试验，成功的路由一次次失败铺成。终于，他成功地从猪血中提取出了能达到医疗检测部门规定标准的凝血酶。

老迟是个倔犟的硬汉子，当初，他从西北跑到北京，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希望国家领导人能重视这个新项目。几番辗转，才在北京开展了小规模的生产。但是，仍然不理想，当一个朋友建议他到特区去看看，他终于踏上了那片充满希望的大地。

迟斌元告诉小平同志，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厂有一流的技术，已生产出达到国家标准的产品，代替了进口产品，创造了第一流的效益。

去年，这家工厂仅80人，完成了3000多万元的产值，人均创税利达12万元……

1987年底，迟斌元看准了在特区能尽快办企业，他户口没转，档案不要了，一个心眼扎在了珠海经济特区。

他外出办事，得自己掏腰包，工资发不出，就自己凑钱发。

1989年，贷款落实了，自己抓设计，自己负责厂房的安装，一个漂漂亮亮的生化制药厂立起来了，一共只用了600万元。

这年9月正式投产，经济效益一年一个新台阶。

当小平同志听说凝血酶已成功

地打入国际市场时，赞赏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侮的局面。

迟斌元50多岁了，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多年来埋头在凝血酶的研制和产品的推广上，今天听小平同志的一席讲话，心头更敞亮了。

接着，小平同志兴致很高地参观了生化制药厂的试验室，生产车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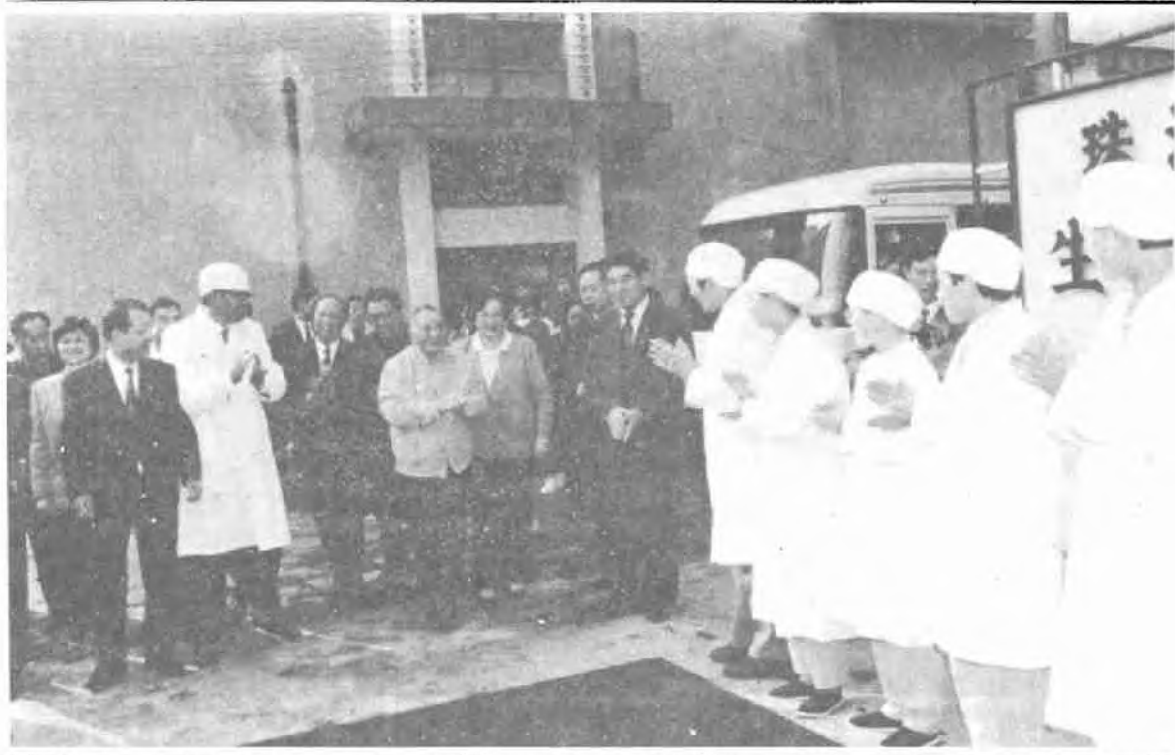
这儿是“一尘不染”的世界，窗明几净，工厂分成“十万级净区”、“百万级净区”，工人上班后必须沐浴、更衣，用药物泡手，经过风式消毒，才能走进“与世隔绝”的无菌区。

小平一行走过通道，工人们激动地向玻璃窗边涌去，用掌声和手势表达他们真诚的情意。小平同志激动地向玻璃窗内的工人们微笑着，频频鼓掌，招手。

走过一个车间的门口时，小平同志对陪同他的厂领导们说，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应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成果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一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十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种方法。

迟斌元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中国，这两个字此时此刻像烙进了心里。当事业发达了，成功了，个人的机会纷纷涌来。台湾的有识之士希望迟厂长到澳大利亚去办一个工厂，那儿牧场成片，牛群很多，台湾一方出资金，迟厂长出





技术。

报酬只要他开个价。

老迟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大陆目前还穷，我就该好好地改变这种现状出把力，应该留下来踏踏实实地做些工作。小平同志的教导使他觉得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拿出新的东西参与世界竞争。

在公司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牌子，字迹十分醒目：

**国家利益来自企业效益，  
企业效益来自员工努力，  
个人利益来自国家富强。**

效益、利益、国家富强三者关系由职工努力的红线串了起来，小平同志仔细地看这三句话，点点头：“很对！”

小平同志健步登上二楼，在二楼的拐弯处“不求虚名，只求实干”几个大字十分醒目，小平同志停下来，轻声念着标语牌上的字，然后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

## 要重奖有突出 贡献的科技人员

亚洲仿真公司女经理游景玉刚到上海，刚与合作者进行了第一轮谈判。电话由珠海打来，市领导通知她有领导人到公司来参观，催她必须立即飞回。她风风火火，由上海到广州，从广州连夜奔珠海，到了公司已是一半夜了。她猜到是谁来了。1月25日上午9时35分，一队车队缓缓而来，停在线条流畅、气宇轩昂的仿真大门前。“小平同志来啦！”小伙子们，姑娘们欣喜若狂地叫着，笑着，传递着信息。当小平同志走进大厅，科技人员们有礼貌地夹道欢迎，热烈的掌声，问候声不断，瞬间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小平同志炯炯的目光环视着这么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愉快地笑着：“祝贺，祝贺你们年轻人！”大厅布置得美观肃穆，游景玉总经理坐在小平

同志身边向他介绍亚洲仿真公司的情况。在世界上，仿真技术是七十年代才兴起的高科技技术，运用系统工程，采取模拟的方法解决航天、航海、军事、电站等复杂的行业训练人员的重大课题。

小平同志看着年轻的有着博士、硕士学历的工程师们，沉思地问游景玉：“‘科技是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吧？”

怎么回答呢？

在人类历史上，杰凯伊发明了飞梭。于是出现了手工业纺织业。

哈格汉斯偶然见妻子珍妮的纺车翻倒在地纺锭竖了起来，飞快转动，一个灵感产生了，设计出了八个纺锤的“珍妮”纺车，珍妮纺车开创了纺织工业。

瓦特改进了旧式蒸汽汽车，推动的是一个时代。

而以电的广泛运用为标志，产生了第二次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游景玉想到古往今来，科学就

是力量的现实,想到她出访日本、美国时看到信息时代,科技和发明给社会带来变化,尤其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的道路,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小平同志点点头:“就是靠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游景玉身旁围满了记者和人群,这个问题也是她多年来不仅思考而且希望用行动来解决的问题。她两次去美国,无论是走进豪华的超级市场,还是在小商品市场转转,手里拿起的净是些日本,南朝鲜,新加坡的货,连些小玩艺儿也很少见中国制造的。每每这时,她有一种压抑感,同时有一种冲动。她感到这些小商品,中国有能力做好,打入国际市场。中国更应该从科学的高峰上抓住主要的方面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才能腾飞,才能超越,才能改变第三世界的地位,才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民族之林。她看着小平同志,坦率而清晰地直抒胸臆:“我们的实践,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她的回答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魄、能力和自信。

小平同志宽慰地微笑着:“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他的论断在这位卓有成就的女科学家的实践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印证。

游景玉女士是第一次见小平同志,从见到的一刹那起,她觉得和这位伟人的心是那么相通,是那样亲近。她们带小平同志参观公司,小平同志一站起来,她像女儿一样情不自禁地去搀扶老人。

“你是留美的吗?”小平同志问道。

“我是代表我们国家去完成引进任务,在美国呆了比较长的时间。”

小平同志敏捷而风趣地说:“是培训。”

“我们公司还有不少人都是在美国经过不同的培训回来的。但是我们有个很坚定的意志,我们在中国一定会把高科技发展起来,……”游总这肺腑之言是有感而发的。

1982年,她随考察团到过美国、日本的五个高科技公司考察。出国前,她带去的是200个问题,回来时带回3200个答案。在引进仿真技术的学习中,她有一个梦,希望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仿真事业,而不是仅仅从美国买回昂贵的仿真机。

1985年,她到美国工作了两年,窗外是林立的摩天大厦和都市的喧嚣,她却每天学习16个小时以上,她要攻克的是全面的仿真技术。没房就租,18个人就是18棵青松,吃住,设计,开会挤在一起。没桌子,用装冰箱的纸盒替代,没有凳子,水桶上扣个洗脸盆,他们戏称:“水桶文化。”

真是没日没夜地干,为了节约出差费用,乘火车,买不到卧铺票,自己带个“小马扎”,打开在车厢中坐就是了。那时,18个人中有些坚持不下去了,走了,新的又来了。创业就有创业之艰难,苦也罢,累也罢,他们挺过来了!这一切就是要为中华民族争气。为中国知识分子争气。外国人能办到的。聪明勇敢的中国人也能办得到,他们要办的是我国第一家标准化、商品化、国际化、产业化的专业仿真公司。她告诉小平同志:“我们全公司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的干劲和全体职工的干劲都是为了发展高科技这一目的。而且在珠海这样一个好的环境下,深得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要把民族科技搞上去!”

小平同志说:“你们要带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

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小平同志问身边的游景玉:“你今年多大啦?”

“五十多一点。”

“噢,正是当年。”

来到机房,灯火通明。一台台330MW和200MW的模拟火电机组正在微机控制下进行工作。一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大型火力电站的控制室,机架上信号灯忽明忽灭,灿若晨星,屏幕上不时跳动着变化着的数字和图像。

看到现代化如此壮观的大生产场面,小平同志显得十分兴奋:“我相信你们能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带个头。”他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双眼充满对这一代人的期望。

游总详尽地向小平同志介绍亚洲仿真公司的历史,可以说,这个公司的发展速度是一个奇迹。公司于1988年8月在珠海诞生。1989年,公司的研制项目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建起了办公楼、现代化的机房和宿舍共6000多平方米。他们边设计,边制造,有六套大型电站全仿真机在设计、制造之中。游总指着20万千瓦和33万千瓦的电站仿真机告诉小平同志说:“我们全公司只有102人,第一年,人均产值达20多万元。”

小平敏捷而清晰地说:“重要的是水平。”

过去,中国没有仿真事业,而在电站,航天,军事,航海等高、精、尖的技术行业的训练上急需仿真技术。电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有锅炉发电、变电等方面组成,停一分钟机,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总不可能为给新学员学习应急情况而停机。那么,如何使新学员能学会排除故障,正确操作呢?必须有



一个身临其境的训练环境……仿真技术就是要运用系统工程，综合各种学科造成逼真的太空舱、宇航船、潜水艇、逼真的军事指挥系统和石油开采、轧钢、冶炼系统……用模拟的手法达到以假代真的目的。这就需在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方面，以及航天、航海……等分门别类的领域中拥有高级专业人才，共同制造出各种仿真机。

游总告诉小平同志，如今这两台制造好的火力电站仿真机正在测试阶段，不久，一台将卖给四川，一台卖给河南。这种仿真机过去从美国进口，一台600多美元，如今，我们按用户的要求来设计，同类机却只需五六百元人民币，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更重要的是亚洲仿真公司追踪美国九十年代的技术，在亚洲范围内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游景玉女士告诉小平同志，他们公司102人中80%以上是博士、硕士毕业研究生和高中级科研人员。

小平同志静静地点着头，看着

漂亮的工作场所，看着一台台电子计算机，看看一张张充满生气的脸，小平同志停住了脚似乎在想什么，感慨地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五十年代好得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是很幸福的。”

“我们是感到很幸福。”游景玉激动地说。

有什么可说的呢？当代知识分子真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力发展时期，别提“文革”时代了，那时知识分子被打成阶下囚，被称作“臭老九”，不被信任而被当作专政对象。和内地一些科研单位比，特区在机制改革方面又快走了一步，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情，为人尽其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小平同志沿着宽大的机房边走边看模拟火力发电机组，对女儿邓榕开玩笑说：“我是看新鲜，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就越高

兴。我高兴，人民高兴，中国这个国家高兴。”

小平同志在机房西边拐角处停了下来，那双为民族，为11亿人民而忧、而思的双眼充满了深情：“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我国各行各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可以干很多事。”小平同志的思路十分开阔，他兴致很高地探讨着仿真技术的运用，能否用于现代化的军事指挥系统？还有什么可开发的新领域？”

游总告诉他，仿真事业是一种系统工程，要搞好需要许多行业共同合作和支持。

小平同志由此谈到社会主义的好处，我们可以调动人力，可以规划集中人才，打开灭战，这个是资本主义办不到的。

见到这么多年轻的科学家，小平同志一直显得特别高兴，上了汽车，他依然谈锋甚健。他说，真高兴啊，我真高兴看到这群年轻科学家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

给他 100 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在这个公司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差不多就有 100 人，学历比当时高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

梁广大同志接过了话题：“您一贯重视科技人才。根据您的思想，我们准备在今年 3 月召开推动科技进步大会，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

邓榕兴奋地说：“要重奖科学家！”

小平同志伸出大拇指爽快地说：“我赞成。”小平同志说，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技工作者，都很怀念，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梁广大同志汇报说，去年已有不少在国外的科技人员要求来珠海工作。谢非同志也汇报说，广东省已制定了政策，允许留学生来，也允许留学生走。小平同志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事实上，回来的，绝大多数都学有所用，只要安排妥当，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是不会出去的。

## 只有人才，就可以 创造出新技术， 事业就兴旺

1 月 27 日，“江海”的员工一大早就来到厂里。他们把厂里每一个角落又清扫了一遍，员工俱乐部大厅早已精心布置了一番，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在热切地期待着小平同志的到来。

当小平同志从一辆中巴下车踏上江海厂区时，丁钦元匆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小平同志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是啊，来珠海 7 年多，丁钦元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如果说，当年老丁来珠海创业是小平同志亲自制定的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激励着他，那么历经风雨坎坷后的今天，他要向小平同志诉说的感慨实在太多太多了。

小平同志边走边微笑着向列队欢迎他的江海员工频频挥手致意。他问老丁：“你今年多大了？”丁钦元拘谨地回答：“六十了。”“还年轻嘛。”一句话逗得丁钦元和其他随从人员笑了起来，丁钦元突然觉得自在多了。

江海公司员工俱乐部墙上的每一面奖旗和奖状都有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它们是江海公司的荣誉，同时也是“江海”许多创业历程的缩影。小平同志坐在这里，十分认真地听着丁钦元在叙述“江海”的历史。

1984 年 7 月，江海公司从租用的旧石房开始了自己的特区建设事业。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江海”人意志，孕育出自觉、自立、自强的企业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江海公司在不到 8 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同行瞩目的奇迹。公司创建两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并还清了全部贷款，企业经营效益 7 年间增长近 30 倍。在国家经济秩序治理整顿的 3 年间，江海公司在全国电子行业普遍不景气的困境中，依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3 年公司产值增长连续翻番，去年达 3.5 亿元，出口创汇 2600 万美元。几年来，江海公司先后被评为省市模范集体、文明单位和省级先进企业，广东省企业管理优秀企业，并获得了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和对外经贸部联合颁发的“七五”期间机电产品出口先进集体等称号。

小平同志听了丁钦元的情况介绍十分高兴。他对老丁说，你讲得很好。特别不要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新月异、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你

们做的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全体职工。

不断创新是小平同志对“江海”人的深情嘱托，也是江海公司奇迹般崛起的重要法宝。1986 年，江海公司根据国内电子行业实际情况，审时度势，毅然决定产业结构大转型，放弃获利丰厚的组装收录机生产，转向开发机蕊。

如今，江海公司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机蕊生产企业之一，并具备了从设计、制造模具到总装生产等完整的录音机机蕊生产系统工艺，他们用 99% 的国产设备生产的机蕊，88% 出口海外市场。5 年来，江海公司每年有一新产品，当年开发，当年出效益。而挑起这一重任的大多是一些二、三十岁就能当师傅、担大梁、搞设计、搞开发、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的人，这就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江海人。

当小平步入车间门口时，全体员工起立，热烈鼓掌表达对小平同志的衷心爱戴之情。随后，大家就认真地开始自己工作。

小平同志在丁钦元的陪同下慢慢地从生产线旁走过，边走边认真地听着老丁对每道工序的介绍。丁钦元告诉小平同志，车间里的工人绝大部分是“打工妹”、“打工仔”。但在江海他们享有和其他职工一样的平等权利。为了让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意识到自己是企业主人，江海公司每年从他们中间评出 10% 至 20% 的优秀分子，给予“荣誉股票”和“金牌职工”的奖励。获“荣誉股票”的职工不仅每年可以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而且到退休后仍可享受待遇；“金牌职工”则既发牌，又发证书，如果犯了错误后还可以领回“金牌”。开展“荣誉股票”和“金牌职工”评选活动，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而且还推动了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江海

公司上下形成了比干劲，讲奉献的良好风尚。

小平同志对江海公司的这种探索十分赞赏。他充分肯定地说：“不是有人说姓‘资’姓‘社’吗？你们这个厂就是姓‘社’。”说着，小平同志转过身来对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说：“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顿时，周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

从总车间出来后，小平同志在丁钦元的陪同下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模具车间参观。在车间的宣传栏前，老丁对小平同志说：“我们对工人管理采用的是工艺示教方法，也就是无声教育。这里的照片有表扬的，也有批评的。凡是工艺操作规范的，我们就将半身照贴出来给予表扬；凡是工艺操作不规范的，就拍工人操作不规范动作的部位，不照面孔，贴出来给大家看，提醒大家注意改正。”小平同志听后，走近宣传栏，仔细看了看照片，笑了起来。

模具车间是江海公司的命脉，

也是江海公司的骄傲。这里的设备全部都是国产的，但开发出来的产品却能与日本著名公司的产品媲美。它是江海公司外向型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江海公司“自觉、自立、自强”企业精神的生动写照。6年前，50出头的查雁群偏不信邪，带着几个年轻人发誓要开发“江海”自己的产品，与国外一流产品比个高低。她就不信，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产品，中国人就造不出来？

在全国纺织工业界科技界出了名的查雁群，在成功之后沉寂了。几年后，突然杀向电子行业，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1966年，她研制出DS113型细纱锭子成为我国纺织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使细纺单产生产效率一下提高了1.5倍多。1978年，查雁群又使气流纺纱每千锭的断头下降75%。为此，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她科技进步奖。在那次大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小平同志，那激动的情景使她终生难忘。当改革、开放的春潮吹醒了古老神州大地，已年过半百的查雁群听从小平同志召

唤，来到珠海。

12年后，又一次见到小平同志，而且自己是作为主人接待来自远方的客人，查雁群激动之情实在是难以言表。她想对小平同志倾诉的感慨很多很多，然而，她什么都没说，她想让小平同志多看看江海公司：看看江海的员工是怎样坚决贯彻执行由他亲自制定改革、开放和试办特区的英明决策；看看江海人是怎样通过艰苦奋斗，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祖国无私地作出自己最大的奉献。

小平同志在参观江海公司后对梁广大说：“这个厂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因陋就简，很了不起，方向对，方法也对。看得出来，是从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要挖掘人才，你们做得对。要不断创造人才，一年365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

是一种什么动力使江海始终充满着犹如春天般的盎然生机？丁钦元工作了几十年的“娘家”无锡来



了位副市长，到江海公司走了一圈后，不由感慨万分。他说：“这简直不可想象。江海地方不算大，条件也不是太好，15个管理人员统率630名员工，一年创汇几千万美元，人均产值50多万元，太不可思议了。”

小平同志结束参观时，对身旁的丁钦元说：“这么多年轻人。我很高兴和年轻人在一起。”

江海公司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丁钦元说：“江海员工平均年龄才24岁，公司各个岗位，年轻人都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他们是江海的未来，也是江海的希望。”经营部1年要做3亿元生意，真正的业务人员就两名年轻人。江海公司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部才5个年轻人，一年开发几个产品。

而对这批朝气蓬勃的江海年轻人，小平同志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主动和大家合影之后，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拉拉手吧，拉拉手。”他和每个江海员工边握手边说：“谢谢你们。”

## 反对改革开放的人 让他去睡觉好了

芳园大厦像一座直刺青天的巨塔，巍然屹立在与澳门一箭之遥的拱北口岸。登上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环行一周，珠澳两地风光尽收眼底。1月25日上午，正在珠海视察的小平同志在谢非、梁广大等陪同下来到这里。

连日来马不停蹄的视察，并未使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感到倦意。深圳、珠海的神速变化令世人惊叹不已。珠江口东西两岸遥相呼应的这两座充满现代气息的特区城市奇迹般出现，使小平同志11年前提出的“杀出一条血路”的试办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成为中外瞩目的现

实。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小平同志致力于探索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前景。

地球在旋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已经又转了近半个世纪，使人类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社会信息化效应悄然地改变着世界经济产业分布结构。日本经济“从零到无限大”的膨胀，令欧美列强日益恐慌；“亚洲四小龙”经济持久高速的跃进，改变了黄种人的世界地位。近20年来，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已远远超过传统西方强国。一位经济学家预言，到2000年，太平洋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将占世界总数的一半。这意味着太平洋地区将在下一世纪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中国作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一个巨环，该在即将到来的新纪元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餐厅在旋转。小平同志一边观赏窗外的珠海和澳门风光，一边兴致勃勃地与陪同的谢非和梁广大同志在交谈。谢非同志说：“您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广东的情况怎样，影响很大，我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有个过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10多年的建设使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小平同志思索着接过话题说，这10年真干了不少事，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

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中国的希望在改革开放。珠海干部群众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1984年，梁广大刚来珠海不久，到拱北口岸去实地了解情况。一个情景令他至今难以忘记。拱北南侧的澳门高楼林立，一片繁华的都市气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拱门北侧的珠海则茅棚陋屋，一片荒凉。珠海的一些市民在澳门运来的垃圾堆上拣破烂。梁广大看了心里不由堵得喘不过气来，脸上像火烧般地羞愧难容。新中国成立已迎来了35春秋，可珠海市民中还有人过的是这种生活，作为市长他感到愧对黎民百姓。梁广大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

6年后，珠海拱北口岸已旧貌换新颜。当时来珠海视察工作的李瑞环同志说出了这样的感慨：“1983年，我由香港到澳门，站在澳门边上看珠海，一片渔村破破烂烂，心里很不舒服。昨天我是在珠海看澳门，非常感叹！珠海的规划建设和澳门比，并不差。珠海短短几年中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个奇迹。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原因可以讲好多条，但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

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你这里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创造精神就不会得到这样充分的发挥，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各方面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活力。”

1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珠海带来了历史性巨大变化，这几乎在珠海每一个海岛、乡村、企业等，甚至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找到生动的事例。

1979年，中华古国终于打开了几乎长满生锈的大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湾仔镇，一下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珠海经济特区的重要口岸。在这以前，湾仔尽管与濠江对岸的澳门相隔几百米，但贫穷落后一直困扰着它。湾仔人眼望着濠江对岸一幢幢大厦高楼拔地而起，自己却还在用稻草修葺着破旧的茅房；眼望着对岸“巴士”、“的士”川流不息，自己却还步步坎坷，沿着泥泞小路到20里以外的香洲赊购油盐，眼望着对岸灯红酒绿，自己却还在煤油灯下苦度春秋……

当时，湾仔农民曾带着痛苦的幽默，自嘲为“香烟队”。因为劳累一天换回一角几分的收获，仅够买一包廉价卷烟。作坊式的木器厂、网厂、加工钮扣的塑料厂和打铁铺，这几乎就是湾仔工业的全部“家当”。濠江两岸的澳门与湾仔形成了贫穷落后与现代繁华的强烈反差。于是，一些人或潜水，或乘船，在茫茫黑夜之中，躲着边防哨兵的眼睛，奔向对岸去寻找希望。抓住了，再逃；老大遇难，老二接着下水。

对外开放后，湾仔人的“荷包”开始鼓鼓囊囊了，人均存款达万元以上。住上小洋楼，摆上高档家电在湾仔人眼里也成了平常事。如今的湾仔已成为珠海经济特区的8大工业区之一，渔民、花农的后代也穿上西服、戴上领带，成为企业的经理、厂长。现在人口不到1万



的湾仔镇已拥有50多家工厂，年工业总产值达5亿多元，人均产值名列全国各镇榜首。

湾仔的变迁像一块特大的磁石，把湾仔人心凝结在这块物华天宝的土地上。昔日偷渡去澳门的周康年，到澳门当过搬运工、印染工，做过香烛，摆过小摊档。一天劳累下来只能蜷曲在铁皮小屋里回味生活的艰难和苦涩。改革开放后湾仔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了这位游子的

心。当初，他去澳门时想赚够钱回来盖房，可当他重返家乡时，才积有几千元葡币。回来后，周康年夫妇同种几亩鲜花，几年间便建起了梦寐以求的新家园。曾一度想偷渡的小伙子，现在动员他派驻澳门，他还依依不舍家乡故土。近8年来，湾仔镇没有出现过一个偷渡者，结束了湾仔人外逃的历史。

湾仔，自明代嘉靖年间有人落户这里，至今已过了450多个春

秋。几许风雨沧桑，多少世事变幻，湾仔历经坎坷磨难之后，终于飘荡出现代化的旗帜，挺立起当代中国的脊梁，成为全国最富裕的村镇之一。根据珠海市的统一规划，不远的将来，与澳门隔河相望的湾仔边境线，将出现长达3公里的高级住宅群和免税商场、娱乐场所等配套设施，以方便港澳居民在这里居住、生活。

随着旋转餐厅的慢慢旋转，澳门风光映入了小平同志的眼帘。澳门这块不到17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曾几何时，澳葡当局经营起赌博、娼妓及鸦片烟等行业，使澳门走向畸形发展。现在的澳门经济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出口工业，建筑业异军突起，和旅游博彩业成为当今澳门经济的三大支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荣辱之后，正在酝酿着新的突变，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曙光。

餐厅仍然在旋转。珠海建市10来年的突飞猛进正直逼开埠400多年的澳门。回顾几千年人类历史变迁，小平同志深沉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展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

这回事！”

沉思片刻之后，小平同志那双深邃的目光变得更加炯炯有神，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92年1月25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杰出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同志在珠海面对广阔的中国海，以其雄才伟略向世界发表激情高昂的宣言。暂时处在低潮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选择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将由此出现历史性转折。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本刊中南发行部在湖北成立

《炎黄春秋》杂志社中南发行部，于1992年年底在湖北省孝感市宣告成立。

中南发行部原是孝感市文化服务经销公司，他们为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文化市场，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多次协商，承担了该刊在中南地区的发行任务。发行部是直属于孝感市文化局的

有相当经济实力和人才优势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具备法人资格，成立后将对该刊的发展特别是使其进入中南地区的文化市场作出贡献。为此，孝感季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和《炎黄春秋》杂志社负责人及各有关单位，都曾前往表示祝贺。

中南发行部除发行《炎黄春

秋》杂志外，还经营其他书刊、音像作品及文体用品等业务。

中南发行部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城站路66号

邮编：434200

电话：222161

负责人：余仁俊 王小露

（邢耀章）



# 敬礼，伟大的奶奶们！

候岱

每年的“三八”节活动，照例要宣扬一批名女士或名夫人。今年“三八”我却想为读者“引荐”一下毫不知名又也是女士和夫人的“伟大的奶奶”们。这是由今年1月号《炎黄春秋》所刊一文中的一段引起的。该文该段披露了一件罕为人知的名人轶事，即刘伯承元帅与其原配夫人程芝荻的故事。

程氏原是一位富家小姐，因倾慕少年刘帅人品才识，诚心下嫁贫寒的刘家。刘帅从军并献身革命后，她独力承担全家生产和生活重负不算，又因刘帅当了“共匪”自己沦为“匪属”，承受了反动政权几十年欺凌迫害。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日思夜盼的刘帅成为大西南军政首脑，只是同时得知他已另结良缘。刘帅为此捎信向她致歉，并愿为她解决各种困难。但她却回话道：“……我对你毫无怨言，也无大困难需要你帮助解决，只望你勤勉国事，挑好老百姓给你的千斤重担。”

随后她一如既往地孤守家门，与儿子幼孙们共度艰苦岁月，至1957年她悄然去世，她与刘帅所生的儿子也于1961年因贫病早逝。其孙辈从不声言自己是刘帅的嫡传骨肉，一直勤奋自立，曾多次获得模范、先进等荣誉称号，虽然从未沾过刘帅光，却也为刘门争了光。这都是其祖母教育影响的结果。所以程氏和刘帅共同的孙女、四川省模范教师刘天俭

说：“我骄傲，不但因为我有一个称誉于国于世的、为国家民族舍弃一切的伟大爷爷，也因为我有一个虽然一生默默无闻，却集中国妇女忠贞、坚忍、勤劳的美德于一身的伟大奶奶！”

伴随程氏度过一生的刘天俭又说：“我的可怜的奶奶呀，一天的好日子没得过，凡是女人该享的福她都没享过，凡是女人的不幸她都受够了！”刘天俭未必知道，与她奶奶同样命运和境遇的，在全国又何止几人！据我所知，许多老同志参加革命前，不少都曾有过一位结发之妻，由于连年战乱，书信阻断，丈夫们大都另组家庭，却使他们留在老家的原配夫人们，苦守残家几十年后，反而从此失去了恩爱夫君和幸福家室，剩下的只是一点遥远的温馨回忆和无尽的苦涩孤寂！应该说，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尽管如此，她们不仅大都如刘帅前妻程氏一样“离婚不离家”，虽未享受到应有权利，却照常尽到了一个妻子、母亲和祖母的全部义务，并且虽然满怀委屈却毫无怨言。当年她们的丈夫离家投身革命时，她们不拉后腿，甚至送夫参军，然后默默地挑起丈夫留下的全部重担，使大批革命者毫无后顾之忧。革命胜利后她们又继续苦熬岁月，认命忍受，从不抗争，既未去争什么“原配”“正室”的应有地位，也未如秦香莲似的到处控告揭发自家的“陈

世美”，更未向对方索取什么“青春损失费”和各种报偿。因此她们不仅实际上支持了当年的革命战争，也在和平时期保证了社会安定。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后院”安静，因而促进了革命胜利与建设成功。而这都是以牺牲她们的个人幸福为代价的。

然而她们的这种历史贡献及其个人牺牲，几乎从来不为人知，宣传革命历史时只见她们当年丈夫的功勋业绩，披露名人家事时又只见其后任夫人形象，她们这批为丈夫也为革命和建设受够人间辛酸委屈的原配夫人们，几乎全挤入了被历史特别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以至刘帅前妻程氏夫人的孙女刘天俭不得不为自己“可怜的奶奶”说几句——也就只几句话。正如刘天俭所说的，包括她奶奶在内的成千的原配夫人们，确是“集中国妇女忠贞、坚忍、勤劳的美德于一身”，她们以自己的一生，体现了中华民族妇女的传统道德观念，她们在这方面达到的思想和品德高度，丝毫不亚于自己当年的丈夫和许多名人要人们，她们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奶奶们！

值此“三八”佳节，我特意“请”出了这批奶奶，希望她们能和所有名女士名夫人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敬爱，人们都会向她们由衷又至诚地说——

敬礼，伟大的奶奶们！

# 我因胡风蹲大狱

· 孙铤 ·

抗战初期，本文作者孙铤还是个爱好文学的革命青年。他结识了胡风，常到胡风门下讨教。1955年，全国突然发起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一下把他和一大批与胡风有过接触的人，大都划为反革命分子，关进了大狱。现在孙铤已到了75高龄，他回忆起昨天那场浩劫，仍令人怵目惊心。

——编者

1938年8月，我刚从大别山来到武汉，住在大和街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招待所里，想到在这儿就可见到胡风了，我满怀喜悦，忘记了炎热，按照信上的地址，四处打听他的住处。

在“两个口号”争论中，尽管我还在日本，我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抗战爆发，我立即回国，在上海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持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我在新四军投入了战斗，也写稿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这次我从前方回到武汉，给胡风写了信，想不到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信约我见面。

我终于摸到了江汉路的一条小巷，那是一幢旧屋，大门敞开着，我走进去，在右厢房见到一个头发稀疏的高个子，穿着白色短袖汗衫，我自报了姓名，他立即站起来，满脸笑容，伸出手来紧握我的汗涔涔的手。他就是胡风。他的眼睛炯亮，凝视着我，嘴角边溢出了欢笑。我说这次是来领取冬天军服和饷银，已经办好了。我的近视眼镜在战斗中丢失了，我在这里配镜片需要半个月，得等些天。他说日军已经包围武汉，战事逼近，他准备撤到重庆去出版《七月》。他斟给我的一杯凉

开水，早已喝光，我接连又喝了三杯。他递给我一把芭蕉扇，我扇了几下，就起身告辞，因晚上办事处召开会议必须参加。他送我到门口。

战争局势一天天紧张，日寇包围了武汉，我取到所配的眼镜，准备回大别山，但因交通情况不明，又没有人护送，组织上不让我走。过了几天，给了我一张搭船的护照和路费，决定我去重庆。

抵达重庆已经是1938年12月下旬，我在一家包吃包住的旅店暂住。重庆的灰蒙蒙的天空和嘈杂的市街，使我倍觉苦恼。我懒得上街，就坐在床沿边读高尔基的《萨木金的一生》。我有时伏在破烂的小板桌上写小说。袁勃来看我，联系我和组织的关系。他告诉我：胡风已到重庆，住在磁器街的一家旅店里。我便按照他说的地址，找到了胡风。他住的旅店也很嘈杂，房间很小，梅志躺在床上，听说生了孩子没几天，我在房门口跟她打了个招呼。我同胡风坐在房门口的走廊上喝茶谈心。我谈了些撤离汉口后的经过，胡风谈了筹备《七月》出版的情况，要我写些文章给《七月》，我把诗给了他，同时还留下了我写的长篇小说

两章请他提意见。突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我不敢久坐，临走时，胡风说：“明天我们谈你的这篇小说好吗？”

想不到第二天清早，胡风到我的旅店在楼下大声喊我。我赶忙奔下楼去，见到他，梅志抱着婴儿。胡风说：“今天要到医院去，改天再谈吧。”原来他们的婴儿躺在摇篮里，晚上给老鼠咬伤了脸部，他们急急忙忙走了。

文协召开的诗歌座谈会上，又见到了胡风。会议由老舍主持。座谈会上有很多人发言，我并不熟识，我只认识袁勃、姚蓬子和坐在我旁边的冯玉祥。我并没有把冯玉祥当作将军，他从草绿色的布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他写的诗，他说：“这些丘八诗，你看看怎样？”我喜欢他的直爽的性格和他爱诗。胡风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抗战诗歌的综合性的发言。

此后，我去胡风住的旅店，他忙着出版《七月》的筹备工作。他在我给他看的小说里有些文字上面画了“○”，有些文字上面画了“×”。他说：“○”的记号说明这段文字写得动人的，“×”的记号是表示应该修改的。他说作者不能代人物说话，应该是这个人物在他的环境中的描述。他介绍我读契诃夫的

作品。

过了几天，我又去打扰胡风，送去我写的诗稿。我们坐着对谈，突然他问我怎样写作的？我如实以告。我说我的心在大别山的战火中，我时常怀念亲密的战友，我写作的时候，仿佛又回到战斗生活中去了，有一种激情推动我写，使我听不到周围的嘈杂，使我忘掉了自己的烦闷。

胡风听着听着，大声地笑着说：“是啊，需要激情，需要真正的激情，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必须在生活中感受，同时，生活也不断提高磨练作者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机能。……”

这次见面以后，我得到通知，说是有一辆运送侨胞捐赠医药用品的卡车自西安来，空车明天早晨出发，要我搭车去南方接任党办的书店和刊物的工作。

我去胡风那里，向胡风、梅志告别。我把我写的诗稿全部留给了胡风，自己只带走了一部尚未写完的小说稿。

那时，我，21岁，一头初生之犊。

### 三

两个半年头过去了。我去到香港，廖承志告诉我，胡风到香港了，派我去接待。我按地址找到一家小旅馆，与胡风、梅志和他们的孩子晓谷又见面了。好高兴。那时，大批文化人自重庆撤退，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投降的倒行逆施。有些文化人来了，组织上总是派我去接待的。胡风一家人住的旅店，是娼妓吸毒者出入的地方。胡风大概是考虑经济节省才找了这么个临时住所。胡风穿着一件乡下人穿褪了色的长衫，吸着香港的人力车夫都不吸的最劣等的香烟，像是落荒而来的。我随即陪同胡风到西环一带的旧衣店里挑了一套适合他的略微肥



胖身材的淡灰色薄呢西装，还买了衬衫领带。回到旅店，换上西装，梅志笑着说：“像个教授了。”晓谷睁大了眼睛，仰头对爸爸说：“你是个洋人了。”梅志在长途旅程中照顾两个孩子，身体的疲累似乎还没有恢复过来。我说：“我去九龙找个清静的旅馆，你们暂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再找住房。”

胡风一家搬到九龙新旅馆后，廖承志立即去探望他们。

过了几天，我带胡风去看了几处住房，最后决定租用西洋菜街楼上的一间。没有家具，租了大床和书桌椅子。由党内同志开设的西药房作担保。

他们来香港没住多久，总是听到梅志说打算带着孩子回上海去。我把这一情况向廖承志说了。

廖承志同我几乎每天碰头，他

去看望胡风后对我说：“梅志要回上海，就让她回去吧。她对鸽子笼般的住房一下子难以习惯，吃菜吃不惯，说话听不懂，带孩子闷在一间房里，就想念她的母亲了，从这里到上海只要坐上船就可到达，回去一次也好。”

胡风那时40岁，梅志大约25岁，都还年轻。胡风受鲁迅的影响很深，家庭生活夫妻之间以及对待儿女的态度或多或少也受到鲁迅的影响。一个人热闹久了，就羡慕清静，一旦太清静了就会感到寂寞，梅志带了两个孩子去了上海，我走上胡风的蜗楼，顿时感到他的房间空荡荡冷冷清清。我邀他一起去探望叶以群，我们搭上公共汽车到太子道，以群同戈宝权住在一起，还有两位女记者高姓姊妹似乎也住在那里。我跟以群有工作联系，一个月至少

要跟他碰面一两次。有时，我找胡风去宋之的夫妇那里，高士其也住在那里。胡风同宋之的看样子他们亲密无间，谈笑自若。胡风写了些诗给盛家伦谱曲，盛家伦是一个豪爽的人，他住的房子比较宽敞。那时，我住在香港跑马地舞台附近一条僻静小街的一幢楼房里，对外不公开，我不得不经常去看望我所联系的一些文化人。我每次到九龙办完事，总要去看望胡风。时间多就多谈或者一起到附近散步，时间少便在他那里转一转就走了。胡风的房间门总是不上闩的，每次我去，明明见到他坐在书桌前看书，我还是叩几下门，听到他的回音：“请

▼1939年秋，胡风，梅志和子女在重庆北碚



进”，我才推门而入。

一次，胡风对我说：“我们为了抗议国民党的投降路线，大家来到香港，应该团结一致做些事出来。”胡风的意见是正确的。当一个香港的知名电影剧作家向我反映了一些重庆来的文化人排挤本地剧作家的情况后，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组织内部作了汇报，廖承志决定我去参加电影厂的组织生活，要我传达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我去处理好香港当地电影剧作家和外地来的电影剧作家的关系。

我和夏衍并无来往，我读过他的剧作和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高尔基的《母亲》。我知道三十年代他虽

受到过鲁迅的指责，但我对他还是景仰的。不知怎的，我接触的文化人都对夏衍有意见，以群对我谈了夏衍，说他没有担负起领导香港文化界的重任，在搞小圈子。以群是党员，我对他的意见特别重视。我也听到胡风、宋之的、盛家伦对夏衍的意见。我过去曾经读过鲁迅有关周扬以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文章，冷静分析思考，觉得胡风他们的意见都是对事不是对人的。所以对当时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我对以群、胡风曾表示过我的看法。我认为夏衍作为一个党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应该照顾到当时文化界的大局，应该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能利用党给他的领导地位来谋取小圈子内某些人的出版书籍和剧本上演的便利。我在组织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经过讨论，廖承志表示要召开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希望大家在会上开诚布公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后来以群得到了召开座谈会的通知，我同他一起去找胡风。我认为大家的意见应坦陈于座谈会，在背后乱说，或在背后搞些小动作都是要不得的。抗战为重，革命事业为重。

座谈会召开了。我因工作关系不便在公开场合露面，没有参加。事后遇到胡风，他涨红了脸，气冲冲地对我说：“背后大家都有意见，座谈会上大家都不吭声，好像没有意见了。我刺了他们一下，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

我问：“以群也没有说话吗？”

胡风说：“以群胆子小，只会背地里嘀咕，有什么用呢！我不是为我自己，鲁迅有一句话：‘我以我血荐轩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年轻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有一个下午，我去九龙办完事，便弯到胡风的蜗楼，他正伏案在写什么，见到我就说：“鲁迅逝世五年了，我正在写一篇纪念文。难写

呀，你看怎么写？”

“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怎样呢？”我说。

“鲁迅的爱和憎是非常强烈的，他活着的时候，他不能不横站着战斗。他相信党，但不迷信。”接着，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诗。

天色渐暗，便邀胡风到外面吃晚饭。叫了几盘菜，买了一瓶莲花白。胡风大口大口吃菜，好有劲。

梅志回来了，我从香港过海到九龙去看望她，胡风的房间变得热闹了，充满团聚的欢乐。我说：“应该换个地方。”

想不到没几天，战争爆发了。那天是1941年12月8日，香港陷入一片混乱。面对这突然发生的事件，我们大忙起来。廖承志大清早到我住所，连贯也来了，为了安全，决定将住在九龙的文化人全部搬到香港居住，原居住在香港的文化人另行搬迁住所。我们分工后立即各自行动起来。这时，街上电车公共汽车已停止行驶，只得步行，街道上人来往全是步行的人了。我在中环一带的人海中遇见廖承志，相互暗暗点一下头，一下子又在人海中隐没了。一颗炮弹突然飞来，行人急忙奔入附近大楼躲避，我走进了一家银行的大门，炮弹在市街爆炸，等到平静时我走上街，只见周围尸体多具浸在血泊中。

我搭渡船到尖嘴，先去太子道向叶以群交代了一切，我又赶到胡风那里告诉他赶快整理行装，以群会去找他们的。我还请胡风就近去宋之的、高士其住所关照他们作好搬家准备，以群会去联系的。我立即搭渡轮回到住所，烧毁无用的文件信件；整理了衣衫书稿。把党内文件装进了衣箱，转移出去。到了晚上，停电，环顾客厅，空荡荡乱糟糟，炮声时断时猛，我很累，躺在床上，才记起一天只喝了几杯水。



▲梅志带着儿女们肃立在胡风遗体前，地点：八宝山革命公墓整容室

整整一夜都在飞机声炮声和高射炮声的骚乱中度过。早晨，想到自己的住所还没确定，我先去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然后找到胡风那里，我说我为还没有找到住所而焦急。梅志说她的友人有一层住房空着，我和梅志去湾仔看房，经过房主人同意，再经过组织同意我们就搬去临时避难。好在那一大间房间隔了木板可以分为前后房间，家具齐备。胡风一家住前房，我和南非华侨姊弟住后房，前后房各有一张床铺，后房的床铺由我和华侨男孩合睡，华侨姑娘睡地铺，胡风一家三人睡的内房有衣橱、梳妆台、大床、沙发等，显然是原主人的住房。在那兵荒马乱中找到这样的住房多么幸运。

我告诉胡风，除了躲进防空洞，他们不要外出。我上街购买食物，买了大米面粉食品罐头，估计可能断水，买了啤酒桔子水汽水等饮料。还买了香烟柴炭。惶惶不安的气氛弥漫市街。

我们组织成了一个商人家庭，彼此改名换姓，编造了相互关系，以防万一。战争一天一天激烈起来，12月的深夜空袭警报响了，高射炮轰响了，敌机在上空盘旋，我们大大

小小摸黑躲到楼梯底下。有几个夜晚，大家要从窝里爬起来摸黑下楼两、三回。白昼，在三楼前房，我们隔着玻璃窗观望远远的山麓，英军日军沿着山路短兵交战，英军的后面扯着一面红十字旗，听不到枪声，只见射击时枪口的火光闪闪，显然，日军早已登陆了。胡风每天抽烟解闷，他喷着烟，吐出了一个一个小烟圈儿，逗得几个孩子好欢喜。自来水早断了，我们用完了积聚的水，连抽水马桶水箱里的水也用空了，只得用桔子水、汽水煮饭。我们憋在屋里，哪有心思谈什么，我经常同胡风下棋，有时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玩扑克。梅志安排三餐，大家在战火中苦挨日子。

圣诞节前两天的晚上，街上偶尔传来奔跑声、零星枪声和叫喊声。战争进入了市街。12月24日早晨，我们从三楼沿街窗户望见了对面跑马场上有许多军马，还看到了日本旗和日本士兵，香港沦陷矣。

我征求胡风的意见，胡风说要回内地去。我立即把胡风的意见转告给组织。

#### 四

1947年的某一天，我在上海

## 五

1955年，5月中旬，报纸上刊载了“揭露胡风”的信件，而且在按语中称作“胡风反党集团”。看了按语，我感到牵强、武断。当时，我正在浙江省嘉兴视察一所专业学校。有人通知我杭州有电话来要我回去。我匆匆上车，车厢里坐着一个陪送我的人。说是陪送实际上是押送。

回到杭州，见到厅长，他满面笑容：“你看了最近一段时期的报纸了吧？”

我点点头。

“想请你写些材料。”

“是不是写胡风的材料？”

“是的，是的。写些你们过去来往的情况，有信件要交出来，你还年轻，还有前途，应当同他划清界限。”

我说：“我同他来往的日子里，我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反党的行为，他是跟着党走的，他在文艺论点方面跟周扬有分歧，这不过是文艺理论问题，根本谈不上反党。”

“你要站在党的立场，好好想一想，不要很早关门。”

他站起来叫人派一辆小车送我。我赶回招待所，开始写我与胡风往来的经过情况，只写了一张半纸。第二天早晨就交给了厅长。

翌日，厅里派人来招待所找我，我到厅长那里，他说：

“你写的材料看过了，还不够。”

我说：“我同胡风的往来，就是这么些，没有什么可写了。”

他说：“你应该揭露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很早关门，对你没有好处。彻底揭露胡风，才是出路！”

这时，厅长把人事处处长找来，那个处长沉着脸说：“你应该认真对待你的问题。”

“我已经把我同胡风往来经过

间等人的诗集，还有一本胡风编的《我是初来的》诗合集，还有胡风自己的《在混乱里面》。我感到当前文坛上只有胡风呕心沥血关心写诗的年轻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前辈文学家能如此关心和扶植我们，也只有胡风能够不辞劳苦办了《七月》和《希望》刊物。他一个人奔走印刷所，校对，他一个人看稿、定稿。我又想起鲁迅，在那白色恐怖年代，也曾为青年作家叶紫、萧军、萧红编了一套“奴隶丛书”。

一年匆匆过去了。夏天刚刚开始，胡风来信，约我抽出一天时间去他那里谈谈。

依旧是梅志带我上楼，胡风告诉我，他们要他去香港，他并不想去。我说：“暂时离开这里比较安全，国民党特务是杀人不眨眼的。你长期在党领导下搞文学工作，你的知名度、你的立场，国民党特务不会不入他们的册。现在上海，白色恐怖已经进入了顶峰时期。”

梅志搬来了午饭，还有一个清蒸鸡，一盆炒冬菇。

我和胡风坐在日本式的矮方桌边的草席垫子上吃起来。一边吃，我们一边谈到战争的发展趋势，大家都乐观。又谈到了宗派主义，胡风说：“过去说‘胡风派’，现在说我在拉拢人搞宗派。我搞宗派有啥用？鲁迅也从来不搞什么宗派，他爱憎分明、公正而已。”

吃完午饭，继续谈《论现实主义的路》。谈到了偶然性不一定是唯心主义，谈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违背了规律就会损害艺术。话题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对党对毛泽东是无限敬重的，他称毛泽东是思想巨人，是革命巨人。他也提到人民，他说：“人民力量是强大的，谱写历史的是人民！”

傍晚时分，我留下一些诗稿向胡风、梅志告辞，此后长别多年。

為  
人  
師  
表

教  
書  
育  
人

### ▲作者孙铨

收到了胡风的信，知道他和梅志都迁到上海定居，很想见到我。

胡风的住所是雷米路文安坊6号。我利用到雷米路附近一家电影院旁边小里弄去办事时，见了。他身体仍然胖胖的，看来很棒。

胡风跟我谈了些分别以后去东江的事，我告诉他：“我在香港同你们分别以后，忙着剧团人员的撤离，还有茅盾一家撤离也是我去通知的。”

胡风要我吃早点，我的肚子还很饱，我拿了一只面饼吃。胡风吃得很痛快，边吃边谈。从桂林谈到重庆，从重庆谈到上海。谈到了桂林的南天出版社，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

我手里翻着我的《旗》这本诗集，又翻看了绿原、冀沔、艾青、田

全部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写呢？我不能乱写。”

那个处长阴险地冷笑了一下：“谁叫你乱写？只有交待清楚，才能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对我说“宽大”这个词儿，顿时冒出了一阵汗水。对于文艺问题怎么也谈宽大不宽大呢？

就这样，写了再写，写来写去写不出什么，厅长、处长都火了，叫我搬到厅里住，并且向我宣布只准三件事：一是送写好的交代材料，二是到饭厅吃饭，三是上厕所。除这三件事之外，只准呆在小房间里。我失去了自由了！

这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搭着睡铺，一只小桌和一只小椅子，小桌的抽屉里放着我的怀表和钢笔，桌子上是墨水瓶和一只水杯，毛巾搁在椅背上。其他，什么也没有。

整个6月过去了。7月初的一个阳光四射的上午，突然有三个汉子闯进我的小房间。他们拿出逮捕证要我签字，我签了我的名字，立即给我戴上手铐。我镣铛入狱矣。我为了什么？！

我睁大眼睛，半夜里突然醒来，监狱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我的躯体给锁在黑暗中，一群蚊虫向我扑来，我失去了扑蚊虫侵袭的本能。

我一直呆站在木栅门边，见不到阳光，似梦非梦。我回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死囚室手记》，回想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回想谭嗣同、秋瑾、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可是，我生活着的社会跟他们所处的封建法西斯的社会根本不同。难道天地倒置了吗？我躺下搔着蚊虫叮咬的皮肤，又昏昏睡去。……突然，从木栅门外响起一声吆喝：

“站起来！”

我猛的睁开眼睛，见到一个军

人在木栅门外。

“叫你站着，怎么躺下了？你这个反革命，反抗吗？找死吗？站着，不许动！”又是一阵吆喝：

“把脸孔转过来！两只手伸直！头不准低下。”

我的身子转向木栅门，抬起头直伸双手，我面对着木栅门外军人，他睁着一对凶悍的大眼珠。我站着，吃饭也站着。那个武装的皮靴声一直在门外笃笃地响来响去，经过我的木栅门，他总要探视一下我是否站立着。

过了几天，一个深夜，我给开锁声音闹醒。门打开了听到一声：“出来！”

我勒紧裤腰，跨出了木门，但见走廊里一盏盏阴沉沉的电灯闪着微光。几天没有走路的双腿，摇摇晃晃提不起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歪歪斜斜走着。我面前有一垛高墙，整个高墙上仿佛写着一个很粗大的“冤”字。再看一眼，“冤”字闪闪消失了。那个叫我出来的人走在我后面，保持着距离，我略微放慢步子，他就吆喝着：“快走！快走！”每走过一道门，就有一个卫岗。记不清走过多少道门，阴暗的门上仿佛都写着很大很大的“冤”字。推开每道门，走过去了。门便咯吱咯吱发出一阵凄惨的声音，关上了。开门关门，真像过鬼门关，阴森森的。将要发生什么？我在亮着灯火的门前停下来，跨进一间铺着石板的房间，玻璃窗上糊着报纸，两张破烂的写字桌拼在一起，并排坐着四个表情冷酷的人，对着他们有一只木凳，他们之中有个尖下巴的指指木凳叫我坐下。我清楚，又一场审讯开始了。

“我不是反革命，我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

“铁证如山！你还要抵赖，你这个反革命，我们冤枉你吗？”

瘦个子举起从裤腰里抽出的手

枪，猛地从桌上扑向我，把枪口戳到我的额头，我的头歪了一下，那枪口落到我的肩膀，他狂叫起来：

“你头已经破了，现在要流你的血了！”

“这是国民党特务作风，你可以这样吗？”

“就是要你流血！”

那个脑袋跟脖子连在一起的胖子也站了起来，挪开了瘦个子的拿着手枪的臂膀，缓缓缓气地说：

“喂，你不要死心塌地跟胡风反革命走，你上有老父母，下有孩子。你有信给家里吗？我们可以给你带出去。”

我闭了下眼，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说：“你们把我关在黑牢里，白天晚上都漆黑，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怎么写信？”

胖子说：“好！好！只要你好好交代胡风，交代你们的集团，我叫他们给你调一个笼子。”

我又给锁进了阴沉沉的黑牢，我怀疑我堕入了国民党法西斯的囚笼。

我一日三餐，每餐三块玉蜀黍糕或薄粥一瓢，加上一小抓咸菜，过了一天又一天，明日如何？简直不敢往后想了。

有一天，管理员打开狱门叫我把东西全部拿出。

把我领到一个新号子的木栅前，那个管理员大声对我说：“你是42号，不准通名报姓！”从此，我的名字又改为42号了。

“活动！”有人一声吆喝。笼子里顿时沸腾了，所有的囚犯像马拉松运动员在木板上噤噤噤奔跑起来，我懵懵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是靠墙壁坐着，那个笼子头头奔到我旁边，粗暴地抓住我的耳朵，把我拉起来：“跑！跑呀！政府叫我们犯人活动活动，这是人道主义，你对抗人道主义吗？跑！跑！”我提起发麻的腿也奔跑起来，大家一个挨

一个在木板上兜圈子，有的装着打篮球投篮的样子跳了起来，有的挥动双臂，奔呀奔呀，奔了一圈又一圈，木板上响着噤噤的声音，隔壁笼子里也是噤噤的声音。这时候，有个青年人在噤噤的声音中挨到身边问我怎么会进来的，我简单说了一声“胡风”。青年人的瘦削的脸上立即浮起了笑容：“我是农业学院的学生。”我们一边奔跑一边谈话。我问：“你为了什么？”他说：“为了看胡风的书。看他们的小说他们的诗。”有个矮矮的老人也奔跑到我旁边来了，他那苍白的脸孔皮肉松弛，剃了光头，他一开口就说：“我叫曾猛。”这时有个体格魁梧的人也跑到我身边，看来也想跟我拉几句话，只听得笼子外面大喝一声：“停！”大家立即停步了，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这时好几个人都挤在便桶旁边喊着“报告小便”。

比起独自关在黑牢里，这笼子显得热闹又光亮。住了没几天，我的心情又烦躁起来。

新犯不断进笼，按照笼内规矩，我已经依次挪动到中间的坐位，不再接近那臭气喷射的便桶。我的右边是47号，苏州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牢狱受过老虎凳的刑讯。现在也是为胡风问题关进来的，他同那个农业学院学生相识，他的家在杭州。他问我：“胡风怎样了？”我苦笑了一下说：“不妙。”他说胡风可能比我们待遇要好些，总不至于像我们挤在国民党特务一起享受大灶待遇。

笼子里的信息传播很快，我并没有把我的案情告诉那个叫曾猛的老人，他却利用活动奔跑的机会问我：“胡风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回答说：“不清楚。”

坐在牢门旁边的笼子头头是诸暨人，听说是镇压反革命时抓进来的当过大官的军统特务。他同曾猛在这笼子可算是元老了。农学院的

学生告诉我，曾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这就使我意识到他可能是“托派”，要不，怎么会坐牢呢？可是每当“活动”奔跑的时候，曾猛总要挨近我说话，他背诵《琵琶行》，背不下去了，要来回问我，我说不知道，他便快快地叹气。

笼子里只有两个人的座位从不挪动：一个是曾猛，他背着木栅端坐，双目下垂，像一尊菩萨，他从国民党监狱一直到现在，不判不放，不知要坐到何年何月。另一个就是笼子头头，他像一只大铁钉子那么钉在牢门边，他不断在小纸条上写什么，写好了，把小纸条折了起来塞到木栅外，外面有人经过，就把纸条取走。……现在笼子里挤满了人，甚至便桶盖上也坐着人，好不热闹。几个月没洗澡。开饭时搬进什么菜就吃什么。

外面在叫42号，接着牢门打开了，我已经懂得这叫做“提审”。我走进审讯室，又见到那个又矮又瘦的小个子转动着小眼珠，他第一句总是这么开腔：

“怎么啦？你这个胡风骨干，只有彻底坦白，才能争取宽大！”

这些话，我已经听腻了，他说他的，我想我的。

这一回他从一只牛皮纸大信袋里倒出许多照片，要我一一辨认。那么多照片中，我只认得胡风和梅志，其他人都不认识。

两天以后，管理员来拿我的交代材料。我写什么呢？审讯员要我写阿垅。不知从何写起，我们并不相识，也没有通过信，我很喜欢他的诗和文，就写了这么些，再也写不出了。

笼子里又进来一位新犯150号，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瞧什么东西都要搁在鼻尖前面，他那高大个子的一举一动，不免露出当官儿的架式。然而，到了这个鬼地方，不管你是大将元帅，也不管你

是小偷惯盗，大家都是彼此彼此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150号犯人居然带进了一本鲁迅的《三闲集》，我的麻木了的神经，终于兴奋起来，好像沙漠地里发现了一个水潭。

多次跟150号接触，知道他是从别处牢狱押解到这里的。他是余姚人，热衷于鲁迅著作的研究，他说冯雪峰曾送给他一部影印的《鲁迅书简》，他认识楼适夷，他感到不认识胡风是生平最大憾事。我说我们能有一天出去了，一起去看望胡风如何？他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他认为胡风写了30万字向党进言，那片忠诚，已值得赞赏，即使全部说错了，也不应该把他当作敌人治之以罪，相互通信相互认识甚至光是爱读胡风的著作，都要坐班房，真是天理都没有了。

我收到了一包寒衣和一条薄棉被。家信中只写着：“你要靠拢政府，老实交代罪行，争取早日成为新人。”老父亲遒劲的毛笔字，写了一个“忍”字给我。他知道我的性格耿直容易激动，但是到了如此地步，即使无从忍耐也得忍耐，不过，我总觉得忍耐是有限度的。

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了春节。午饭时，大家的眼睛盯住了端进来的菜桶，禁不住喊了起来：“肉！肉！”整个笼子的犯人的神经都紧张了，分菜的犯人先把大拇指指甲那么大的肉片一块块分到各人的菜碗里。每人分到一片肉和两瓢羹青菜，还多余四片。分菜人写了纸条，一一摺叠好，给大家拈，谁拈到写有“肉”字的纸条，谁就多吃一片肉。四个犯人拈到了，他们啊啊地得意洋洋，拈不到的默默地端起饭碗吃饭了。一餐肉宴匆匆过了场，大家板着脸孔端坐着。突然管理员给我们一副象棋，说准许下三天，三个晚上不用读报学习。我毫无兴趣下棋，我独自沉浸于幻想之中。

1956年6月一天，吃过早饭



后，管理员来喊：“42号！把东西收拾好！”我一时有点惶惶，还以为是要来提审，150号赶紧趴在木板上帮我收拾破烂的冬衣和棉絮，他附在我的耳边，慌慌张张地说：“你可出去了，我们在外面见，我一定会去找你的。”我抱了一大包衣物，管理员已经打开了笼门，我根本无法断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生死未卜的时刻，我来不及向150号告别，激动的泪水已涌淌出来。茫然地跟着管理员走进一间小屋，桌子边坐着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汉子。木板上扔着一堆东西。那个汉子先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说：

“你释放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听觉。直到他要我在释放证上签个名字，我才渐渐开始有一种说不出的激情，管理员走来要我在伙食报销单上盖章，我说没有图章，便盖了许多手指印。我感觉有点头眩，那个汉子对我说了一些话，还要我休养几天再回去，我回绝了他的好意，我已归心如箭。

那汉子给我写了一个回去后向当地三人小组报到的介绍信。我要他们去找一辆三轮车。管理员指着地上一堆东西说：“这也是你的东西！”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双白布鞋，还缝上了粗麻布，还有一块黑纱一朵白花，鞋子里塞着一封信，粗略一看：母亲死了，是去年10月逝世的。……管理员过来帮我东西包扎起来，那汉子说：“发给你一些路费和生活费，你签个名。”我拿了钱，签了名，赶紧把包裹往门外搬去。依旧是那扇木门，门边依旧站着持枪的看守，木门打开了，小巷里停着三轮车，搬上行李，等我坐上三轮车时，那扇木门已经紧紧关上。我拧了下大腿拉拉耳朵，都有痛的感觉，我才相信我并非梦中。

没有刑期的“刑期”满了，应

该说我是自由了，然而以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更为可怕的噩梦。细述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只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除了极少数借机得利者外，大概谁也不会忘记那个时代的人生况味。只有到1980年10月，胡风冤案得到平反，我才被恢复了党籍和原有的待遇。

1981年7月22日，又是夏天。我专程赶赴上海。在彭柏山夫人与梅志重逢，彼此的心情甜酸苦辣，还说什么呢？梅志给我看了很多很多照片。

7月23日，梅志陪我去上海精神病院。路上，梅志说胡风已有几天拒绝吃东西。走进一间单独病室，见到了一别34年的胡风，瘦削苍老的胡风坐在紫红色的皮沙发里，穿着一套阔条子的睡衣，双眼瞧着地面。电风扇在呼呼转，晓谷伴着爸爸，梅志凑到胡风的耳边，大声喊着：“小孙来了！小孙来看你！”胡风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又睁大眼睛呆呆望了望我，随即垂下头了。梅志赶紧抓了一块毛巾抹去胡风脸上挂下来的泪水。

晓谷搬来凳子让我坐在他爸爸前面，胡风缓缓抬起头，睁大了呆滞无神的眼睛，声音微弱地对我说：“你不是去国外了吗？”隔了一会，低声自言自语：“你去了国外，我很早以前就听说你去了国外。”梅志端来了一大盘切好的西瓜，大声说：“小孙来了，我们一起吃西瓜！”

胡风摇摇头推开了晓谷端过去的西瓜。

梅志把一片西瓜端到他的嘴边，说：“我们欢迎小孙，你也得陪客人吃嘛。”胡风咬了一口西瓜，又摇摇头推开了西瓜。

我说：“吃呀，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吃完西瓜，我们又要谈诗了。”

他呆木地望着我，他吃了，吃

了一块又一块。梅志和晓谷兴奋起来，我感到室里出现了一番新气象似的。

晓谷对我说：“爸爸近来身体好多了，每天还练书法。”说着，他拉开写字桌的抽屉，拿出一叠写着毛笔字的纸给我看。胡风恼了，两手拍打着沙发扶手，阻止他拿出来，晓谷赶忙把纸塞进了抽屉。

病室又肃静了，梅志忙着收拾瓜皮，只有电风扇呼呼转动的声音。胡风又垂下了头默默沉思。

我不能耽在病室太久，怕影响胡风的情绪和神经，我悄悄向晓谷挥手示意，梅志伴我走出医院，她喃喃说：“他今天总算吃了些西瓜。”

把一个追求和探索真理的文学勇士、一个忠诚于党的文学战士、一个智慧惊人卓有建树的文学巨匠，摧残到这种地步，可愤可悲可痛啊。

隔了一天，在友人家遇见梅志，她对我说：“胡风在你走了以后对晓谷说，孙钊在国外，这个孙钊是假的，是他们派来的。”

从这次上海精神病院病室一晤胡风，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面。

世上事，太错综复杂了，胡风如果能像太史公所说的：“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那么，已不是胡风了。胡风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胡风说：“我的错误是，我陶醉在本业（文学）特点（个体劳动）里面，以至违背了具体领导上的期待。”

果真如此吗？

胡风说：“心安了，就能够在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类解放事业一定胜利的信仰和对自己的某些因蠢而错的言行的悔恨里面过下去了。”

胡风果真是蠢了吗？错了吗？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

舒云

在当今世界上，政治谋杀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有7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著名社会活动家死于谋杀，这中间并不包括幸免于难的数十人。至于各国保安机构及早识破或当场粉碎的未遂事件那就更海了。

苏联建国后，列宁外出，无论乘车还是步行，从来不带警卫。他还经常和夫人克鲁斯卡娅到大马路上散步，警卫只能偷偷地跟着。

苏联政府迁都莫斯科初期，列宁住在苏维埃民族饭店里，每天步行到克里姆林宫上班，没有任何警卫，直到不幸遇刺后才组织警卫。

1918年8月30日，早上从彼得格勒传来消息，彼得堡反主席被害，捷尔任斯基立即乘车去调查。他阻止列宁外出演讲，但列宁还是自己叫了一辆汽车去了工厂。

这个已荣获伊里奇称号的工厂，有上千工人在热烈地等待列宁。

列宁演讲时，女特务卡普兰问列宁的汽车夫：“你给谁开汽车？”

汽车夫没说话。这个女特务就躲起来了。等列宁讲演完，很多工人把列宁围起来往外走。一个男特务把群众推开，说：“让列宁同志先走。”一下子把列宁暴露在女特务的枪口下。

结果列宁负了重伤。后来列宁的去世与这次负伤很有关系。

《列宁在1918》的电影故事在延安的警卫战士中就是一个不衰的话题。在延安负责保卫工作的康生从苏联回来经常讲，并把从苏联带回来的片子反复放给警卫战士看。



△警卫战士王茂春（左）和他的战友

周恩来也经常说：“我们要接受教训，不能出现1918那样的情况。”

进城以后，毛泽东对北平市纠察总队司令张明河说：“明河啊，可不能像列宁在1918那样。”

“放心，有张明河在，决不会！”

就在这不久，从刚抓获的特务段云鹏身上搜出了一份刺杀名单，上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薄一波、聂荣臻、林彪、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20余人。只要完成任务，回到台湾就可晋级，奖黄金50两。

张明河明白，这是美国的布里奇暗杀计划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谋杀了许多国家诸如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国的共产党领袖，但是，他们要谋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永远不可能！

党中央搬进北平不久，毛泽东就从香山挪到了玉泉山。

玉泉山，有一座程家花园，是程砚秋的别墅。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白天在中南海办公，晚上回到玉泉山休息。一天夜里，卫兵听见沉重的跳墙声，过去搜索又没见人。他急忙报告，带班员围着房子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可疑行踪。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好说，带班员认为毛泽东住在这里有危险，尽管已经夜深，应该连夜返回城里。

那天夜里，毛泽东又回到中南海。

玉泉山这里，根本就不是森严壁垒，尤其是围墙全是装饰，矮得出奇，一般人谁都能跳过去。

玉泉山外面有个天主教堂，搞了一些鬼名堂，后来被军管了，改成玉泉山疗养院。

至于毛泽东的住处怎么办呢？警卫老是觉得墙太矮，一蹿就上去了，后来认为还是要搞电网，否则太不安全。电网搞好后毛泽东又来玉泉山居住了。

一个雨夜，伸手不见五指，风又刮得山响，毛泽东那晚住在钓鱼台。那是1962年。

第二天早上，离哨兵不远的湖上发现一具屁股朝天的尸体。立即捞上来，找派出所联系，发现是个醉鬼。派出所挨个酒馆调查，终于从丰台一个酒馆了解

到他在那里喝了酒，然后醉着一路摸到了玉渊潭。玉渊潭那时与钓鱼台相隔的不是砖墙，而是篱笆墙，没什么能挡住醉汉，他轻松地翻过去，一直往前，前面是假山，摸摸爬不上去，绕过去还往前，前面就是湖了。



▼1949年全国第一届政协

▲毛泽东报到



哨兵就在离他落水几步远的地方，无奈树多且密，雷不断雨不断风更是不断，醉汉落水声自然听不到了。

幸亏不是什么坏人。

要是坏人怎么办？

汪东兴召集警卫部队开会。开了几天，没人说话。汪东兴一个一个地问，谁敢说点什么。问到营参谋长王茂春。因为毛泽东住进钓鱼台，那天晚上他在钓鱼台值班。

汪东兴问：“为什么会进来醉汉？”王茂春说：“我要知道他怎么进来的，他不就进不来了嘛。”

汪东兴气得要命。后来，钓鱼台安上了从英国进口的一种报警仪器，一接近就自动响。用了几天发现不行，猫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一接近篱笆墙也响个不停，搞得警卫经常虚惊。干脆下决心换上高高的砖墙。

搞了一辈子警卫的何振才说过这样一件事，中南海的东门，曾经错放过一个人进去，那就算警卫事故了。

那是一个一只眼睛的人，跟在一辆马车的后边混了进去。哨兵以为是跟车工人，也没拦。其实这是个上访者，他找中央首长解决他个人的问题。

之后，马上严厉追查哨兵。

人民大会堂发生过一件事：

警卫部队有个参谋，为了给孩子找个托儿所，就把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票给了托儿所所长。没想到那天晚上托儿所所长没去，她把票转给了自家的一个朋友。她不知道这个朋友是派出所的跟踪对象。

于是到门口就给截住了。

偏偏那天晚上的演出活动毛泽东去了，这事就更加重了分量。参谋一张票送出了大乱子，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不算，还降了一级。

进玉泉山有一段长长的路，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过了青龙桥，走不多远就到了玉泉山，毛泽东和江青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下过两次车，慢慢散步进玉泉山大门。

这一段路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也没有车马往来，安静极了，实在是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

就在毛泽东和江青第三次如此散步时，这地方出现了一个闲人，很怪的闲人。

这条路线警卫是有分工的，玉泉山大门外这一段是北平市纠察总队的警卫范围，只要电话一通知，马上展开警戒线。因为岗哨多了毛泽东讨厌，所以，路线警卫全是便衣。

便衣队员一看毛泽东马上要过来了，格外警觉起来，对迎面走来的闲人更是不错眼珠地盯着，并且紧

紧地占据着有利地势。

便衣发现这个人太可疑啦。他背了一个钱褡子，一边一个长方形口袋，搭在肩膀上。这太犯忌，北平附近的老乡没有用这东西的。于是，便衣步步紧逼他。

这个家伙果然是个坏蛋，他看见便衣腰上插有明枪，就往山边一个马车店疾走。

在街面上不能捕他。没有证据，等他退到屋子里，便衣也紧跟了进去。

那人一看来了两个便衣大汉，慌忙伸手进大口袋里掏枪。他一行动就好办了。便衣立即猛虎扑食般地扑上去，三下五除二把他的枪和子弹分解开，利索地把他抓了起来。

从此毛泽东不再住玉泉山。

毛泽东在罗道庄那边也住过，发现某人有什么行动值得怀疑，以后就不在那里住了。

那时候，毛泽东警惕性非常高。张明河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河北工作后，毛泽东外出经过河北，总叫张明河去接他。一次，他从车上下来，看见张明河从腰间掏东西，以为是枪，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靠了一靠。这动作很轻微，毛泽东自己也许是下意识，但张明河感觉到了。当毛泽东定睛看见张明河手拿一把扇子时，才放心了。

其实，每逢跟毛泽东，张明河都带有枪。

1941年在延安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绥德和米脂的绅士组成一个参观团，去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参观。他们行程一个月，收获极丰。离别时毛泽东亲自宴请了他们。

金城负责这次宴请的具体安排。头一天，他就派延安交际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到青年食堂订菜。第二天上午，金城又提前去检查了酒席的准备情况。

将近中午11点，毛泽东到了。这时，绅士代表团还没到。

青年食堂座落在文化沟北的一块平地上。毛泽东的车由北而来，向西转进平地。听见车响，金城迎面向外，跟在毛泽东的右后侧边走边谈。

保安处派来的警卫和毛泽东自己的两个警卫员，都落在了后面。忽然，左侧前方出现了一个彪形大汉，30来岁，膀大腰圆，双手紧握一根大木棍，高高举过头顶，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冲着毛泽东奔来，企图兜头给他一大棍子。

金城是交际处长，文官，没有带枪的习惯。此刻，他只有挺身用身体来掩护毛泽东。

说时迟那时快，金城一个箭步从右后侧跳到左侧，把毛泽东让到身后，那怒目拿木棒的大汉，一副准备拼命的架式。



不知大汉害怕了还是怎的，他的行动迟缓了。趁他犹豫的一刹那，金城保护毛泽东进了食堂。安排毛泽东坐下后，又返身出来，看见大汉还在张牙舞爪地企图冲食堂，而3个警卫还在那里立正。

“抓起来！”金城一声大喝。

几个警卫冲上去，下了他的木棍，推出现场，关了起来。

毛泽东问：“怎么啦？”

“主席，那个大汉已经被抓起来送到保安处了，你放心吧。”金城说。

毛泽东从容点头，说：“好。”

后来查明那人是疯子。

接下来毛泽东接待绥米绅士参观团，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依然谈笑风生。

党中央被青年食堂的事件震惊了，从此加强了警卫力量。

而金城，最最后悔的是当时没有一支枪。

毛泽东有时对警惕性这东西很重视，但很多时候，他似乎又把警惕性给丢了。

还是毛泽东住在玉泉山的时候。一天下午，挺凉快，毛泽东从玉泉山出来，他夜里工作，上午睡觉，下午睡醒了自然想出去散散步。

也许在想事情，或者他还不习惯外出交待一声，独自一人往西去了。

带班的恰好不在，等他回来，毛泽东的屋子空了。警卫门口的岗哨只知道毛泽东往西去了。

报告李树槐，李树槐急了。

他是延安时的保卫英雄，原来跟朱德。保卫朱德有功，朱德把他推荐给了毛泽东。当时他是警卫科长，事业心特强。一听毛泽东一个警卫员也没带，一个人出去了，那份急，恨不能立刻蹦到毛泽东身边。

李树槐叫来了海淀分局的公安人员，同时把整整一个骑兵连全撤了出去，大海捞针。

毛泽东单枪匹马，更增加了危险系数。谁知道他

往西进了路南的果园，怎么也找不到了。找不到也得找，找了很长时间。

等到毛泽东自己从果园里溜达出来，正高兴，撞见李树槐一脸的焦急，立即像小学生般地低下头，说：“我犯了错误，对不起，没请假。”

李树槐说什么呢？他本来绷着脸，一肚子气，但看见毛泽东诚恳地认了错，不由地扑哧一乐：“没办法，你呀。”

1949年9月下旬，毛泽东从中南海办完公返回香山休息。出发大约一小时后，周恩来有事请示，打电话给香山，回答说：“毛泽东还没有到。”

吴烈立即坐车去看。动物园说专车过去了，海淀也说专车过去了，颐和园说没见到专车。

吴烈又追，在北京大学到西苑的弯路上找到了专车。

车没出毛病，毛泽东看稻田去了，和一位拿镰刀的老农聊得正热乎。

毛泽东问：“几时开镰？”

老农说：“这就可以割了，想让庄稼再晒透点。”

毛泽东问：“能打多少？”

老农说：“千八百斤吧。”

“家里有几口人？”

“六口子。”

“够吃吗？日子宽不宽？”

“够吃，除了这稻子，那边还有一片小麦，已经收了。还有果园。”

面前的老农年老眼花，没有认清跟他聊了大半天的人是毛泽东，以为只是一般干部呢。毛泽东身后的警卫员看着老农晃晃的镰刀，吓得脸直发白，正好吴烈赶到。吴烈向毛泽东报告：“家里有事情。”

毛泽东这才兴犹未尽地返回香山。

这种事，公安局外线大队的副大队长李宁也碰到一次。毛泽东出门没有通知警卫处，汪东兴不知道。等他发现，赶快叫李宁他们找去。那时已经解放有一段

时间，警卫经验有了一套。公安局的外线大队和汪东兴联系密切，一有临时路线任务，整个公安局的力量全部投入。

李宁说：“不是吹牛，中央的5大书记，不管他们突然上哪去，不告诉具体地点也能找到，摸到规律了嘛。”

所以，李宁立即往香山方向找，到西四碰上了，毛泽东乖乖地被警卫送回了中南海。

建国初期，毛泽东说走就走，带上一两个贴身警卫，就上路了。到了目的地，贴身警卫马上打电话。刚进城，电话网还不那么遍布，就在附近乱借个电话，反正有代号。那时，毛泽东的代号是1号，依次排下去，只要说几号出来了，警卫马上明白，立即布置路线警卫。

那次，毛泽东突然去看他的老师徐特立，大概是堂子胡同。他自己去的。等随身警卫一到，才现往家里打电话通知。家里的警卫们赶紧跑，按规定对好位置，个人站个人的地方，摆好路线警卫。

这样的临时处置不是一次两次，还常常在半夜。毛泽东常常在夜里12点左右出门，交通警一接通知，马上起床跟踪警卫。

进入北平后，毛泽东感觉太受约束了。而作为警卫，希望被警卫者老实呆在家里，不东走西走，放上死哨，就好保护多了。

毛泽东在一次散步中对警卫说：“我是个没有自由的人，希望你们不要把我锁在柜子里。”

他还是延安的习惯，什么也不怕。警卫远了，他不言语；跟近了，不行。警卫一般都在十来米以外。但北京毕竟是北京，警卫怕呀。

那是1954年，毛泽东去了卢沟桥。

也是，到了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卢沟桥，不走上一趟无论如何是个遗憾。不过，卢沟桥正在修理，无疑有危险系数。李树槐想拦，又不敢。你越说危险毛泽东越要试一试，劝阻不成了激将法了吗？

李树槐对营教导员翟白元说：“你去劝一劝主席。”李树槐知道翟白元从延安起就是毛泽东的警卫战士，与毛泽东熟，也能摸准毛泽东的心理。

翟白元想了一下，答应下来。

“主席，您过卢沟桥去看，行。但是，赶马车的从对面就过不来了。”

“哦，为什么？”毛泽东问。

“主席，大家都认识您，一围住，不就影响交通吗？”

“那就算了，到火车道那边看看。”

毛泽东果然没有过卢沟桥。

1950年的夏天，毛泽东约警卫一起在中海划船。汪东兴也赶来了。毛泽东和汪东兴在一条船上，警卫在另一条船上。

毛泽东看警卫的船都快碰上他的船了，就笑着说：“怎么？你们怕我掉到水里，好下水捞我吧？放心，我掉不下去。就是掉下去，也用不着你们打捞我，说不定还要我打捞你们呢。”

大家全嘻嘻地笑起来。

距这次划船一年以前，毛泽东曾去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划过一次船。那次，让群众给围上了。

这时，警卫处长汪东兴一边叫警卫迅速把毛泽东护送到船上，一边对司机周西林说：“老周，你把汽车开到十七孔桥，我们和毛主席从那上车。”

没想到，昆明湖上的船也围了上来，谁也不走，根本到不了十七孔桥，汪东兴只好叫毛泽东在玉花翠庄上了岸。好不容易打开通道，让毛泽东出了颐和园东门上了汽车。

毛泽东坐进汽车后，却没有了司机老周。原来，周西林看汽车开不到十七孔桥，只好一个人去接毛主席。

这时，人山人海又涌到颐和园东门，再不走，只好望洋兴叹了。

汪东兴叫人去把同行的汽车追回来，好在人群汹涌，汽车开不快。叫回另一辆汽车，让毛泽东坐上去缓缓开走了。

那次一共去了三辆车，还有一辆是毛泽东从西柏坡开到北平的中吉普，是警卫班战士坐的。偏偏司机孙长金看毛泽东到了，跑到十七孔桥去叫周西林，也不在。阎长林急了。毛泽东前面已走，没有警卫跟随，路上发生问题怎么办？好在他在西柏坡跟周西林学过开车，刚发动，孙长金回来了。他没找到周西林，就由他一路追上毛泽东的车。

毛泽东离开颐和园后，周西林等一阵没见人返回颐和园东门，发现三辆车走了两辆，只有自己给毛泽东开的汽车停在这里，心里好像犯了多大错一样。

一到，他就去找毛泽东承认错误。

毛泽东说：“我这不是很好地回来了吗？不怨你，这只是个误会，你也是好意，不是故意耽误的。肚子饿了吧？快去吃饭。”

按说，新中国的警卫力量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是薄弱的。但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暗杀事件，连美国也连连夸奖中国的警卫创造了世界奇迹。

（责任编辑：刘家驹）



▲大邱庄企业(集团)董事长禹作敏

我每次踏进大邱庄都要大吃一惊,30多米宽的柏油马路贯通全村,二百多个工厂分布在村庄的西北侧,十几个产值上亿元的工厂在东侧拔地而起;风格各异的“人才楼”座落在村西南的幽静大院;职工宿舍、办公大楼、香港街、科研大楼、职工医院……,一幢幢气派的现代化建筑分列在南北马路两侧,每家每户每个企业的大门上都贴着4个大字:“小平您好”。一位外国记者曾说:“这简直不像个村庄,倒像是个旅游点,又像是个对别人进行直接教育的课堂。”

大邱庄发展的秘密,照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党的富民政策+禹作敏+机遇。”照禹作敏的话是:“借助于体制改革产生的威力,经营带来的效力,观念更新形成的动力。”照社会上一些人的说法:“别人不敢干的时候,他们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

# 四访大邱庄

· 永革 ·

## 禹作敏的“皇上梦”

1983年秋天,为大邱庄致富忙碌操劳的禹作敏几天吃不下东西,睡不好觉,解不下大便,在家里躺了一星期。后来村民们硬把他拉到天津市一家医院住院治疗。

禹作敏并不知道他住的竟是高干病房,里边已经有一位病人。老大禹绍国知道他爱吃螃蟹,住院当天,就从市场上买了10斤螃蟹,想让村里这几位送他父亲进城的叔叔伯伯陪着尝个鲜。同室的病人大概发现农民竟然和自己同住一个高干病房,心里十分不快,又看见他们如此“奢侈”,便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你在农村干什么?”

“农工商总支书记,就是过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诚恳地作了回答,并热情地递过一支“中华牌”香烟。这位病友像怕染上艾滋病似的,一个劲儿地摆手拒绝,眼睛边盯着香烟,边以嘲弄的口吻说:“这么说你还是个土皇上呀!”

禹作敏噌地从床上坐起来,但他立即恢复了平静。不软不硬地甩出一句:“土皇上去掉土字就是皇上!”并反问他,“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百多块。”“我的工资顶你好几倍!”这位病友听后大吃一惊。这还了得!虽说中央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农民的收入竟然赶上了国家主席,这太不合理了。他立即警觉而严肃地问:“中央关于整党的九条决定你学习了没?”

“学了,整党的头一条任务就是要统一思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中央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我响应号召,富了;不光我富了,全村人都富了。村里有个叫马德良,承包了137亩地,一年下来拿了16500元工资和奖金,顶我俩还拐弯。今后我也要富上加富。”

这位瞪得眼发红的病友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几天后住进这个病室的某报社一位副总编辑。不久，一份告禹作敏“以土皇帝自居”的“内参”送到天津市委。后由于查核“属实”，禹作敏的大名在已评定的“天津市劳动模范”的名单上消失了。

## “倒三七”的魅力

1979年，大邱庄的生产结构做了大幅度调整，4800多亩地由1200人耕种先后减少到500人、300人耕种。剩余的几百人怎么办？党支部决定兵分几路外出找活干。

挖虾坑是一项较大的与外商合资的工程，天津静海县的几十个大队的民工投入这项工程。县里规定，每个农工收入要三七开，七成归集体，三成归个人。开工没有多长时间，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几天功夫剩下的不到40%。干部回村里轰也轰不回来，留在工地上的也是出工不出活。这是为什么？禹作敏深入了解后，算了一笔帐：土方分难方、易方、干方和湿方四种。每方平均5元钱，一个民工干一天只能出一方土，扣除归集体的七成，只



▲1992年建的“香港街”

能拿到一块五毛钱。干这种重活，光是粮食钱就要花去一元多，还不算菜钱和烟钱。当了几十年农村干部的禹作敏深知，活是民工干的，苦是他们受的，假如他们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个人不得利，集体又何来增加收入？禹作敏决心豁出去，不顾县里规定的章程，来了个“倒三七”，大头归个人，小头归集体。

决定一宣布，人流立即倒流，想走的留下来了；从工地上溜回去的跑回来了；没有上过工地的，也争着要来，工效更是连续翻番，从每天一人一方土，增加到两方，三方，四方，最多的能挖五方。水涨船高，

集体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工程结束，大邱庄扛回一面锦旗。

从这件事禹作敏悟出了一个道理：“责任落到人，政策连到心，黄土变成金。”

## 禹书记的 妇女解放观

1975年挖沟改土的时候，秋庄稼一收，禹作敏便把全村男女老少带到老台田地里抡大镢，抬大筐，连他那年逾古稀的老母亲也不例外。可是当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劳动力奇缺要从外村外乡输入劳力的时候，他却允许大邱庄的已婚妇女离开工作岗位回家操持家务，这又惹得社会上—阵惊呼：“大邱庄的妇女又围着锅台转啦，照这样能实现妇女解放吗？”为了印证这一说法，我在大邱庄专门走访了一个普通家庭，推门进屋，只见三间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女主人正在看电视，对我提到的问题，她说：“过去俺们妇女不管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全都下地干活，跟男人一样抬大筐。好容易熬到收工回家，男人们往炕上一躺，俺们妇女还得做饭，伺候公婆孩子，喂鸡喂猪，洗洗缝缝。现在男人挣得多了，厂里时间安排得紧，家里没人忙家务还真不行。”



▲大邱庄的豪华车——奔驰560



禹作敏接待完香港记者，来到一楼会议室谈了他对妇女走回家庭的想法：“怎么看大邱庄妇女问题，我的态度和做法是，实事求是。妇女解放的理论我没研究，至于说俺们这儿妇女就业的人数少了，妇女解放程度就低了，这种说法我不大赞同。十多年前，妇女倒是和男人一样下地抬大筐，算是和男人平等了，可回到家里还得接着干，这实际上平等吗？不光大邱庄，就是全社会目前的经济力量也还达不到家庭劳务社会化。我们设想让妇女实行弹性工作制，既能参加社会劳动，又能料理好家务、教育好孩子，但是将这变为现实，需要时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

## 亲儿子当官记

禹作敏 24 岁的小儿子禹少政当上了大邱庄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对这一点，外界非议不少。为此，我专访了企业（集团）公司副经理、当过兵的李凤庄。

大邱庄劳动人口 1500 人。由于历史的原因，知识分子不多。因此，在使用干部上就不可能像大城市、大机关那样上不沾亲下不带故的。怎么办呢？禹作敏的态度是，用人不避亲，用亲必用贤。只要不是贤，别说是自己的亲侄子，就是亲儿子也不放过。禹作敏的侄子禹绍通是个高中生，禹作敏让他负责砖厂会计工作。当禹作敏发现了他的贪污行为后当即宣布停职待查。后因绍通一时想不通卧轨自杀了。禹作敏恨他不走正道，大邱庄损失了一个派得上用场的知识青年。对禹少政，他教育很严，把少政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一名大学生，并把他放到风口浪尖上摔打。禹少政第一次当经理是 1987 年。大邱庄在天津市服装街开设的“自选商场”，因招聘了一批社会上的闲杂人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征与禹作敏交谈

员，经营乱了套，禹作敏派李凤庄去清查了一冬天。禹作敏点将让 19 岁的少政去当经理。少政上任后经受了许多磨难，顶住了流氓团伙的算计，重新考核、挑选了招聘人员，大刀阔斧地解聘了一批，重新建立了一套承包制度和赏罚分明的责任制规章制度，把商场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很快处理掉了价值 100 多万元的积压货物，甩掉了包袱，当年还扭亏为盈，获利 100 万元。

## 富裕后的苦恼

集体化的大生产改变了大邱庄农民的经济生活，但是，世代小农经济铸就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仍然束缚着大邱庄农民的头脑。虽然家家户户在银行里都有数目不小的存款，可是不少退休老人仍然戴着脏得发亮的瓜皮帽，穿着沾满尘土的破衣裳，东一伙西一堆地蹲在街头墙角下棋、晒太阳，连收音机、电视机也会舍不得买，哪知什么天下大事。对往日“头痛脑热喝碗面汤”就知足的大邱庄人来说，现在的生活就是进了天堂。

“要告别贫穷必须告别愚昧，穿衣戴帽里隐藏着农民的旧意识。”于是他采取了三条措施：提倡老年人穿新衣，干部和中青年穿西服，专门请天津百货大楼裁缝按人量衣做

了 1600 套西服，清理回收破旧老式家具，现在家家户户普及电视和煤气，组织老人外出旅游，开阔眼界。“其实，要真正告别贫穷，还需治本。从国外回来我弄明白了，致富不是唯一的目的，提高农民的文化教养，才是件最根本的事。要给当代人留财富，给后代人留才能，我现在说给全村人听的，就是这话。”禹作敏激动地说。

我去过 4 趟大邱庄，明显地感到它每天都在变。它向社会发出了聘请“三个一千名”，即聘请 1000 名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聘请 1000 名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为了搞合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交 1000 名华侨和外国朋友。还有一个 1000 名的计划，禹作敏还没向社会公开。但他告诉了我：那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向外国派出 1000 名留学人员，娶回外国老婆，到大邱庄扎根，这叫改变人种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他呼吁有关方面能开绿灯。

的确，大邱庄是中国首富村，年产值 18 亿，今年跨进 34 亿，这在全国同等村中找不出第二家，它比邻村也至少超前半个多世纪。但今后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企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严重污染，本村富有与邻村的反差，民工增多带来的种种问题……

（责任编辑：刘家驹）

# 奕訢

## 在晚清政坛三起三落

· 杨益茂 ·

奕訢是晚清政坛上具有重大作用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关键人物。自1853年至1898年，他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其中他与慈禧相互利用又互相倾轧的政争，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晚清政局及最高决策，颇为时人所瞩目。近年来，反映这一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日见增多，传奇乃至浪漫色彩亦日见增厚，甚至编造奕訢与慈禧的风流韵事作为展现这一题材的重要线索，呈现史实与传闻互见、虚构与真实并存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徵诸史实，予以简要介绍。

奕訢(1833—1898年)，是道光帝第6子，咸丰帝奕詝的异母弟。他聪慧、伶俐、遇事果敢，深受父皇宠爱，曾有过觊觎帝位之念。道光帝晚年，决定立年长的奕訢为皇太子，同时，破例封奕訢为亲王。咸丰继位后，在亲王前面加了一个“恭”字，希望奕訢恭谨服从，辅助自己治理天下。从此，兄弟变成了君臣。在封建专制主义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奕訢，承认现实，尽可能揣摩、迎合咸丰的旨意，以取得新帝的欢心。

咸丰帝继位不久，奕訢开始在政坛初露头角。1853年，咸丰帝让奕訢以亲王领袖军机，成为清廷中枢机构的首要人物。面对“内忧外患”，奕訢尽心辅弼，使咸丰很快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的北伐，粉碎了英法美进行的第一次“修约”讹诈。初登政坛既积累经验，

也显示了才干。但好景不长。1855年8月，奕訢生母去世。奕訢请奕詝感念对其鞠育之恩(奕詝早年丧母，由奕訢生母抚育成人)，晋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而且不待咸丰帝明确答复，即传旨执行，为此，触犯了咸丰帝。待丧仪过后，奕訢即被咸丰帝逐出军机处，罢黜一切职务，令其回上书房读书，从而结束了第一次政坛生涯。

奕訢第二次被起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之中。1858年，面对英法联军猖狂进攻，刚刚被授予蒙古都统的奕訢，力主抵抗，建议在通州设重兵；在运河沉船泄水，防止英法兵舰内驶；并密令两广总督设法夺回广州，牵制英法兵力。但腐朽的清廷并没有阻止住侵略者的进攻。1860年，英法侵略军进入津京地区，咸丰帝仓皇出逃，奕訢被任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办理和局。这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更严峻的考验。

当时的北京，已成了“夷人”世界。英法侵略者肆意烧杀抢掠，焚毁了以圆明园为中心的三山五园，扬言再不满足他们的掠夺要求，就要炮轰皇宫，毁掉北京城。阴险、狡诈的俄国使节则打扮成“友好”的调停者。奕訢被迫全面接受侵略者要求，由主战转向主和，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并得到咸丰帝批准。这些条约使中国被割掉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蒙受丧失海关大权，偿付巨额赔款及经济、文

化等多方面的巨大损失。对此，奕訢曾感到羞愧、愤懑，但又为侵略者不推翻爱新觉罗氏统治而自我安慰。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洪流猛烈冲击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权衡利弊，奕訢很快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新方针。他力主对侵略者“外敦信睦”，“隐示羁縻”，并在京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对外办事机构。同时，又提出以学习西方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自强”口号，力图使衰微的清王朝有所振兴。

“议和”成功与自强方针的提出，使奕訢声望大增，并成为晚清洋务派的首领，在统治集团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861年8月22日，沉溺声色的咸丰帝去世。遗诏立他的独生子载淳为皇太子，同时任命生前信任的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尽力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所颁谕旨要钤盖“御赏”(由慈安太后掌握)和“同道堂”(由载淳，实为慈禧掌握)两方印章，即要由两宫皇太后批准才为有效。这实际是顾命与垂帘兼而有之的体制。这种体制使贵为亲王、声望日隆的奕訢难以忍受。肃顺等人又妄图独揽大权，自行其是，使两宫太后，特别是权势欲极强的慈禧极为恼怒。双方在热河行宫势同水火。慈禧苦于缺乏军政实力，难以制服肃顺等人，奕訢遂借赴热河奔丧之机与两宫太后密谋政变。在热河，奕訢隐忍不发，对肃顺等人谦卑自持、



慈禧

光绪



宣统



袁世凯



孙庆

奕譞

李鸿章

恭礼有加。回京后即联络在京诸王及大臣全面部署，决计尽翻朝局，推翻顺命制度。11月2日，即两宫太后到京的第二天，奕訢等人鼎力支持慈禧、慈安，一举发动“辛酉政变”，诛杀肃顺、载垣、端华，确立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訢为议政王辅政的新体制。两宫太后听政，主要是慈禧决策，因而奕訢与慈禧开始成为晚清政坛上的核心人物。

某些影视作品往往把奕訢辅佐慈禧涂抹上浪漫色彩，用丰富的想象力渲染二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微诸史籍，实为无稽之谈。实际上，奕訢与慈禧只是政治联盟，各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奕訢要靠慈禧的支持，改变肃顺专权的局面，推行自己的主张；慈禧则要靠奕訢的实力与才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政变之初，慈禧羽翼未丰，经验不足，不得不全面依赖奕訢。她给奕訢以“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等一系列头衔，赏食亲王双俸，并把奕訢的女儿接入宫中抚养，封为固伦公主，极尽拉拢之能事。奕訢则直言无讳，竭力建立议政王的“功业”。对外，他利用刚刚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逐项落实不平等条约，借以维持和局，以免惹怒洋人；对内，则更加大胆重用汉族地主武装，放手镇压人民革命。他给镇压太平军前线的湘军主帅曾国藩以节制四省军务全权，不久又在湘军力量突兀上升之机，提拔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等各统一军，相互独立，并允许地方官

员与侵略者勾结，“借师助剿”。在奕訢等人调度下，湘军于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解除了清廷“心腹之害”。更为重要的是，奕訢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大力推行“自强”新政。他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引进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推行新式练兵；在全国陆续开办军事工业，仿制西洋枪炮、船舰；开设同文馆及一系列近代军事、科技学校，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力主购置军舰、修筑炮台、加强海防。他又在“求富”口号下，支持兴办民用工业，使近代运输、电报、开矿、纺织等企业相继开办。这些近代事业，给愚昧、陈腐的旧中国带来了生气。封建统治者将其吹捧为“中兴”大业，奕訢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然而，晚清时期的近代化笼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阴影之中。中国“自强”、“求富”不仅引起西方列强的妒嫉与反对，还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与仇视。最高统治者慈禧，文化素质不高，只顾抓个人权力，国家近代化在她头脑中并不占什么位置。她需要奕訢时，既支持他与他倡导的“自强”事业，并时时加以防范。当她羽翼丰满，积累了经验，有能力驾驭政权时，就采取措施，一步步削弱奕訢实力，打击奕訢抬高自己。同治四年，她利用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的奏折，宣布奕訢专擅跋扈，亲自起草了错字连篇的手谕，免去奕訢一切职务。后因在廷诸王大臣的苦苦劝谏下，才收回成命。但奕訢从此失去了议政

王头衔。此后，奕訢颇知收敛，言行日趋谨慎，但也对慈禧做出过反击，诸如：针对慈禧镇压太平天国后，不顾国计民生，大兴土木、大治园林的要求，奕訢常“哦哦”连声而并不行动；又如，同治七年奕訢与慈安太后支持巡抚丁宝楨在山东捕杀了慈禧的宠监安德海，结果，只能是双方矛盾更加尖锐。其后，尽管奕訢益发谨慎、小心，锐气日消，然而慈禧却步步紧逼。她使清流派不断对奕訢进行攻击，使满朝文武知道只有慈禧才是这个王朝的主宰。光绪帝即位后，慈禧开始大力扶植光绪生父奕譞与奕訢对立。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死后，慈禧专权更加肆无忌惮。光绪十年，借满清军在北宁溃败之机，将主持中枢的奕訢革职，并将以他为首的军机处成员全部驱逐。奕訢再次成为闲散亲王。十年之后，奕訢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被第三次起用。然而战事败局已定，奕訢既无力回天，也日趋保守，难以再有所作为。

作为近支亲王，奕訢曾为清皇室的长治久安奋力开拓，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化贡献了力量；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核心成员，他对西方列强与封建专制势力的限制、阻挠与反对，又无可奈何。奕訢的悲剧，正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清统治集团的腐败与衰落。

(责任编辑：仲文)

(杨益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

她，赛珍珠：  
“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

——理查德·尼克松



## 赛珍珠的中国心

刘宏伟

**编者按：**赛珍珠（1892—1973）本名波尔·赛登斯区克·布克，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是她父亲为她起的中国名字。她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出生十个月后，便随当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中国镇江。从此，她与中国人的朝夕相处，自幼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她在中国完成了小学、中学教育，回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后，又回到中国。1922年到南京大学任教。直到1935年才离开中国。

赛珍珠是从写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开始她的文学生涯的。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地》获1932年普利策奖，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

赛珍珠回到美国后，一直从事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并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工作。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因她对中国的友好，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攻击。1949年，我党秘密党员王莹、谢和赓受命赴美国做抗日宣传及统战工作，被美国政府无理逮捕，赛珍珠四处奔走营救，最终使他们获释回国。

1972年，尼克松曾有意聘请她为访华团成员，但她执意要以民间的形式访问中国，便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签证。但是，她的申请因历史的原因未予获准。这使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刺激，从此一病不起，于第二年——1973年3月6日逝世。临终之前，赛珍珠还在怀念着中国镇江的黑桥烧饼，嘱咐家人将她的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镇江的土地下……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入上海，国民政府匆匆迁都洛阳。南京城内一片恐慌，到处可见逃难的人群。

赛珍珠和她的丈夫布克正各自忙着写作自己的新书。他刚写《中国农村土地利用》，她的《分家》、《儿子》已经脱稿，正飘洋过海地走向约翰·戴公司。她的邻居已经回国了！这一片房子已经空空荡荡。她的家像是一个小小的孤岛。布克要继续写书，离不开中国。她要陪伴着他。哪怕租界搬得空无一人，他们也要咬着牙住下来。况且时局已渐趋明朗。美国政府小心翼翼，迄今没有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为的是避免美国独自卷入这场战争。所以，租界暂时平安无事。

她已是40岁了。整天把自己和打字机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交际场合很少见到她的身影。突然有一天许多人不请自来。他们热情而陌生。许多人身上挂着带闪光灯的照相机。这些男男女女神气活现。

他们打量的目光弄得她满脸羞红。

布克从外面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举起一封电报。

“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打来的！”布克兴高采烈。

“赛珍珠女士，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您的《大地》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奖金和证书随后寄出。衷心地祝贺您！”

普利策文学奖！赛珍珠把电报紧紧贴在胸口。她清楚地知道这张纸片意味着什么。这位大名鼎鼎的普利策先生！是他开创了美国报纸的新闻事业，又用一生积攒的财富创办了这个旨在鼓励所有优秀作家的普利策奖。她，从中国的田野上艰难起步，坚定不移地长途跋涉，今天，它标志着她的《大地》已正式走进了美国的文学殿堂。

她，疲惫而幸福地落泪了。

“赛珍珠女士，您在中国生活了40年，您认为中国人是怎样的一种人？”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无法说得清。他们既不是这样的也不是那样的，就只是人而已，如同我们一样的人。”

“看来，您很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吗？”

“是的，我谈论他们就如同谈论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也许有毛病，有缺点；但，正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的生活已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在我眼中显得亲切自然，像我不可能忘却的家人一样。这，可以说是一种血缘般的亲近关系。”

“这种血缘般的亲近感，是不是产生于这样一种因素：因为你是喝着中国阿妈的奶汁长大的？”

“是的。这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吧。……”赛珍珠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电报和信件雪片般地飞来。怎么回得了这么多的信呢！这些又热心又好奇的读者们！在他们眼中她



全家合影。前排右起母亲卡洛琳，妹妹玛凯。父亲赛兆祥，赛珍珠，后排王妈妈。



一九六四年，访问韩国在釜山受到热烈欢迎。



是个陌生而神奇的女人。这个神奇的女人住了一个神奇而遥远的国度里。

赛珍珠决定动手写《自传随笔》。她将一并回答读者们所有问题：

……我厌恶所有把中国人定成为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我最大的愿望是尽我的所能把中国如实地写在我的书里。

……我希望不是我本人而是我的作品被人们知道。在这方面，中国人是非常理智的。他们认为，艺术家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而对艺术家的个人品格不感兴趣。

夏天，赛珍珠得到了邀请。沃尔希先生出面请她回美国访问。布克决定与她同行。

美国张开手臂欢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赛珍珠一上岸就被许多读者认了出来。她的照片曾经出现在许多报纸上。热烈的拥抱！持续不断的签名！人们高喊着她的名字和她的《大地》。

## 二

赛珍珠凝视着1932年深秋的纽约。这座饱经殖民战争磨难的城市！光它的名字就是一部殖民者的掠夺史——在荷兰人手中它被叫做阿姆斯特丹。因为荷兰首都就叫阿姆斯特丹。在英国人手中它被改叫纽约克城。因为国王把这片土地赐给弟弟约克公爵作为新领地。现在，她，站在了它面前。这里马上要发生某种事情，这座城市将要在1932年让赛珍珠终生铭记。

她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花园草坪上。面前摆着一排排堆满食物的长条桌。人们围桌而坐。纽约午餐会！1500名长老会会员在此进行神学研讨；关于上帝在今天的存在；关

于来自非基督徒们的威胁……周围的人在侃侃而谈。突然，赛珍珠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一张脸。这位先生在谈论中国，谈论中国文化。他用着鄙视的口吻，不时伴以轻蔑的嘘嘘声：噢，那些古里古怪的方块字！噢，那些鬼鬼祟祟的神话传说！噢，那些可笑的长辫子男人和同样可笑的小脚女人们！噢……噢……

赛珍珠抓紧桌布的一角。她极力克制着自己。这里有一只酒杯、两只盘子、一把叉子和一把勺子……但是决不要扔在这张胖脸上！可这张无耻的嘴巴还在不停地、说、说、说……

哗啦！叮当——她站起身时碰翻了椅子和桌上的酒杯。这有什么！她没把桌布向这个人整个掀过去就已经很礼貌了！

整个草坪突然鸦雀无声。长老会会员们注视着这位呼吸急促、两眼发光的女同伙。

“请问先生，您认识中国的方块字吗？”

“不认识。为什么问这个？”

“那您一定没有读过中国书喽？”

“当然。可是，这有什么？”

“请问您对中国的哪些了解是

怎么来的呢？”

“我懂英文，女士！我读过报纸上那些关于中国的报道。”

“那些胡说八道的报道吗？它们是一伙跟你一样对中国持有偏见的人写的！”

赛珍珠开始了事先毫无准备的长篇演讲。难道还用准备吗？她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她认识了2万个中国方块字！她阅读和研究了几乎全部的中国古代小说和经书！……她看见许多张嘴巴停止了咀嚼惊讶地大张着。这情景使她亢奋。她恨不得把面前的所有餐具统统塞进这些无知而愚蠢的黑洞里。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无知而愚蠢的嘴巴，基督精神成为非基督徒们嘲笑和怀疑的对象。

“她疯了吗？”

“这个女人已经变成了异教徒！”

“快让她闭嘴！闭嘴！”

“滚出去，你这个撒旦！”

“上帝会惩罚你的，女魔鬼！”

“把她从传教士队伍里开除出去！”

“……”

面对着惊慌和愤怒，她反倒平静下来。她带着几丝冷笑结束她的

演讲。“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经得起最严格的检查。另外，我要告诉诸位：我的父母从小就向我进行了最良好的基督教教育，我坚信：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她从侍者端着的托盘中拿起一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她放下杯子扬长而去。她，脚下生风，觉得自己此时极像一位来去无阻挡的中国女侠。

这天夜里，她的打字机响了很久很久。《儿子》暂时顾不上写了。她的打字机上出现了这样一行标题：

“国外传教部有这种情况吗？”

午餐会上的演说在打字机上继续着。她已经看见上帝在天国里向她赞许地点着头。噢，感谢上帝！

《哈泼》杂志，1933年1月号。赛珍珠的文章发表了。那些原教旨主义者，立即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性的演说和文章。赛珍珠无所畏惧！啊！这些自以为是的蠢家伙！那天要是把所有的酒杯都砸在他们的脸上该多棒！省得他们现在还在哼个不停。

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同学邀请她去共进晚餐。她本以为会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晚上——坐在一群中国学生中间，说着中国话，吃着中国菜，也许，他们会一起唱上一支中国歌！然而，她听到了：

“赛珍珠女士，您的第一本成功的小说为什么不写我们这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中国人，却偏偏要写那些中国苦力呢？”

“他们代表不了中国人民。”

她惊愕地瞪大眼睛。没有料到，她写的那些东西，连中国人都反对呢……

她痛心皱紧眉头：“但是，你说的那些中国苦力，他们是中国最广大的普通民众。”

“是的，他们可能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肯定不能代表中国人

民。”

“如果任何国家的大多数人不能代表这个国家，那么，谁能代表呢？”

“当然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这位自命不凡的中国人！赛珍珠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知道了他的名字。此人竟是一位中国教授：江亢虎。她看见他的名字写在读者来信的栏目中。

她连夜给报纸写答复文章。沃尔希先生陪她亲自把稿件送到《纽约时报》社。

……在我童年的家里，我们的花匠是一个大家都尊重的农民，我们从不允许有人称他为“苦力”……我们从不称保姆为“老妈子”，而总称“奶妈”。我们像对自己母亲那样真心地爱她、听她的话。她是一个乡下妇女，我不知道她的生活是否“总是不可思议”，也不知道她的一般知识是否“有限”，对我来说，她是我的奶妈。……

1931年1月15日，《纽约时报》全文登出赛珍珠的反驳文章。

1931年1月16日，《纽约时报》对江亢虎与赛珍珠的这场争论做出了评论。

……西方世界并不相信中国人民看上去就像他们的老祖宗画像上的那样。可是江教授却希望我们把

这些画像当作天朝的真正代表加以接受。布克夫人已使我们看到和欣赏到正在遭受磨难的人民的耐心。俭朴、勤劳和他们的不屈不挠的、完美的幽默感，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正想从世界人民的眼皮下面把这些家庭悄悄地掩藏起来。

1933年3月7日，《纽约时报》又发了刚从中国访问回来的电影明星威尔·罗杰斯的文章：

不消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会读书就一定读过赛珍珠写的中国的杰作《大地》。它不仅是写一个从未写过的民族的伟大作品，而且是我们这代人所写的最好的作品。甚至在中国，欧洲人和中国人都说这部作品是真实的，很少有作品写另一个民族而又被他们说写得好的。……读读这本书，它会使得你们不再胡闹，使你们了解到中国的一切。

赛珍珠在以后众多的鲜花和掌声中，始终对《纽约时报》心存感激。

### 三

美国在等待。1933年3月4日。一个寒冷的星期六。国会山上聚集着一大群人。他们竖起衣领挡住冷风，静静地守候在圆形大厅前。

▷作者和谢和康交谈



面对大萧条人们无可奈何。信贷机构逐渐瘫痪，全国所有的银行几乎都关闭了。胡佛总统惊呼，“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但是人们要活下去！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位缓缓走来的男人身上。他，没穿大衣，没戴帽子，冷风掀动着他的衣角。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步履沉缓地走向高高的白色主席台。一根根希腊式圆柱上装饰着常青藤和旗帜。他站在圆柱之间向整个美国发表就职演说。骨节粗大的手指轻轻捏住一迭黄色的稿纸。他，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这是一个民族缺身的日子。我确信，我的同胞们期待着我在就任总统时，能以我国当前形势所迫切需要的坦率和决心对他们讲话。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我们不必畏缩，不敢正视我国今天的情况。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像它曾经忍受过的那样忍受下去，它将得到复兴，它将得到繁荣。

全体美国人在这一时刻默默无声。

所以，首先让我表示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必须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

“啊，这是索洛的话！”赛珍珠轻呼。她和布克坐在旅馆的大厅里。一部巨大的收音机放在大厅中间。为了听新任总统的就职演说，这家旅馆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来到了大厅里。

“索洛？谁是索洛？”布克轻声问。

索洛嘛，一位美国作家，一位自然主义者，一位生活在19世纪却对20世纪颇有影响的人。她枕边就有一本索洛的著作。上面写着她最欣赏的一句格言：“最可畏者莫过于畏惧。”现在新任总统也喜欢这句格言。

大厅里的人们神情显得有点儿

激动了。因为新任总统开始讲到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问题。最后，总统用一声轻松而亲切的笑声，结束了他的演说。这伟大而令人激动的笑声，后来在许多时候有力地鼓舞着美国人民。

“最可畏者莫过于畏惧！”赛珍珠挥着拳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她刚刚又遇到了麻烦。这麻烦其实是纽约午餐会后斗争的继续。教会里那些对她耿耿于怀的人，那些原教旨主义派的领袖们，他们不能容忍她竟到了如此地步，联名向国外传教部提出控告，要求以异端的罪名将她从传教士队伍中开除出去。

这份控告书广为散发，现在，她的手中就有一份。她知道在这些人眼里她已是古怪恐怖的六角兽。他们恨不能用猎枪把她一枪打死，然后喝她血，吃她的肉！

“现在是一个献身的日子……”她含着眼泪重复着罗斯福总统的话，她决不放弃阵地！《四海之内皆兄弟》进展顺利……她还怕什么呢？她还年轻！41岁。女人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沃尔希先生慷慨无私地支持着她。这个男人将在她的生命中留下永远难忘的一页！她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出现在美国文坛上的。当所有的人都还远离她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来到她身边的人……

5月的一个傍晚，赛珍珠走进国外传教部办公室，递交了她的辞职书和一份简要的声明。

……

我既不改变也不扩大过去的报告，而且我并不打算成为一个神学论争的殉教者，……

她决定以写中国题材为永远的写作内容。在这片天地里，她是女王！谁也无法侵占她的这个王国。

当她那天转身离去时，没有一个人看出，这个被迫辞职的女人身上聚集起了多么大的能量。

沃尔希先生在门外等着她，像

一个至亲至诚的同胞兄长，整整一个晚上，他们两人都呆在一起。

1934年，赛珍珠和农学家布克离异。1935年回到美国后，便成了沃尔希夫人。

#### 四

斯德哥尔摩的秋天不再金黄一片。那里已是一片笼罩天地间的战争阴云！1938年是慕尼黑会议之年。吞并奥地利的希特勒终于表示取消对捷克苏台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领土要求。人们在最初的惊慌之后松了一口气。欧洲暂时蜷缩在希特勒假意的和平承诺后面。

一年一度的各项诺贝尔奖颁奖事宜在逐项展开。混乱与争执持续不断。那最令人瞩目的和平奖！英国的张伯伦，法国的达拉弟，捷克的贝奈斯，他们各自拥有强大的助选阵容。幸亏推荐信没有及时寄到，否则诺贝尔和平奖将因此而受到无情的嘲弄。因为“和平的救星”张伯伦为欧洲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希特勒的骗局。

争执也弥漫在文学奖的整个颁发过程，捷克作家恰佩克拥有为数可观的支持者。但若颁奖给他，便等于褒扬了被希特勒践踏的捷克。颁奖委员会的办公桌上摆放着近30名候选人的推荐信。他们大名鼎鼎且成绩斐然。芬兰的西佩伦，丹麦的延森，德国的海塞，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克罗齐，希腊诗人拉马斯，英国小说家A·赫胥黎……但是瑞典学院“不愿过度干预欧洲事务，或触怒世界当权人物”，而这30名作家中的任何一位，似乎都会带来令人烦恼的纠纷。

眼看时间将到最后期限，一切都还没有着落。斯德哥尔摩的秋天变得晦暗无光。最后一夜，文学奖委员会办公室的灯光亮了一个通宵。几乎就在天亮之前的那一刻，一



位瑞典学院院士不约而同提出了一个远在名单之外的名字：赛珍珠，尽管知道这个提名也许会引起某些风波，这位荷商美籍的名作家却可以使此次颁奖避免更大的麻烦，赛珍珠，她似乎是一个最理想的避难所。于是，评委们调来了赛珍珠的所有作品进行评价。《大地三部曲》，《流放》，《奋斗的天使》，《发妻及其他故事》，《母亲》。瑞典学院把赛珍珠所有作品静静摆放在各位评委先生面前。霍尔陶穆先生执笔写下了评析赛珍珠作品的研究报告。

我们之所以决定颁奖给赛珍珠女士，乃是“由于她对农村生活之丰富而生动的史诗式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杰作，如欲评价这位长老会远东传教士的女儿在文学上的成就，对两部以她父母为中心的传记不可略而不谈。那两部小说便是《放逐》和《奋斗的天使》。……”

这次的颁奖决定，要比以前许多次来得恰当些。

霍尔陶穆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不眠之夜。当决定把奖金颁发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赛珍珠女士当之无愧”时，消息传出，引起了世界各个角落的轰动。惊讶、愤怒、嫉妒、冷淡、赞许、欢呼一齐涌向斯德哥尔摩。

## 五

斯德哥尔摩的冬季暖意融融。美丽的梅拉伦湖静卧在城市的边缘。赛珍珠一下飞机便被这座城市迷住了。

她下榻的旅馆，房间里摆满了鲜花和贺辞。

幸好瑞典尚存自由。这个恪守中立的北欧小国，在世界战争的阴云下面我行我素。鲜花照样开放。一

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活动照样按时举行。

1938年12月12日，赛珍珠永生难忘的日子。步入颁奖会场大厅，她那身黑色的闪光绸晚礼服，华贵而端庄，丈夫沃尔希精心为她设计了这身行头。

一位穿戴讲究的中国青年站在她面前。

“赛珍珠女士，由于你对中国政府的恶意诋毁，我被授命拒绝参加你的授奖大会。请原谅我的立即离开。”

她轻蔑地望着这位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匆匆离去。她知道，这都是因为哥本哈根的那次采访！那天，有位记者问她对中国前途的看法。

“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和平的唯一希望。但是，蒋介石因为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

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至今仍然这么认为，她在中国生活了41年！她自信她的看法根本不是恶意诋毁而只是触怒了蒋先生罢了。

现在掌声已经响起。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走上讲台。“他是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先生。佩尔·哈尔斯特隆。”她被告知。佩尔先生用目光向赛珍珠致以敬意。

赛珍珠曾经讲过，她如何发现了她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本质与存在这一使命。她根本没有把这当作一种文学专业去从事，这使命是自然而然地落到她身上的。……

赛珍珠望着他，微微一笑。

……“是人民始终给予我最大的欢乐与兴趣，”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当中时，是中国人民给了我这些，人家问我，他们是什么样人，我答不出来。他们既非这样也非那样，他们就是人。我叙述他们跟我叙述自己的亲人一样。我跟他们太亲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太密切了。”……

噢！这是她在1932年写在自

传中的一段话。这些可敬的院士们！他们一定看过了那份自传。1932年，她还没有离开中国。

……她曾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与他们共度所有的兴衰变迁，共度丰收年景和饥荒年头，共度革命的流血动乱，共睹乌托邦的谬妄。她结交知识阶层，和民风古朴的农民交往，而这些农民在看见她之前几乎没有见过一个西方人的面孔。她经常处在极度危险之中，是一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外国人的外国人；一般说来，她的观点保持着深沉与亲切的人性。她以纯粹的客观性使生活充实了她的知识，给我们提供了使她名扬世界的农民史诗《大地》……

她惊愕而感动。他们竟全都知道了她的中国经历。她的中国情感……

现在，佩尔先生的音调明显提高：

今年的奖金授给赛珍珠女士是由于她的著名作品为人类的同情铺路，这种同情跨越了远远分开的种族边界；还由于她对人类理想的研究，这些研究体现了伟大和生动的写作技巧；瑞典学院感到这是与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憧憬未来的目标和谐一致的……

现在，我请你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瑞典学院授给你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

整个大厅掌声雷动。赛珍珠被掌声拥上台去。无数的闪光灯在持续不断闪亮！

她，光采熠熠，令人倾倒。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身穿黑色长礼服，那洁白的领结衬托着他的笑脸。她向他微微颌首。国王将一本大大的证书和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交到赛珍珠手上。那双白色的长手套使她的手看上去修长而典雅。她，接过了诺贝尔和瑞典国王的馈赠。这馈赠使她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女

人，不仅仅是因为那笔奖金本身的价值。

伯蒂尔·林布莱德走向话筒，这位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台长有着职业所赋予他的高瞻远瞩。

“赛珍珠女士，你在你的具有高超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中，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了解和重视，你通过你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大众中的个人，你给我们展示了家族的兴衰以及作为这些家族基础的土地。在这方面你教会我们认识那些思想感情的品性，正是它们把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地球上联系到一起，你给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心，随着技术发明的发展，地球上的各国人民相互吸引得更加接近，地球表面缩小了，以致东方和西方不再被几乎难以逾越的距离分隔开来；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这一现象的自然结果，民族特性的差异以及雄心互相冲突，形成了危险的间断，这时地球上的各国人民作为跨越地域和边界的个体，学会相互了解是极为重要的。当文学作品在这个方面取得成功时，它们必定是理想主义的，正像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所指出的那样。”

她的眼里涌满泪水。尊敬的天文台长先生！她断定他一定在天文观测镜中注视过中国。如同她用自己的眼睛注视过中国一样。她噙着泪水走向话筒：

“我无法表达出我对刚才所说的话和给予我奖金所感受到的全部感激之情。我代表我个人领奖，确信自己是接受了远远超过我在我的书中所能给予的东西。我只能希望，我今后要写的几本书将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今晚的感谢更有价值。确实，我只能按照我认为是颁发这一奖励本来所遵循的精神来领奖——比起已经做过的事来，这项奖励更看重未来。我想，今后我不论写什么，只

要想起今天，总会获益匪浅，深受鼓舞……”

一些记者向她鼓掌。她感激地点点头。她的英语流利动听！像她的中国话一样地道正宗。

那些熟悉的中国人面孔：王阿妈、孔先生、花匠老刘、王龙、阿兰、王农安、王虎、王源、王太太……他！徐志摩先生……她轻轻拭去涌出眼角的泪珠。

“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就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的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自由在今天比以往更是最宝贵的人类财富。……”

她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了全世界。赛珍珠此时是整个斯德哥尔摩的明星。她在今天面对全世界所作的演说。她只能选择中国小说作为演说内容。《水浒传》、《白蛇传》、《太平广记》、《教坊记》、《西厢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封神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野叟曝言》、《镜花缘》、《金瓶梅》……

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一部中国小说发展史渐渐拉开、成形。所有的听众都在这部历史面前肃然起敬。人们在凝神倾听。这个女人！这位美国女作家！她几乎是第一个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小说的人……

## 六

1942年秋天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王莹来到青山农场看望赛珍珠。

她紧紧握住了王莹女士的手。她发现她清丽动人，一位标准的东方美女。

林语堂先生已向她介绍过王莹女士的艺术生活。那是一位中国女

艺术家顽强不屈的奋斗史。他建议她们会面结交。她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她与她一见如故。王莹女士真诚坦率，向她讲叙了自己的身世。这位可怜复可敬的中国女性！童年丧母、后娘虐待、教会住读、做童养媳、逃离婆家、就读大学、投身进步戏剧电影事业、奔赴抗战前线，又到南洋各国义演……

赛珍珠早已热泪盈眶，她安排她秘书朗巴夫人做了速记。长长的3万多字的速记稿！她把整理好的速记稿交给王莹：

“你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动人的自传体小说。这份速记稿可以做你的写作大纲。你看怎么样？”

《宝姑》，王莹的脑海中闪过这个书名。她后来真的完成了这本自传体小说《宝姑》。

赛珍珠决定为王莹做点什么。现在，王莹女士是她的中国客人，她将为中国客人尽地主之谊。

“我要让整个美国都知道，你是中国的海伦赫斯！”

海伦赫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演员。这个时代的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她的芳名。

记者招待会！林语堂先生家中座无虚席。赛珍珠满怀激情讲叙着王莹的女士故事。一夜之间，王莹成了美国的新闻人物，中国爱国女明星，“中国的海伦赫斯”，王莹的故事在美国各地广为流传。王莹的照片和剧照跃然而上美国的许多报刊。

王莹将代表中国出席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赛珍珠为她润色演说稿。她们俩人在青山农场一遍遍地预习演说。《王莹传略》是她为她打印的宣传材料，赛珍珠将这份宣传材料散发到王莹将前去演讲的第一座大学和工厂。于是，到处都有崇敬的目光迎接这位中国女明星。

波托马克河潮湿的空气滋润着

人们的肌肤。这个夜晚令人沉醉。赛珍珠和王莹并肩走进白宫。穿过著名的白宫草坪，走进宽敞的主楼东大厅。今天晚上，王莹将在这里演出中国的街头戏，演唱中国抗日歌曲。赛珍珠亲自为她担任报幕。

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向她微笑。赛珍珠感激不尽，总统亲自批阅了她的那封推荐信。她在信中建议政府邀请王莹女士进白宫演出中国的抗日节目。似乎仅仅过了一夜，她和她已经站在了白宫明亮的灯光下面。

罗斯福总统举家光临！总统和蔼可亲，充满自信。这位集狮子与狐狸的品德于一身的人，是当代国际舞台上的英雄。罗斯福心境愉快，带着胜利的喜悦倾听中国的抗日歌曲。此时此刻，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战场上抗击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王莹身穿月白色的绣花旗袍。她，亭亭玉立，清秀脱俗。歌声响起来了，优美的中国民歌旋律！甜美真挚，整座大厅为之倾倒。王莹用流利的英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人们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回报这位中国的海伦赫斯。

埃莉诺·罗斯福夫人走上台来。总统夫人身材颀长，像总统一样和蔼可亲。她代表总统上台与她们合影留念。总统在台下坐在轮椅上向她们鼓掌微笑，几乎整套白宫班子都坐在台下，那位华莱士副总统及夫人！那些高级文武官员！那些各国驻美使节！他们像罗斯福总统一样鼓掌微笑……

白宫演出轰动了整个美国。报纸以显著版面刊登王莹的演出剧照，刊登她们与罗斯福夫人的合影。帕特公司专门为王莹灌录唱片。中国的抗日歌曲回响在美国的普通家庭里……

王莹在一系列的成功之中心怀感激之情。她回想起出国之前周恩来与她的谈话。周恩来本想让宋庆

龄写封信，向赛珍珠介绍她。只因行期匆忙未能拿到此信。但，周恩来向她谈起了赛珍珠的《大地》，谈起了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谈起了赛珍珠生活在中国的几十年。

“你要争取和她交朋友。她在美国声望很高，她可以帮助我们争取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她确信：赛珍珠女士仍然像从前那样热爱中国。

王莹成了青山农场的常客。赛珍珠盛情邀请王莹在学校放假期间到青山农场小住。当王莹被美国移民局非法迫害入狱时，赛珍珠四处为她奔走呼吁。她和她，一对不再分离的朋友。直到1955年11月22日早晨！一架飞机带走了王莹……王莹告别美国回中国去了。新中国的政府将她从美国移民局保释出来，赛珍珠前去送行，她望着王莹身上的伤痕痛心不已，无地自容。她为自己的祖国而羞愧！移民局的官员竟如此虐待她的中国朋友……她曾为她写过控告信。她被美国监狱中触目惊心的罪恶行径震怒了。《纽约时报》又一次帮助了赛珍珠。他们全文刊登了她的控告信。

## 七

现在，是1972年的春天。她已经在过一生中的第80个春天，她，年迈而忙碌：“东西方了解协会”。“欢迎回家——赛珍珠基金会”，那9个被她收养的儿女，那一本接一本出版的小说，还有她在等待重新踏上那一片国土！

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她看见了周恩来，她看见了！电视画面中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尼克松和周恩来站在公园里。那棵品种古老而高大的美国松！他俩一起把它栽进土里。但愿它在

中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她已经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递交了访华申请书，她勃勃地在青山农场等待着。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再次认真阅读了她的《大地三部曲》，并邀请她做访问团的成员。但她更愿意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回到中国。

整个美国都在注视着中国。《重新看待中国》。NBC。美国广播公司的热门专题节目。他们请她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她欣然同意为NBC在中国采访。

“我从未见过毛泽东，但我认识周恩来。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最近曾给他写信，期待5月间对他的访问。”

这是一次重归故里的旅行。难以表述的激动之情！一位老人将要去寻访自己逝去的青春和岁月……中国！镇江！她80岁的生日将在中国度过。无数的中国朋友将在她的生日之夜重新会面。她很想举着生日蜡烛在镇江的田野上恣意奔跑……她在等待中国之行的到来。那张庄严的签证！她在等待……

1972年5月17日。邮差终于送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回信。他们给她的那封信，她宁愿相信是一场误会，由于某个环节出了差错。怎么会是这样呢？她一生经历过的打击太多了。那个麦卡锡主义！那个恐怖的1948年，那一年，整个美国都在麦卡锡的煽动下歇斯底里……

这个卑鄙的威斯康星州人！这个声名狼藉的国会参议员！就是为了改善他日渐衰落的政治命运，他利用共产党人渗透问题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诽谤运动。整个美国都在窃窃私语，整个美国都在恐惧惊慌，仿佛共产主义即将吞并美国。一个长长的“红色危险人物名单”，赛珍珠的名字被列入其中。那一天，1948年6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图市，一大早，人们就同时从

▲重返中国大地。一九八八年六月赛珍珠之女、美国赛珍珠基金会总裁（后排中）和理事长、赛珍珠女士的中国学生、九十高龄的尹珍珠（左一）合影于镇江



几家报纸上看到了这张名单的披披露。对赛珍珠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的攻击。

“一个再生的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样一个人横行美国？”

赛珍珠愤恨而痛苦。她自视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面对麦卡锡的鞭子她顽强地伫立不动。幸好后来美国醒悟过来了……但是今天的打击很要命！她，原准备去中国度过她的80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她已整理好了全部行装。她几乎看见那扇雕龙绘凤的朱漆大门了！突然之间，这扇大门向她紧紧关闭……

亲爱的赛珍珠小姐：

你的来信均已及时收到。

考虑到长期以来，你在你的著作中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抱有歪曲、中伤和诽谤的态度的事实，我受权通知你，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访华申请。

你的忠诚的 H·L·YUAN

二等秘书

这位二等秘书先生写下了一个中文签名。袁……什么。她看清姓却看不清名。袁先生的方块字是草

体，她难以辨认，抑或，袁先生不想让一个太清晰的名字给她一个太清晰的打击？

有人在往她嘴里送药片。现在是医生在对着她。医生的出现说明了一个很糟的问题：她，病倒了。

药片在喉咙处慢慢滑下。一口清凉的开水。她渐渐有了一点儿力气。她挣扎着开始工作，将那飞散开去的生命裂片一块一块地收回。

打字机静下来，所有空白稿纸都已填满，不剩一张。

她的工作终于做完了，打字机自动打出一个单词：The end（完毕）。

她无声地笑了。她向这个神秘的单词点头致意。冥冥之中，她完成着某种人生仪式。

她穿上了绣着飞龙的套丝旗袍，宛如一位中国公主，然后，静静地站在一群穿黑色衣服的人们中间。人群肃穆伫立。

她最后看了一眼房里的那些东西：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赛珍珠，名字是烫金的。普利策奖获奖证书。13个荣誉博士学位证书。还有，她的100多部作品排

成长长的一列。

此生无憾，赛珍珠女士，1973年3月6日，赛珍珠在青山农场逝世。丧钟长鸣。这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迎着大西洋3月的微风致悼词：

她，赛珍珠，“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

两天之后，她被葬在丈夫墓穴旁。这天她81岁高龄。

她的本名：波尔·赛登斯区克·布克，英文缩写：P·S·B。

1989年3月18日，中国的《文艺报》发表了詹姆斯·汤姆森教授的文章，《赛珍珠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震惊世界的一天》。这位哈佛大学著名的东方问题专家，对赛珍珠和赛珍珠所热爱的中国充满着敬意：

……由于赛珍珠的贡献，几代美国人都以同情、友好、尊重的感情看待中国人民……显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在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毛泽东主义这样一些年代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居然一点也没有改变……

（责任编辑：刘家驹）

# 中国殡葬

●谭中英 夏玮



人死了要安葬，活人如何安葬死人，成为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 历史篇

自古以来，各民族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有着不同的殡葬方式：

### 土葬

“入土为安”，作为人们的传统观念，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旧时代，王公贵族，生前便修墓建陵，死后入葬，更是展示自己气派的机会——陵墓因此而成为中华文化的博物馆、成为今天的人们了解历史的窗口；普通百姓，也要请风水先生为其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七十年代的安徽农村，几乎各个家族都有一块“老茔”，汇聚着列祖列宗。老茔”规模的大小，被看成家族兴衰的标志。墓地，是人生旅途的归宿与最后的终点，也是带有宗教神圣的色彩之地。

### 火葬

渊源于印度，梵语“荼毗”，即火葬之意。火葬在我国传袭年久，可溯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列子·汤问篇》云：“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土，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东汉初，佛教传入我国，僧徒依教规

死后须焚身，后扩大到民间，宋代起，火葬习俗成为民风。

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对我国广大地区盛行火葬的情况也有记述。考古发掘表明，火葬墓历代均有，但以宋、辽、金、元时期最多，遍布各省。火葬仪式，各时代、各地区不尽相同，其方法则皆用于木交错堆起，施以助燃剂，放置尸棺于上，焚后不留骨灰。到明清时代，统治者颁布禁令，使火葬逐渐衰落，《大明律·礼律》规定“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杖一百。”清律沿用并增加规定：旗民丧葬概不许火化。

新中国的火化工作，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151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在一份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名，认为：“这是安置死者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北京市率先在八宝山、东郊建立电气化火化场。随后，全国其它地方也开始兴建火葬场。

### 水葬

将人死后的尸体投之于江湖河海，任其分解，即为水葬。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远离陆地的船只，如遇死人，一时难以靠岸，常将遗体葬入海中。也有实行火、水兼葬，先行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我国沿海各地也有置棺海滩，利用潮水将其冲入大海实行水葬。《管子·水地》篇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

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葬，也有回归“本原”的意思。

### 天葬与塔葬

天葬，又称鸟葬、露天葬。是藏族地区较为普遍的一种葬法。人死后，家属将死者衣服脱光，成蹲坐式用绳布裹起，停放三日以示悼念，然后于清晨送天葬场，点起熏烟（煨桑），肢体经切割后任由鸢鹰吞食。据说，吃净表明死者生前无罪恶，灵魂升天，后代吉祥。此外，藏族还实行塔葬，这是该民族最高葬仪。享受塔葬者只有达赖、班禅或其他大佛。塔葬者死后，尸体用高级香料和药品加以处理保存，然后装入用金银珠宝装饰而成的宝塔内，供人礼拜。

### 树葬与悬棺葬

树葬是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葬俗，当天给死者净尸更衣，棺柩用柳条编制或松板制成，入殓时，伴随以死者生前的炊具、食具和工具，无棺者则以白桦树皮将尸体包裹，然后在树林间选择几棵大树作木桩，桩上搁置横木，将棺木或包裹的尸体高高置放于木架上，任其腐朽。悬棺葬则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其葬法是在悬崖峭壁上插入数根木桩，再将木棺系于木桩上。悬置越高，表示对死者越是尊敬。

## 现实篇

### 火葬的冷与热

目前全国有火葬场2000余家。

1958年至今，北京有60多万人故去。火化率达91%。1984年至1989年，上海市累计火化遗体56万具，火化率也在90%以上。但火化工作发展很不平衡。1988年，全国死亡人数约650万，其中火化者仅180万，火化率不足30%。在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火化工作步履更是艰难。

1978年前后，海南省共兴建11个火葬场，如今除海口、三亚两市保留住外，其余均已闲置报废。其中文昌县的火葬场，在竣工开炉前，有人别出心裁地牵来一条狗，用狗试炉，效果颇佳。但从那以后，火葬场再没升过火。1990年，海口市死亡人数近2000，火化的不到500人；三亚市死亡1000人，火化的只有95人。

四川省安岳县，是实行多年的“火化区”，每火化一具尸体，政府需补贴100多元，就是这样也很少有人送来火化。该县近年来的火化率仅为2.5%。

安徽和县的一位李老太，晚年生活在女儿家，1989年去世时，女儿女婿将其运到30多里外的县火葬场。运尸时却引起同族人“抢尸”，认为只有孤寡没有后代者才去火化，火化是在丢同族人的脸；旁观者为之可怜，认为火化太“作孽”，是图“省事”的不道德之举。其女儿事后也愧疚不已，向笔者哭诉说：“说到底，自己是想少些麻烦，怕花钱，才将母亲火化的。老人家太惨了！”

在“火化难”同时，一些地区的火葬场由于运尸、化尸、遗体停放等常规服务“超负荷运行”，加上人员素质低和环境场所狭窄、陈旧等，难以为人们提供必需的服务。

拥有270多万市区人口的成都市，每年有1万多人死亡。其殡仪馆的全部面积不过6000多平方米，是由一座庙庵改建的，只有一个

300多平方米阴暗潮湿的“追悼大厅”。追悼会常常凑在一起挤得不可开交。前一桩死人的哀乐还没放完，后一桩活着的人就得忙着进去。这个馆停放遗体的位置只有56个，可每天停放的遗体却有170具次，高峰时增达220具次左右。“超员遗体”只好安排“地铺”。成都东郊的火葬场，只有输电“一条线”，一旦遇到停电，遗体只好不化……

### 兴旺的棺材市场

广西柳州，从宋代以来就以雪松木棺材闻名于世，民间有“死在柳州”之说。解放前，柳州城里有两条街，两旁开的都是棺材铺，其中一条街叫长寿街。1989年1月，柳州棺材与木材制品公司与香港合资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生产棺材的公司。从此，一度冷清的柳州棺材市场又开始兴旺起来。该公司每月生产300至400口棺材。棺材由两大块雪松木仔细对接而成，不用钉子或胶，造型为巨大的船体，上面刻着复杂的象征长寿的龙鹤图案，大部分漆成红色或金色，每口豪华型售价3000至1万美元。

在四川省安岳县的一个区，有个长不过百米的棺材市场，木料堆积如山，木工们正忙于改料、加工。巢湖之畔的姥桥镇车站周围，在显著位置上摆放着一口口或红或白的棺材。这个缺林少木的地区，棺材市场却一直红火，一些人很是发了一笔“棺”财。据说，棺材交易很有一些“门道”。如果货主知道人已死了，原本300元一口的棺材，便会要价800元。所以有经验的购买者都会说成购棺是为病重者“冲喜”，不急用，以便讨价还价……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每年用于安葬的棺木，耗费木材约200万立方米。这些木材，如果用作建房材料，可以修造2000~3300万平方米的房屋。

### 土葬回升，墓地日增

棺材市场的兴旺，随之而来的是土葬回升、墓地日增。如今的土葬，除了传统的装尸入棺，而后埋棺入土外，又增加了火葬后的土葬：有的将骨灰盒直接埋入土中，有的将骨灰盒装入棺中，再行土葬。一份材料表明，杭州西湖地区的墓葬点，1950年只有8处，现在发展到34处，墓穴多达两万多个，共占地1200多亩。苏州的坟墓比杭州的更多，姑苏城外已有20多万个墓穴。上海市每年死亡人数的70%，约5万人，火化后，骨灰运往吴县地区公墓安葬。吴县各公墓都在挖土造坟，如今已不下数十万穴。安徽省亳州市十河区，现有人口不足10万，却有坟头23700多座，平均每4人就供奉一座坟头。在温州，从1983年开始，每年以造坟3万的速度递增。在昆明市郊，一座座新的“坟城”，正在逐渐将市区围绕。就连北京市也相继建起了7处公墓，用以火葬后的土葬。在一些著名的风景名胜点，在绿树环抱的山上，常常出现一片白花花的墓地，犹如令人恶心的疥癣，仅北京市在1988年，就查到这样的“疥癣”十几处。一些农民，更是随心所欲，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起了私人“陵园”……据统计，湖南省有的地区每年土葬占去土地近8000亩，相当于1万人丧失了全部耕地。而全国每年有100多万亩良田，变成了黑色墓地。

“死人与活人争地”，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1952年，我国拥有耕地16亿亩，如今不足14.5亿亩，人均不足1.3亩。比世界人均耕地约少了3.7亩。中国以其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养活了11亿多人口，创造了世界奇迹，可奇迹后面的危机再也不能忽视了！

## “死人整活人！”

在一些地区，老年人去世要办“白喜事”。“白喜事”与“红喜事”同样隆重。人死后，要停尸三日，请道士做道场，出殡时鸣锣开道，死者后代披麻戴孝；途中每经过村庄，都要设宴“摆路祭”，在人死后3天，要“复山”烧衣物，死后42天，要扎扎房屋、家具烧“六七”，两年以后要“捧牌子除灵”，为死者树碑立传等等。个别地方操办丧事有近百道“关目”，忙得丧户焦头烂额、大破钱财。据湖南省的统计，每办一件丧事，平均要花4250元，最高的近3万元。按此推算，该省每年丧葬费达15亿元。丧事的铺张，致使90%的发丧户债台高筑，其中10%沦为贫困户。而全国每年因丧葬所耗去的人民币，总计在70亿元以上。

也有发“死人财”的。其一是制造殡葬用品，如棺材、“冥钱”、纸陵等，和从事迷信活动的专业户；其二是一些心术不正的干部，趁办丧事的机会，公开收受贿赂。

## 希望篇

火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丧葬的文明。近年来，随着死人的增多、火化的推行，骨灰安放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大社会问题。上海市每年要建造2000平方米的骨灰寄存大楼，用以存放骨灰，年复一年，不堪负担。北京市原来用古建筑建起的革命公墓骨灰堂，也很快存满，早在1973年，有关部门便报请国务院扩建骨灰堂，后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格子改小，盒子改小，层次增多，允许拿出，投水入地”，暂缓了困难。但不久又“盒满为患”，不得不相继将办公室和办公的小院子改成了骨灰堂，随后又在这两重院子的外面砌起了一

道钢筋混凝土的骨灰存放墙，如今，这道墙的内侧已快存满，再过两年，墙的外侧也将被占尽。

专家认为，骨灰如何处理，关系到殡葬改革能否深化的问题。为此，一些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 魂归江海

1990年11月20日，杭州市在钱塘江与东海的汇合处，举办了骨灰撒海仪式。船到目的地，人们缓步移向船边，慢慢打开骨灰盒，探出半个身子，骨灰迎风飘洒入江……杭州市民政局的同志介绍，杭州市准备将每年的11月20日确定为“骨灰撒海日”，市政府已在江边建立纪念碑，供人凭吊。

1991年3月，上海市也举行首次骨灰撒海活动。民政局的同志肯定了骨灰撒海这一形式。认为这是殡葬的一次重大改革，它有利于移风易俗，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节约土地、发展经济，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骨灰入海，会不会影响环境？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环境监测中心进行了科学检验，认为，骨灰属无机质，所含钙量明显低于海水中的含量，不会引起大气和海洋环境的污染。

### 托起一片绿荫

1989年，广州市开始尝试将骨灰入土植树。1990年3月18日，200多名广州市民和香港同胞，在庄严的葬礼进行曲中，把19位先人骨灰洒进泥土，植上树。据报道，广州市正计划成立骨灰入土管理机构，随时接受市民办理骨灰入土植树事务，提供种苗、工具等配套服务，并负责树苗管理等，使这项工作制度化、日常化。

1990年清明节，北京市也举办了首次骨灰入土、种植纪念树活动。

1000余人捧着亲属的骨灰盒，来到了京西的太子峪陵园的光秃秃的山坡上，人们庄重地掩埋下亲人的骨灰，种上了华山松、油松、侧柏等。骨灰入土植树，既安葬了先人，又绿化了荒山，利国利民，尤其是内陆地区值得大力提倡的好形式。有人为此动情地描写道：“又一个清明节来临，许多纪念树已经抽出新枝、吐出新芽，给原来的荒山染上了淡淡的新绿。林中没有坟墓，没有墓碑，有的，只是亲人系在树上的小白花……”

### 飞向太空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西欧和日本人，开始对太空公墓感兴趣，向往“太空葬”。1987年，世界上第一颗天葬卫星发射上天，带去了上千盒骨灰，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太空坟墓。据报道，这颗天葬卫星重680公斤，其体积可以装得下3000个骨灰盒，每个骨灰盒均为直径1厘米，长5厘米的圆柱筒，外壳由镁钛合金制成。由于其表面研磨得像镜面似的光亮，所以卫星上天后，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地面上的人，可以用高倍望远镜看到，借以寄托哀思。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航天技术有一定的基础。“太空公墓”将来能不能成为一些人的最后归宿，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中国殡葬协会副主席樊壁田最近在《工人日报》载文谈我国殡葬改革，他说：“为了推进殡葬改革，遏制某些地区丧葬陋习的泛起，国家丧葬主管部门正在考虑制定一部殡葬法，把丧葬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春来满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冰消雪融后的“桃花水”，你该归往何处？

（责任编辑：刘家驹）

# 紧箍中的回旋

——当代杂文史钩沉

· 蓝翎 ·

研究当代杂文史的著作，对于1957年6月至1960年期间的杂文变化，大都存而不论。因为这涉及到“反右扩大化”，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涉及到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问题，也是给全国人民带来灾害的问题，存而不论，情有可原，杂文事小，人民的灾难事大，何必作不愉快的回顾，往前看就是了。

但是，“新基调”杂文的倡导者却不然，总也不想忘记这一阶段的战绩，怕被人埋没其功劳，所以老谈个没完。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评价一种文学形式发展变化的历史，总要从它的整体或主流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谐调与否为着眼点，而不能以个别作品的存在与否来代替，更不能抛开作品的内容只就数量的多寡来立论。比如，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昆曲盛于明和清初，而当代仍有古体诗词和昆曲，就不好同样看待。再比如，“大跃进”时期号召人人写诗，人人画画，“作品”数量空前，但能以此来写当代的诗史和画史吗？然而，“新基调”的理论却是这样论杂文史的。某公说，“我翻阅了一下从去年（按指1957年）10月到今年（1958）5月的人民日报，……不料在这短短的8个月中，发表的能够叫作杂文的东西，竟有200篇之多。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是谈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具体地说，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和地方主义观点的批判；同资产阶级

的教育、科学、技术、文艺等等观点的斗争。总之，这仍然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兴无灭资，是拔白旗插红旗。……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的‘多快好省’同‘少慢差费’两种方法的矛盾等等。”（《新闻战线》1958年第八期）1958年写的文章，27年后偷偷修改了关键的地方，不加任何说明地收入自己的书中，坚持原来的看法不言自明。这看法对吗？经过我重新翻阅这一阶段的《人民日报》，敢于断言，此公的看法不对，完全不对！首先“除极个别的以外”就“除”的不对，那期间还有不是“极个别”而是有相当篇数批右派的重头文章，包括他自己的在内，不能一“除”了之。其次，在某公看来，当时到处都是资产阶级，故需要大批而特批。但是，批准确了吗？批对了吗？你自己的那些文章为什么不收入集子里？抽象地评功摆好，却不敢把自己的文章摆出来，还要别人一把篇目开列出来吗？如果你太健忘的话，我可以开给你和读者看看。

要评功摆好，要炫耀自己的“战绩”，势大气粗的影响全国的龚同文就摆过一次，请看：“……（湖北）省委机关若干同志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笔名龚同文。龚同文针对着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斗争。……在1957年夏季以来，龚同文又出马了。1957年冬季以来，龚同文的主要锋芒是向着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在歌颂大跃进的同时，也批评了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倾向。……对于右倾

保守思想、对于违反党的利益的各种不良倾向，不仅要施加压力，而且要加以粉碎的。……我们要求自己写的杂文不仅像一把犀利的匕首，而且应当具有连珠炮那样的威力，来粉碎资产阶级思想，来粉碎右倾机会主义！……要使资产阶级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除了低头投降，乖乖地接受改造外，别无出路。……不是党的总路线压倒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压倒党的总路线。不是正气压倒邪气，就是邪气压倒正气。不是正确压倒错误，就是错误压倒正确。……”（《论压力》，1959年8月31日）好家伙，真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压”来，好不威风，且战果辉煌，那代表作就是精装本的《龚同文短论选》。但是，历史一正转，这些豪言壮语全都成了废话！到了80年代，曾经是龚同文一员的梅白同志，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龚同文始末》（1985年第三期《杂文界》）说得非常真诚：“它毕竟是‘左’倾错误影响颇大的时期的产物，其基调是‘左’的，尤其是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许多文章，伤害了不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火红年代’，对全省的‘五风’起过煽动作用，耀邦同志视察湖北时，说湖北有‘左’的根源，龚同文就是这种根源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某公不仅没有如此的反思精神，反而继续鼓吹那种文章为“新基调”杂文？一些研究杂文史的人对这一时期的这种杂文存而不论是有道理的；很多杂文作家的文集都不收这类文章。从总体上否定这一



阶段的这种杂文是对的，因为它起的作用违背了历史的发展。

谈论 1957 年反右派以后的杂文，不能脱离对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1956 年提出“双百”方针的前前后后，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而 1957 年反右派以后，又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问题仍未解决。1962 年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 年到 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已登峰造极。在这种形势下，“阶级斗争”像一道“紧箍咒”，念一念紧一紧，谁也难逃脱。何况反右“扩大化”已开以文治罪，特别是以杂文治罪的先例，“避席畏闻文字狱”，尽管多次重申“双百”方针，杂文作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讲一些自己要讲的话，可谓紧箍下的回旋。

总的来看，1956 年下半年至 1960 年间，可读的杂文是数量不多的。在那种形势下，作家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跟着“左”倾思潮起哄就值得尊敬，而能写出对人对人有所启发的杂文来，更是难能可贵。像王匡写的批评大搞形式主义的有胆有识的《论马路两旁摆花盆》、《谈“样子”》，实属凤毛麟角。吴有恒的《讥偶像的俗语》、《讲圣谕》和《严嵩乞米》，若让“左”棍们“上纲上线”，会扣上能吓死人的大帽子，他们对陶铸的正面歌颂的《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就是这样进行“批判”的。

1961 年 1962 年之间，杂文又呈现出相对兴旺的局面。这是由于纠“左”，“紧箍咒”稍松，且提出了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给杂文家提供了较

大的回旋余地，所以很多作家又破门而出。但是，作者的队伍没有 1956 年那样广泛，其特点是多为高级干部写专栏，如北京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的《长短录》；吉林宋振庭的《星公杂文》；内蒙李欣的《老生常谈》；四川张黎群的《夜谈》；山东丹丁的《历下漫话》等等。他们的文章已有专集出版，并且被不断研究，有很高的评价，此处不再多说。这些前辈，多是敢言直言之士，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冲撞“一言堂”的禁锢，为杂文作家树立了榜样。至于其他偶有杂文之作的作家，如冯其庸的《不怕鬼的故事》，牧惠的《说碰壁》，从龚同文中分化出来的老烈（苏烈）的《和尚与撞钟》等，与之相比，可算是“跑龙套”的。也还有几位“摘帽右派”用化名写的杂文，这也未必是当作花放出来，更主要的是表示“落实政策”，他们归队了，可以发表点文章；谁若要不识相大量写，不仅发不出去，反而会被认为“贼心不死”，另眼相待的。

当然，这两年杂文成就最大的首推邓拓；《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长短录》是最有影响的专栏。正因如此，“文革”一开始，便首先拿他们开刀，有为此而被迫害死的，有为此而入狱的。各地也到处揪小“三家村”、“四家店”，写杂文的被一网打尽。1964 年，《湖南文学》发表了韩抗的《笑的解放》，批评一位男观众看不惯电影《李双双》中李双双的笑，认为他仍然是以不自觉地旧习惯看待新事物，背后可能潜藏着“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不能理解李双双的笑“是有着深刻意义的笑的解放”。又谁能料到，两年之后，不仅笑没有解放，相反的是全民族的大痛哭。真的，从

1964 年后，再也找不到令人忍俊不禁的杂文了。封建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大尾巴像“扫帚星”一样“横扫”过来了。

“文革”像一场漫天大火，有的杂文家在烈火中永逝；有的杂文家将在烈火中涅槃新生，重新笑起来；有的青少年从灰烬中站起来，成了最有生气的新一代杂文家。

从上述杂文十几年坎坷历史的钩沉中，能看出点什么呢？正是：

思想解放，杂文兴旺。“左”倾纵横，杂文不幸。

“左”倾“横扫”，“左”牌杂文就成了扫帚，扫得尘土飞扬。

在一定时期，谁的杂文写得多，写得好，水平高，影响大，到下次运动一来，就被整得最惨。此之谓，“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而且操枪最积极最凶狠的又往往是杂文写得最蹩脚的作者。

历史无情，整人的杂文能流传者少见，被整的杂文却长存不衰。究竟谁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筛选？

杂文道路坎坷，杂文家多灾多难。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杂文家代有传人，“各领风骚没几年”也好，“没几天”也罢，队伍越来越浩荡，同真理一道前进！

只要“新基调”不停止穷折腾、瞎折腾，杂坛永无安宁之日。因为它的倡导者不仅多次以杂文整人，又从无反思，反而变本加厉，瞎胡弄出一套整人有理的“理论”，既为过去辩护，又为将来开路。

只要中国有文学，杂文就不会绝种。如果谁有能耐将杂文彻底铲除，永不准它再生，那将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人民的不幸。我相信永远不会有这一天，因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大有希望的。

除此而外，岂有它哉！

（责任编辑：白雷）



约翰城“妻子行动委员会”要求提高工资

我曾在美国当过常驻记者，在大学里讲过 15 个月的学，还在小城市里以普通老百姓身分生活过一年多。然而，我今天的自我感觉仍然是：对这个伟大而又复杂的国家，有所知，但更有所不知。美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提问者老少均有，总带几分疑惑。人们渴望了解美国，愿望却并未得到满足。我琢磨，这也许与我们国内的宣传常常要服从政治需要有关，一个普通老百姓常难以看到客观真实的全貌。

美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危机四伏，却又生气勃勃，这是为什么？它如此年轻，只有短短的 216 年的历史，却一跃而成为左右世界局势的超级大国，原因何在？吸毒犯罪，枪杀抢劫，如此严重，却偏偏有那么多人往那里涌，这又是怎么回事？一句话，在某些人眼中美国简直是“人间天堂”，而另一些人却视之为“罪恶渊薮”，毁誉之间，差距何以竟如此之大？说实在的，这也正是我孜孜不倦希望得到但是尚未得到一个科学答案的大问题。时至今日，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个活生生的美国入，一件件发人深思的具体事。我常常是通过具体的人

## 美国人

● 张彦

## 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

和事，而不是通过先入为主的概念，来认识一个国家和社会。我觉得，这样也许比较容易接近实际。

### 美国也有雷锋？！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叫约翰城的小城市，我和老伴刚到这一所大学讲学不久。一天，我们步行到住地附近的小镇上，正发愁找不到一家卖副食的超级市场，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从一家诊所里出来。上前打听，方知得到一两英里外的另一个镇上才有。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自报姓名格蕾丝·普丽斯特，她不仅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还十分豪爽地说：“上车，我送你们去。”于是，她开着她那辆褐色的旧车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叫 BILO 的超级市场，并且耐心等待我们买完东西一直把我们送回家。一路上，聊起来才知道她已退休多年了，仍然热心于社会服务。她对中国所知虽然不多，但甚感兴趣，希望有朝一日能到这个文明古国去观光一番。从此，我们结为好友，常通电话。她一再主动表示，愿意为我们义务开车。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能帮别人的忙，是我的乐趣。”

她几次邀我们同去教堂做礼拜，都未能去。直到圣诞节前教堂举行的一次聚餐会，盛情难却，我们才跟着去了。又是她开车来接我们，上车才发现已有两位老太太在座，也是她沿途接送的。

几十桌人的聚餐会开始之前，牧师除了祷告祝福之外，还热情洋溢地表彰了一批教友造福社会的先进事迹。我们的朋友普丽斯特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名列前茅。我们不免有点意外，但感到她当之无愧。牧师列举了她一桩桩助人为乐的事迹，十分感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她慢步走上讲台去领取奖状。满脸皱纹的普丽斯特，在扩音器前微笑面对着一二百双注视着她的眼睛，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这都是上帝让我做的。”

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13年前我初到美国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新鲜，甚至也许会写篇报道：“美国也有雷锋！”后来，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在马路上，在商店里，在车站，在机场，在美国的一切公共场所，你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我能帮忙吗？”或者“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说话的是你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但你不能不为他的诚恳

笑容所打动。一次，我正在路边摊开地图找我要去的街道，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主动走过来问我：“需要帮忙吗？”他不仅告诉我怎么走，还主动带我走一段到拐弯的地方，才回过头去继续走他自己的路。又一次，我们开车到了一个陌生的小城市，司机迷路了。问路边一个妇女，她二话没说，跳进停在一旁的她自己的小汽车，做了个手势：“跟我来！”拐了几个弯到了目的地以后，她伸出头来又做了个手势：“拜拜！”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谢她一声，她的车连影子也见不着了。

### 顾客果真是上帝

“顾客就是上帝！”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耳边经常听到的口号，为的是改善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商业的服务态度。在美国生活的这些日子里，我却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口号。然而，每当我走进超级市场、豪华公司、甚至路边杂货店，几乎无例外地都是笑脸相迎，百问不厌。临走付完款时，总要听到一声悦耳的“HAVE A NICE DAY！”（祝您快乐！）如果你买的东西多，他们还有人主动用轻便推车帮你送到外面。

回去后，你如果发现买的東西不合适或者有了新的想法，即使你试穿过的衣服或玩过一两天的玩具，只要东西无损坏，你都可以带着发票去退货，哪怕是在若干日子以后，绝不会出现不愉快的事。有的大商场，在进门处就设有“退货处”，为了便于顾客退货以后好进去购买他想买的东西。总之，他们想方设法也要让你把钱花在这里，而且满意而去，下回还会再来。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把顾客给得罪了，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被“炒鱿鱼”的命运。

根据我的经验，在美国逛商场买东西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从没有出现过“花钱买气受”的怪现象。商品和商店都分高、中、低档，明码标价（报纸上的广告也都标明商品价格），任你选择。餐厅饭店，也都如此。有豪华的也有大众化的，奢侈任君自酌，不用担心有什么被“宰”的风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唯利是图，无人非议。不过，图利得有个章法，而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也许在它当初的原始历史时期，有人会利欲熏心，不择手段，醉心于一锤子买卖。如今已是它的发达阶段，赚钱也知道应该讲究文明了。

当然，翻开这里的报纸，经常看到的却往往是强奸、偷盗、抢劫之类的坏消息。中国留学生在马路上遭到拦路抢劫的事，也曾有所闻。在我所熟悉的中国友人中，就有被撬过门的。相反，在美国，人们却很难得见到有关好人好事的报道。因为，按照美国新闻学的原理，像狗咬人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只有人咬狗的反常现象才是新闻。

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有是非的共识和助人为乐的习惯。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里每个城镇都有各种提供援助或慈善救济的机构，专门

▼格蕾丝·普丽斯特获奖后与中国朋友合影



从事于帮助贫困家庭和惨遭不幸的人们。即使在约翰城这样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地方，竟也有救世军，联合基金会，妻子行动委员会，妇女援助中心，妈妈之家，老年人活动站，受害者服务处，残疾人协会……所有这些都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为的是通过互助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的经费主要都是来自各方的捐献，有的可以按法律规定得到政府的补贴。人力主要靠志愿服务人员的义务劳动，即使常规任职的也只是拿半义务性质的低工资。

## “妻子行动委员会”

一天，电视里播放“妻子行动委员会”组织抗议活动的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示威的主题是强烈要求提高法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从3.35美元上升到4.65美元。几十个人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前进，大都是中年妇女。她们人数虽然不多，但精神抖擞，态度坚决，颇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妻子行动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出于好奇，我从电话簿上查明地址，然后按图索骥专程前往拜访。开车直到郊外一条公路上，才找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这一带，一看就知道是贫困者聚居的地区。委员会座落在路边几间简陋的平房里，前面两间用作接待和办公，后面几间是储存食物和日用品的仓库。这天，正赶上她们一月一度给贫困失业工人分发补助物品的日子，人们陆陆续续前来领取一份份事先分配好的土豆、罐头、奶酪、饮料以及洗涤剂等等生活必需品。办公室里，正在进行咨询谈话，一个完了又进去一个。

凯若·穆瑞是这个委员会的一位女副主席，50来岁光景，精明能干，正和几个同事忙于接待与分配

物品，一看就知道是个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女强人。直到工作告一段落，她才坐下来喘了一口气，通过回答一个个问题，为我们解开了“妻子行动委员会”的这个“谜”。

委员会诞生于1983年，那时正值美国经济不景气，约翰城的失业率高达24.8%，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数。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一个由失业工人的妻子自发组织起来的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发挥集体力量相互帮助和维护自身利益。凯若·穆瑞就是这个委员会的积极创始人之一。它的主旨是给失业者以希望，树立起自助精神，维护家庭免于崩溃。它并不相信施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应帮助他们在新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信心，鼓励他们团结一致去为自己的权利作斗争。这个委员会与全国性机构“失业者网络”保持组织联系，积极从事于争取为失业者利益立法而展开的活动。

当时，“妻子行动委员会”提供的服务有：提供信息和推荐职业；组织互助小组，解决具体困难；分配政府资助的基本食品，她们通过直接从厂家打交道取货，为大家谋得低价优惠；每月举行公开集会讨论失业者和半失业者所最关切的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帮助和支持；争取培训机会，为失业者创造重新就业或者改行的有利条件。自成立以来的头6年中，这个委员会即已为14858个家庭的51456人提供过直接或间接援助。

“您在这里工作每月能拿多少工资？”我问凯若·穆瑞。出人意料，她的回答是：“在这里工作的都是没有工资的志愿人员，有长期的，也有临时的。我们从一开始起就是如此，今后也将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失业者知道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的都是义务劳动，产生的影响大不一样。我们有

一个12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由选举产生。我们聘请的律师尼尔·普莱士，也是个志愿人员。他随时准备为失业者的诉讼免费服务。”

“那你们的经费从何而来？”我不得不再追问。“主要就是靠集资、靠募捐。我们一年举行许多次各种不同的义卖、野餐会、游园会，既借此宣传了委员会的活动和问题，又呼吁大家都来作贡献，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

## 她所为何来？

已经到下班的时候了。凯若·穆瑞平时都是搭公共汽车上下班，今天我们开车送她回家。一进入她所在的那个明显属于低收入人的住宅区，特别是跨进凯若她那个阴湿陈旧的木屋以后，我对这个美国妇女为什么如此热心公益开始有所领悟。她失业已多年，看来也难再就业，靠社会保险金维持生活，这是美国人最低的也是最后的生活保障。目前，她独身一人，幸而有孝顺的儿女为她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这在美国是十分难得的。很显然，她为自己有这样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她说：“我从小就教育孩子：如果邻居老奶奶需要人帮忙，你就主动去帮她铲地或者扫雪，什么都干。我让我儿子到青年会去义务服务，我女儿常常是医院的志愿工。这对他们一生都很有好处，不仅学到了本领，还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在申请工作时，履历表上填上参加过志愿工作这一条也很光采，会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当然，现在有的青年却不是这样。你让他做点什么，他先问你：‘有钱吗？’‘没钱，不干！’你瞧！”

凯若·穆瑞颇有感慨地告诉我们，这座小城市曾经是个欣欣向荣的钢铁中心，近一二十年来衰败了，留下了一大批长期失业的工人和家

属，她家就是其中之一。和许多人一样，她也不愿意搬到政府修建的救济公房去住，觉得有失尊严。她从生活实践中懂得，只有组织起来去争取，才能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重新出现那天电视里“妻子行动委员会”游行示威的镜头，举着标语牌走在前面呼吁提高最低工资的不就是凯若·穆瑞吗！我不由得向她提问：

“你们这样呐喊示威，有用吗？”

“喊的声音越大越长越有用，终究将为整个社会所听见。我们不仅在本地喊，还跑到州议会、甚至到华盛顿的国会去喊。眼前，也许没有什么用，从长远看，总会有帮助的。几个人喊，几十、几百人喊，越来越多的人喊。就造成了声势。州议员都想竞选连任，我们的喊声大了，他们不能不为选票着想。当然，有钱有势的大老板也会花钱收买到议会去为他们当说客，反对提高最低工资。这就要看谁的声音最后占上风了，要看当时的形势。宪法给了我们这个权利，干吗不用！”

## “妇女援助中心”

凯若·穆瑞的言与行，又一次印证了长期以来我脑海里所留下的极为深刻的印象：美国妇女中的佼佼者大有人在，她们常常是社会运动、尤其是维护妇女权益的斗争中的先锋骨干。尽管美国如此发达，男女却并不真正平等。别看在表面礼仪上处处“妇女优先”，然而在家中、在办公室里，她们却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受侮辱、受迫害。

美国妇女受到的困扰主要是两类：一是在办公室里受到男人、特别是老板的“性骚扰”，一是在家里受丈夫或情人的虐待甚至殴打。为了维护这种妇女的权益和人身安

全，各种不同的妇女组织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在宾州的堪伯利亚县和桑默塞特县就有这么两个“妇女援助中心”，其中之一即设在我们所在的小小约翰城。

“联合起来，我们就能砸碎暴力的锁链！”是“妇女援助中心”的口号，也是它的行动指南。它的任务就是：免费向一切因受家庭暴力迫害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援助与保护。凡在家里受到丈夫、男朋友毒打的，或者孩子受到父母虐待的，随时都可以向这个中心求援。它有一个24小时的热线电话，随时准备接受咨询、投诉和要求援助，由经过训练的人员予以答复和采取措施协助解决问题，度过危机。它还设有庇护所和特约的家庭，供受害者暂时藏身以保证人身安全。同时，它将通过调解、说服教育以致诉诸法律来帮助解决问题。为了消除求援者的顾虑和保证其安全，它负责为之绝对保密。

这个“妇女援助中心”座落在一条狭窄的林荫道上，只有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在这里主持工作的苏珊·谢海德，是一个精明强干而又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她对于我这个异国不速之客的来访，开始不免感到有点突然，但丝毫没有影响侃侃而谈介绍“中心”的方方面面。看得出来，她情不自禁地时时流露出对这个事业的无限热爱。

对这个“中心”的访问，为我打开了通往另一阴暗角落的窗口。在这里见到的一张官方的统计表，不免使我大吃一惊：家庭暴力竟是美国妇女受到的最多的一种伤害。每15秒钟，就有一个妇女被殴打，每年，有三至四百万妇女在家里遭到毒打，而且25%至45%是在怀孕期。图表还注明：这些数字显然低于实际情况，因为这只限于那些严重到必须由警察或者医院出面处理的。这种事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

同居的男女朋友，或者父母与孩子之间，已经成为美国相当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

始创“妇女援助中心”的人们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家庭虐待和暴力都是不能容许的，必须对之展开斗争，直至清除。这一正义的号召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受到妇女的热情拥护，不断有人申请来“中心”参加义务劳动。目前，设在约翰城的这个“中心”，主要依靠的就是50几个经过培训而又富有献身精神的志愿人员，其中就有受过“中心”援救的受害妇女。仅有的几个专职人员，也都只拿很低的工资。它的经费来源，主要靠举办活动进行募捐。她们经常派人到社区去了解情况，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帮助受害妇女树立自尊和自信，掌握对付家庭暴力的方法和策略。为了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妇女援助中心”一年一度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警惕家庭暴力月”活动，号召男人和女人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虐待。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悼念因家庭暴力而死去的人们，庆祝受害者获得新生，加紧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消除这种不应该发生的现象，让欢乐和幸福重新回到家庭。

## 《梅瑞琳的故事》

这一年举行这个活动时，当地一家报纸发表过一篇典型报道：《梅瑞琳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受丈夫虐待难以生存的妇女的悲惨遭遇，以及她在“中心”帮助下获得新生的经历。梅瑞琳，实际上并非她的真名，只不过是作者为了保护她的安全而使用的一个代号。

梅瑞琳的悲剧，起源于她的男人是个酗酒分子。结婚没有多久，她就多次遭到丈夫的毒打。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盲目自



▲约翰城群众游行纪念水灾 100 周年



▲盲人大学生克隆姆在读盲文



“中国在这儿！”“美国小学生在地图上找到了中国”

责。丈夫第二天见她鼻青脸肿，又向她发誓再也不会重犯。她不愿对任何人讲这种事，甚至自己的父母问起为什么脸上有伤痕，也是搪塞回避了事。即使在有了一个女儿以后，梅瑞琳还是经常挨打，甚至在怀孕期间也未能幸免。年复一年，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她只好求救于警察。经过多次的强力干预，终于把这个无理的丈夫赶出了家门。然而，灾难并未就此结束。这个粗暴的男人多次闯进来无理取闹，只因有楼上的邻居 J 充当她的保护人才幸免于难。一段时间以后，她和 J 发生了感情并实行同居。没想到，正准备结婚时，这位 J 先生虐待妇女的本性也暴露无遗。一天夜晚，梅瑞琳连同她的小女儿终于被这个不讲理的男人撵出了家门，并且只让她带走一纸袋的衣服。她走投无路，只好跑到一个女朋友家暂时栖息，并从那里试着给“妇女援助中心”打电话求援。

梅瑞琳说：“第一次打电话，我

没有敢说自己的名字，只是探听信息。可是，接电话的那个志愿人员是那样的温柔热情，她耐心地听我说，亲切极了。第二天，我再次去电话时，就毫无保留地报了我的姓名并说明了我的情况。不过，我不能不承认，当我踏上‘妇女援助中心’台阶寻求庇护的时候，我真担心会让我住进兵营式的大屋子，一排排的床位。没想到，我跨进的却是一个温暖的‘家’。即使如此，我坐下来依然有点紧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去追述那痛苦的往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

“这里的人真太好了，她们总是耐心地听着，从不逼你讲什么。我记得，开始我睡不着，陪我的志愿人员就一直和我待到凌晨 5 点，只是听我说。她是多么细心，多么亲切。我在这里停留的四个多月期间，得到各种不同的帮助，大大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她们还让我参加了电子计算机的培训，掌握了一门新技术。我的好朋友、邻居和教堂

的牧师，一个个也都来看望我，给予我许许多多帮助。我的女儿也能正常上学了。

“自从来了这个‘中心’，我好象变了一个人。我感到，我可以坚强地站起来了。再有人敢于欺负我，我就不怕了，我有‘中心’这座靠山在我背后。”

### 观察与思考

我访问过为社会慈善事业撑腰的“联合基金会”。这是一个专门为民间团体筹集资金的机构，全国各地都有。它拥有一套训练有素的人马，一年四季举办多种活动，吸收各界人士的资助。它与大公司、大企业建立友好关系，使之成为长期赞助人，有的甚至说服职工从每月薪金中自动扣除一个很小很小的百分比作为捐献。这样一来，既为社会慈善事业开拓了一个长期性的财源，又使这家公司及其参加捐献的职工，按照美国法律可以享受一定

比例减税的优待，一举而两得。所有的民间团体都可以向“联合基金会”申请补助，至于能分得多少，则要看你的活动性质、规模以及效益如何而定。

另一个慈善救济组织“救世军”，也是遍布全国各地。这个组织的一个对外橱窗，就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的“救世军旧货店”。这里卖的东西，价钱便宜得令人吃惊，往往只是别的旧货店的几分之一还要低若干倍。原因很简单，这里的货物都是人们捐赠的，不需要本钱。“救世军”在市区里设有接受捐赠的据点，号召市民提供不用的衣物用品，以帮助贫困者。美国的中上层家庭，每到换季或者出现新款式服装时，他们总要换下一批衣服，有的很乐于将它赠送别人。“救世军”将收集到的东西加以消毒处理后，就放在自己的旧货店里出售。这样，既方便了手头拮据的顾客，也为“救世军”的救济活动筹集了经费。

对残疾人的照顾，在美国已经形成风尚。在城市里，马路上的人行道，一切公共场所的出入口，都留有斜坡平道以方便轮椅经过。在公共汽车上，为残疾人让座是不需要提醒的。图书馆里，一般都备有盲文书籍，设有盲人读者的专座。还有一种以录音磁带形式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也就是由专业人员将一本小说或者一期杂志的内容录入磁带，供不能阅读的人使用。这种磁带，可以出售也可以出租，收费很低。在一个盲人大学生家里，我曾听过他所订的《新闻周刊》磁带，一期大约要听两个小时。这个大学生每天搭别人车或乘公共汽车上学，随身携带折叠手杖在校园里自由活动，有时半天都在图书馆的盲文室里度过。他很快就要毕业了，还准备继续读硕士学位。他口才很好，声音悦耳，课余给当地一家广播电台担任体育新闻播音员，他为能有此

机会施展自己的才智而感到兴奋。他很幸运，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女朋友对他十分体贴，并经常为他开车。他感到，身体虽有残缺，生活却依然充实幸福。

我在美国讲学时，业已年过花甲，自然对老人生活特别关心。美国也是一个老年化的国度，老头老太随处可见，为老人而建的设施比比皆是。国家对老年的福利亦有多样措施，例如贫困的老人可以申请住进廉价老人公寓，享受某些特殊照顾等等。然而，我发现，这里的老人生活有幸运的一面，也有其不幸的一面。一般地说，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强烈。人到老年，大都得靠自己，而非由子女赡养。因而，最后的归宿只能是敬老院或者老年公寓。即使有钱人住在很讲究的老人公寓里，仍然免不了在孤独中度过残年。不过，整个社会，对老年人是十分关怀的，为他们提供着各种方便和优待。看电影、上剧场、乘公共汽车、火车、飞机，都享受特殊的优待，有的甚至半价。我所在城市的公共汽车，对65岁以上的人发给免费乘车证，只是不适用于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尽管我是一个外来的老人，也有幸享受了一年多这样的优待。

同样，坐飞机也可以买老年优待票，比一般票要便宜许多。我和老伴各买了一张这样的机票，只花了368美元（相当于由东岸的纽约到西岸的洛杉矶一张普通单程机票价），可以在一年之内在美国大陆上任何一地飞两个来回。通过亲身的实践，我才明白此中的奥秘所在。原来，在众多航空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各家都使出招数来吸引更多的乘客，老年人自然是个重要对象集团。于是，他们利用退休老人不在乎时间这一特点，将优待票都尽可能安排去填补沿线班机上的空位，当然，

这样要多换一两次飞机。这样，既满足了老人廉价旅行的愿望，又提高了航班的满员率，一箭双雕。

几乎每个地区都设有“老年活动中心”，为老人们提供社交娱乐、健身学艺的场所和机会。每天，这里为来的人供应一顿最适合老人营养的午餐，只收成本费用。无形中，这个“中心”就成了此地老年人大会师的据点。尽管都已白发苍苍，但一到“中心”，他们好像又都返老还童了，有说有笑，又跳又唱。也有人去学绘画、编织、烹饪、舞蹈的，有专业人员辅导。这种“老年活动中心”，除了可以得到政府民政系统的一定补贴外，同样主要依靠各方捐献和众多志愿人员的义务劳动或半义务劳动。为了了解美国老人生活，我和老伴也成了这个“中心”的常客，受到这里同样热情的接待，使我们也感到十分温暖。

所有这些点点滴滴，常常使我陷入沉思：在资本主义如此发达的美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暴露无遗，为人所共知，但是它总是在克服矛盾中继续发展，而并没有像书本上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这个国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可谓大矣。但是，那里却始终缺乏革命的土壤，这又是为什么？美国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对此，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可以随口举例加以反证。但是，美国人并不轻易放弃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明知道很可能无济于事。尽管贫富之间、种族之间存在矛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事迹，却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人道主义和志愿精神，似乎已成为美国人见义勇为的一股动力。美国和美国人之所以能有今天，自然绝非偶然。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梦回北大荒

王正

回忆，并不都是愉快的；历史，也并不都是光彩的。但是人们却应该常常回顾历史，因为它将提醒人们：不能再演当年的悲剧、惨剧和闹剧了，也不能再干当年的蠢事、错事和坏事了……

——编者

流离，过过苦日子，甚至露宿街头，挣扎在饥饿线上，也过来了。人生的路总得自己去走啊！

这天上午，我们几百名来自中直机关和国务院系统、受“二类处理”（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到东郊双桥农场集中。两天以后，我们就在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登上一趟“专列”，向北开去。

车往前行，数不清的城市和乡村抛在后面了。车窗外，我看到越来越厚的积雪和越来越甚的荒凉。

记不清是走了两天两夜还是三天三夜，只记得是中午时分，我们到达铁路的尽头——密山。

车站很小，房子似乎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盖的。四周荒无人迹，稀疏的几幢小房子全被厚厚的积雪掩埋、凝结在白茫茫的雪原上了。我们几百人走进小小的候车室。结冰的窗玻璃映着惨白的光，室内却很阴暗。大家都不说话。世界是寂静的，室内是寂静的。然而，如果有人能听见每个人的心声，那定是一首响彻寰宇、震撼人心的交响曲。同样，如果有人能看见每个人内心的图景，那定是汇聚着世间的各种色彩、光影交错、瑰丽辉煌的画卷。只是，人们什么也听不到，而所看到的也只是阴影中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大家就这么呆着，呆着。……

要呆多久？什么时候离开？到哪儿去？……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当然也无从打听。每个人都明

白自己的身份，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

黄昏时分，天色放晴。这时来了卡车，我们扛起行李登车出发。汽车飞快地开着。北大荒的原野似乎没有边际，夕阳落入地平线了，晚霞的光彩渐渐消失了，最后西边天际的一线灰白也褪尽了，天色完全黑了下來。卡车像发了疯似地在狂奔。我们早已感到无法忍受的寒冷，现在更是从五脏、骨髓里都再也感觉不到一丝暖意了。大家都坐下来，紧紧地挤在一起。可是，冻僵的身体贴得再紧也是冰凉的，何况卡车上没有任何可以挡风御寒的地方。我们只有横下一条心，任随时光流逝，就这样呆着，冻着。

子夜时分，狂风大作，沉甸甸、密麻麻的大片雪花迎风飞舞，天地混沌，车灯前方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堵雪墙。卡车摇晃着，怒吼着，我们这些冻僵的躯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东倒西歪。难以支撑了，甚至尝到了一点将要冻死的那种滋味。天亮了，我们终于看见一个有几十幢草房的村子。车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853农场二分场。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们从北京一道来的几百人已经分道扬镳。到达二分场的约150人，被分住在两座泥墙砌成、满处透风的仓库里。没有生火，席地而卧，好在人多挤在一起，晚上睡觉也不感到太冷。然



▲作者于1960年在北大荒

北大荒本是我经受苦难的地方，现在我们家却和北大荒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大荒常有来客，我们也常得到那里的信息。那逐渐淡漠的过去的景象，那依稀浮现的今日的图影，经常在我脑海中搅作一团。尽管岁月流逝，那沉淀在心中的感情和思绪的结晶，却越来越耀眼。我是应该去一趟北大荒了。为了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历史……

## 1

1958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清晨，我告别了爱人方楠芬和出生未久的女儿，走出家门。

我不让亲人送我，因为这不是一次光彩的旅行。

人们都还没有起床，院子里静悄悄的。我知道收发室里有人在隔着窗子看我。我没有扭过头去打招呼。就这样，我孤孤单单一个人，扛着沉重的行李，拎着同样沉重的旅行包，怀着更为沉重的一颗心，向院子外面走去。

我将去哪里？多长时间？去干什么？那儿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全都茫然。我只是听人说过，从前日本人抓劳工，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干苦力。反正我还年轻，从小颠沛



而,这里并非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与我们后来住地比起来,这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安乐窝了。

两三天后,黎明时分,我们列队出发,开往我们的驻地——第六生产队。

我们的队长李福春,是一位转业军官。他快步流星,走在队伍前头。走着走着他停住脚,四面看了看,喊道:“到啦!”

我们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到哪儿了?这是什么地方?

他用手往脚下一指:“这儿就是六队。”

我好象听不懂他的话。既然叫“六队”,总得有个村子,起码得有几间草棚吧!然而在这雪海之中,地上连根草也没有啊!

“我们就在这儿建队,大伙干起来吧!”李队长当即下达命令:“一分队,把地上的雪扒开,堆到四边去。二分队,去伐木备料,准备搭草棚。三分队,垒灶架锅,烧水做饭。”

“在哪儿挑水?”有人问。

“这满地的雪,还不够你用?”

我当时是二分队的分队长,听到命令,仍然懵懂:“伐木?哪儿有树啊?”

李队长”手指远处,“那不是?”

我这才看清远处有一片小树林,就象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我们走进这个平原上的小林子。这里有白杨、白桦、水曲柳和各色杂木。也许从来没有人到过这里,它仍保持着一种天然美。枯朽的老树横躺在地,旁边又挺立着新生秀美的树干。雪地上点缀着小兽的脚印,裹着冰凌的枝条在空中编织出精巧剔透的图案。然而转眼间,斧声、伐倒的树木声震碎了这童话般的仙境。

我们正在为木材的运输发愁,李队长又教我们就地用砍倒的树木做成爬犁,绑上绳子,把木材拉回



▲1990年作者董于家中

队上。

这天,我们平整了场地,备了一些料,支起了作为队部的一顶帐篷,我们在这荒原上吃喝和休息,开始了我们的生活。

北大荒的春天来得很快。头天还是暴风雪,第二天却是艳阳天;早晨还是千里冰封,中午已是遍地泥浆。我们的棉鞋都是从北京带来的,有布的,有皮的,有毡子的,白天浸泡在泥水里,晚上睡觉的屋里不生火,早晨棉鞋已冻成坚硬的冰疙瘩。我们刚出被窝的脚,就直接伸进这冰冻的鞋里。上工的时间十分紧迫,还得整理内务、上厕所,双脚在冰鞋里冻得生疼,可是咬咬牙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们步行十来里,到了队上,脚发木了,鞋上依然是坚冰。干了好一阵子活,一直到近午,它才在脚上融化,可这时双脚又泡在泥水里了。

短短两三天,我们就盖起了两座各住60人(一个分队)的大棚,里面两排统铺,每排睡30人,另外还盖了个较小的草棚,中间隔断,男女分开。这是三分队住的。

北大荒的土地是腐殖质,一年一年的陈草累积而成。下面的陈草烂掉了,化作泥土;上面的朽茎败叶扭结纠缠着覆盖在地面,成为一张厚实的、宽广的地网。化冻时节,

满地齐腰深的积雪变成一片汪洋,水排不掉,形成沼泽。地网有弹性,我们整天就站在这水中的“弹簧”上干活。

棚里的积水,深约一尺,统铺架在水上,我们每天淌着泥水上床,脱下的鞋也只能放在床上。大棚漏雨,碰上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晴天则是另一番景象,太阳蒸发着地上的水汽,在棚里则形成弥漫在空间、难以散去的郁热的湿雾;太阳光从门口照射进来,又被地上的水反射到棚顶上,整个草棚里波光粼粼;我们只要低下头,就能看见自己在水中破碎的倒影。我们的床铺尽管潮湿和狼藉,毕竟是这块土地上较为干燥的地方,各种昆虫常来与我们为伍,甚至有一次,一条大蛇钻进了一位同伴的被窝……噢,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每天从早到晚在草甸子上割草,为建设我们的村子备料。草甸子一望无际,草高齐胸,割了一片又一片。腰疼腿疼难忍,自不消说。握镰刀把的手打满血泡,手实在伸不开握不住了,就用绳子把镰刀把和手腕拴在一起,借着整个胳膊的劲来不停地割那又粗又壮、好像永远也割不完的草。过度疲劳,不能准确控制动

作，经常割破衣、鞋，割破手、腿和脚趾。好在习以为常，胶鞋割破了用胶布粘，肉体 and 衣服破了用胶布粘，天天如此。有一天，太阳炙热，快到中午时分，突然从草根深处冒出浓浓黑烟，声如雷鸣，细看原来是在草丛深处越冬的蚊子，一旦苏醒，迅雷不及掩耳、铺天盖地地飞了出来。它们凶凶极恶，犹如饥饿的兽群，猛地扑向我们这些在草甸子上干活的、有着血肉躯干的活人。霎时间，我们的手上和脸上全部红肿。蚊子往眼睛、鼻子、耳朵、嘴里钻，往脖领、袖口、胶鞋筒里钻，真是无孔不入。人到了如此境地，简直要发疯。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干活。让手、腿和身体老在运动，让被我们割的草老在拂打我们的面孔和四肢，不一会，我们一个个就精疲力竭了。午饭时，停歇下来，茫茫草原没有任何藏身之地。我们用外衣包着整个头部，袖口、领口和裤脚全都扎紧，再戴上手套，穿上胶靴，可谓“武装到牙齿”。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蚊子根本不怕人。我们都穿着浅色衣服，而它们竟密密麻麻地布满我们全身，我们就像穿着厚厚的黑衣黑裤。我们随使用手在身上往下一抹，就有成百上千的蚊子纷纷下落。可死去的蚊子还未掉到地上，另外成群的蚊子已占据它们先前的位置，仍是一片漆黑。……现在我想起北大荒的蚊子、小咬，不禁全身发麻，我实在无法说尽它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有一样生活第一必需品——胶靴，后来又加了一样——防蚊帽。

我之所以滔滔不绝地讲述初到北大荒时的点滴经历，实在是因为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以前从未经历、甚至从未想象过的。而人的这种第一印象，又是最为难忘、最为清晰的。后来我们的经历，比初到时严酷何止十倍、百位，然而，

由于成了生活的习惯，有些更为惨烈或更为壮观的事竟然记不清晰、甚至忘掉了。我们经历过无穷的苦难和屈辱，也感受过丝丝的甜美和温情。人真是复杂的，我想，即使到了鬼门关，除了感到阴森恐怖，我也定能看到一种稀世的奇观，有一种非凡的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恐怕也是一种难得的财富。

我们的履历表上这样写：“职务——农工”，“工资待遇——32元”。当然，我们和一般每月挣32元的农工还有所不同，我们是“罪人”。

我们这些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身份，再也不是作家、演员、美术家、舞蹈家、音乐家、记者、总编辑、教授、研究员、工程师、医生、建筑设计师、总经理、主任、局长、勘探队员……。我们是农业工人。我们改造的重任在肩，拼了命也要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工，每日每时甚至每分钟为了战胜自身的不足，为了增强技能和体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

在队上，有几位我原来就熟识的朋友。吴祖光 and 江水犹如我的兄长，他们当时的年龄都已40开外。我老担心他们受不了那沉重的劳动负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渐渐我高兴地看到，他们不仅经受住了一切严酷的考验，甚至从未公开叫过苦或流露出畏难情绪。有时我在没人的场合分别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至多只是惨淡地笑笑，或者轻轻摇摇头，微微叹息一下。我们读书人身陷逆境，有的往往把自己弄得很潦倒，很狼狈，而吴、江二位则总是把生活安排井井有条，给人一种整洁、明朗的印象。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到一种高度的理性和韧劲，令人钦佩。陶冶是建国初期我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同事，解放前他在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学习，五十年代中期到中国演出公司工作。他

身体瘦弱，超长时间持续的沉重劳动常使他力不胜任，因而受到责难，实在令人同情。我们到北大荒几个月后，他的妻子、一位年轻舞蹈演员随他下放来到这里。1961年初，当“右派”们奉命离开垦区另行分配工作时，这位舞蹈女演员却因为不是“右派”而不能调离垦区。北大荒的有关领导为照顾她，就给她补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才得以与陶冶一同离去。可是当七十年代末，全国为“右派”甄别时，她的原单位因为并未划她为“右派”，因而也无法替她“改正”。后来经反复周折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牛珉是北京电影乐团的大低音提琴演奏家。他身材高，手大。北大荒的严冬，他在室外干活从不戴手套，甚至也不戴护耳的皮帽。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能抗冻的人。他无论在何等艰苦的环境里，总是不停地说笑话，从不显现丝毫的困苦和忧愁。就在大家即将离开垦区的前夕，他的妻子也下放到了北大荒，他留了下来。可不久他们却离婚了。后来他回到北京，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的记忆力惊人，现在每当我们老“荒友”见面，他总是滔滔不绝讲述30多年前的种种往事。每个故事，每个情景，每个细节，他都讲得那样细致，那样生动，而且富有喜剧效果，引人发笑，引人进入深深的回忆。他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割草、割麦、割豆用的镰刀。那镰刀把是他亲手用黄菠萝木做的。他做了两把，另一把送给了我，可惜我在后来的生活颠簸中丢失了。我觉得很惭愧。唐尊文是原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歌唱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方掬芬同学。在北京时我们常有来往。这是一个开朗、直率而活跃的人。在北大荒的艰难岁月里，他不怕别人议论，总爱放声高唱以抒情怀。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草甸子近傍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干活。那里蛇多得无法形容。无论我们朝什么地方看，树干、树枝、草丛、土堆、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大大小小的蛇。这里的蛇也像蚊子一样，根本不怕人。我们都感到毛骨悚然，只有唐尊文真可算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玩蛇人。不管是毒蛇还是无毒的蛇，他都敢随手抓起一条，让那斑斓扭曲的身体盘绕在他的胳膊上甚至脖子上。午饭时，他杀几条蛇，剥下皮，点燃柴草，用铁桶来煮蛇肉吃。我们那时缺营养，大家都吃，味道鲜美。第二年秋天，唐尊文得了病，当地叫“克山病”，几天之内就去世了。他是那样年轻，富有生命力，谁会想到他这样快就葬身北大荒了呢？……

在我们队上有一些颇有名望的人，如大翻译家李荒芜教授、早期《大众电影》主编方诗、前新华社社国内部副主任蓝钰（可叹他也过早地去世了）、作家陈明（丁玲的爱人）、高级编辑刘龙光、板胡演奏家何斌、舞台美术家关剑痕等等。有的人我当时并不了解，例如伙房里有一位女性，高高的身材，文质彬彬，每天起早贪黑为大家做饭，非常认真负责。我们只知她姓许，后来才听说她是许广平的侄女，许寿裳的女儿。伙房里还有一位男士，腰间老扎一根麻绳，腿有些残疾，每天从早到晚挑水。有一次我问他每天挑多少担水，他谦逊地回答：“七、八十担吧！”他叫甘培根。前几年，有两位已退休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荒友”来看我，谈到甘培根懂五种外语，是我国优秀的金融专家，真使我感叹不已。在我们所有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姓赵的老人，陕西口音，头发胡子全都白了。他也和我们年轻人干同样的活，从不叫苦，从不抱怨，沉静极了，真正是埋头苦干。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西安事变”时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中国

人民银行陕西分行行长。我不知道他如何也成了“右派”。我们队上年纪最轻的小杨，只有19岁，湖北人，小小的个子，一脸稚气，地质部来的。据说给部领导写了一封意见书，就划为“右派”了。他的身体正在成长发育期，脸上、手上、脚上都生了冻疮，更糟糕的是缺营养而患了夜盲症。我们那时每天收工都很晚，而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小杨就两眼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令我万分感动的是，总是赵老搀着小杨收工归来。在那夜色笼罩的茫茫原野上，一老一小如同祖孙倚着蠕蠕而行，这情景实在令人难忘啊！

在我们这些人中，最没有名望和身份的是朱魁岭。早先他是河北农民，被日本人抓劳工到东北当苦力。解放战争时他参加第四野战军，打仗负了伤，队伍进关后复员，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烧锅炉，后随学院来到北京，调民族音乐研究所当勤杂工。按政策，反右反不到他头上。可当时批判“农民生活苦”这句右派言论，他说：“农民的生活的确苦。我刚回过一趟老家，亲眼看见有人拉犁。”这就成了“公开放毒，对抗运动”，破格被划为“右派”。劳动是他的本行，他在北大荒干什么都是好手，又安心，表现是最好的。但是，六十年代初，“右派”都离开北大荒，由于他不是干部，无法分配工作，就留下真正当了农工。他的老婆、孩子也到了北大荒，在那里安了家。“文革”期间，他又因“右派”问题吃尽了苦。七十年代末，全国“右派”纷纷“改正”，可就是没人给他落实政策。几经曲折，问题才得到解决。这位无辜的“罪人”在北大荒渡过了22个春秋后，才离开那片劳改之地。可他已经老了，一身伤病。他没有怨恨，只是因为给他落实了政策而感激涕零。

有一位青年科学工作者，姓徐，听说他的问题是：“有狂妄的个人野

心，想当国家主席”。这确实很严重。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对宪法的一个条文提了一点意见。在1954年颁布的宪法中，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3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小徐在一次会上说，不应有“年满35岁”这一年龄限制。如果35岁以下的人够条件，也是可以选的。事实上，后来几次修订的中国宪法也都删去了这一条。但他却因为提了这一意见而招来前述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青年歌剧演员小朱，在整风会上听同志们对剧院领导提意见，他很激动，就站起来走到毛泽东像前，深深一鞠躬，流着泪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感谢您发动了这场整风运动，不然，我们这个剧院就太不象话了！”就因为这，他被认为是采取恶毒手段疯狂反党。

1958年夏季和1959年深秋，中直和国务院各部委联合组织的“中央考察团”两次来到北大荒，了解“右派分子”们的改造情况。第一次他们重点了解银行系统一位老干部S的表现，找许多人谈了话。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对此公有好印象。他怕苦，怕累，怕脏，怕严寒，怕泥泞，怕干活，畏畏缩缩，嘴上耍滑，不来真的，整天磨洋工。磨洋工最令人厌恶。你不干，别人就要多干；你不吃这份苦，别人就要替你吃。用狡猾的手段把自己应承担的痛苦和磨难推给别人来承受，这是很不道德的。至于此公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很难说出一个“好”字，他牢骚满腹，怪话连篇，为人太不真诚，没有一个朋友。考察团听到这些意见，十分为难。因为他们来此的目的，是要给此公平反。此公在单位里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事后查明，他是正确的，那个领导错了。可是，这位不是右派

的好干部，在北大荒的表现却比所有的右派都差，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不过，事已至此，此公还是免去了右派身份，随考察团大摇大摆地走了。这件事在人们心中引起了难以言状的困惑。什么是右派的标准？谁是真正的右派？由谁来裁定其公正性？……在我们队上，来自电影乐团的人颇多。给团长提意见的人被定为反党，来了；而团长李铮自己也来了，他也被划为“右派”。谁对？谁错？是都错？还是都不错呢？……没有人来过问，没有人裁决。

杨子彬是一位青年哲学家，师承冯友兰研究孔子。他干活不惜力，为人又很爽朗，是队上的劳动标兵之一。第二次去的考察团准备给他“摘帽子”，但有一件悬案必须先解决。事情是这样的，在反右时，他们单位墙报旁边的电线杆上出现了一张“反动”标语：“不要脸的官僚，上吊去吧！”字迹很像杨子彬的，但他不承认。一次次批斗，杨子彬都坚持这不是他写的。于是他成了“态度恶劣”的典型，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次考察团的人希望他能承认，这样问题就可了结。如果还不承认，说明态度还没转变，当然“帽子”也就摘不成了。他没有承认。这样，他的“帽子”未摘，继续留下劳动。我回北京后，杨子彬来看我，我见他全身浮肿，意气消沉，忙问他的问题解决没有。他说没有，而且说算了。我说不行，要他马上去找上级机关申诉，并且亲自陪他走到他们上级机关党委会的门口，看着他进去。可是结果大令人失望了。党委会的人说，小白条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检验不检验都无关大局，主要是他在改造期间态度不端正，所以他的问题不能解决。未久，他又被发配到甘肃，在北部边远地区的一个荒漠的农场里又干了15年。1979年，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这时他震惊地发现，档案

记载，有关“小白条”的案情早在六十年代初已查清，与他无干，然而他竟被蒙在鼓里，并为此继续受着严厉惩罚，无人为他洗白。天哪，怎么能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呢？……

1958年麦收之后，我们队上出了一起“晒麦场事件”。起因是几个人在干活间歇时坐下闲聊，谈到北大荒真是又大又荒，地广人稀，要是全开发出来就好了。有人说，那还得多来人。有人则调侃地说：“可以把全国的右派分子都送来。”“那这儿不成了‘右派王国’了？”大家哈哈一笑。不料有个姓樊的家伙在场听到，忙去打小报告：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要在北大荒建立“右派王国”。于是，这就成了“反革命事件”。那时，我们白天忙着建村，伺弄大秋作物，劳累不堪，晚上还要集合在新盖起来的工字形饭厅兼礼堂召开批判大会，一开就开到后半夜。主要批判对象是翻译家李荒芜、科学家赵中立、中央组织部来的一位老干部。揭发者是研究数学、力学的，想不到他在政治上也别有一番善于算计的技巧，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声嘶力竭，拼命炫耀自己嗅觉灵敏，立场坚定，立了大功。还有一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和被批判者划清了界线，也纷纷站起来发言。有的分析“事件”的反革命性质，说这几个人妄图纠合全国几十万右派，加上右派家属，共一二百万人，在北大荒建立独立王国，对抗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人揭发这几个人的日常言行，把每一件小事都无限上纲。甚至有人提出强烈要求：对这几个人“升级”处理。批判会连续开了好几个晚上，搞得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即使是慷慨陈词者，内心深处也不无恐惧。队上的气氛沉闷得可怕。白天劳累，晚上开会神经紧张，躺在床上又睡不好觉，许多人都神情严肃而又恍惚，体力下降。一天上午，

分场场长兼党委书记在一名警卫员的陪同下，骑马来到我们队上。他先是和我们指导员蹲在村头田埂上谈话，不一会就把我叫了去。我也蹲在他旁边。他劈头就问我：“‘晒麦场事件’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开玩笑。”他见我有些沉吟，叫我尽管说，说实话。我把当时的情况讲了一遍，最后说：“他们当然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但他们绝不是真的想建立‘右派王国’。”他沉思一下，猛地站起，把手中的马鞭往皮靴上一抽，说：“算了！”然后转对指导员：“批判会不要开了！”他又对我说：“你找那几个人谈谈，以后注意点。”他干脆利落落地处理了这件事，向警卫员一挥手：“走！”二人上马，扬鞭而去。

过了不几天，我带着两个组到分场帮助盖房子。不料，我们到达场部，有个干部横眉竖眼，根本不让我们盖房子，而是把我们领到山林边，要我们把堆成山的木头扛到公路边上去，而且必须当天扛完。发布完命令，他扭屁股就走了。这堆木头有几百根，每根长约三米，直径一尺左右。我们中间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能两人抬一根，每趟往返四五里路。我们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从清晨扛到深夜十一点，步履踉跄，肩头磨烂，腰酸背疼，只扛了全部木头的四分之一。第二天凌晨，我们又去扛。那家伙来了，大发雷霆，骂我们磨洋工，反对大跃进，坚持反动立场。他还威胁我们，今天再不干完，对我们不客气。看来，我们今天是没法活了！大家愁苦地看着我。我说，先干着。但我心里也是很不安宁。到了下午，我硬着头皮去找分场场长，诉以实情。他当即到现场察看，然后把那个干部找来，当着我们的面把那家伙训了一顿：“你要把他们累死呀！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你还讲不讲政策？不要让他们扛木头了。他们是

来帮你们盖房子的。你好好学着点！木头你们自己扛，你们一天能扛完吗？……”这么个蛮横凶狠的汉子，此刻连大气都不敢出，只一个劲地点头，也真够可怜的。

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几个干部手里的。在那阶级斗争尖锐化年代，对待“敌人”越是粗暴无礼，不问其痛痒，不顾其死活，才越显得“革命”。而对我们这些人能做到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甚至能做到加以理解，主持公道，就太难得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位分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模样，心里对他充满感激和钦佩之情。如果没有他的亲自干预，前述两件事的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1958年深秋至1959年初春，我们队有一半人在完达山伐木。这时，我们队新来了一位姓张的指导员，他和我们一道在山林里住了整整一个冬天。伐木是一项技术性强、体力消耗大、具有一定危险的劳动。尽管张指导员天天要求我们注意安全，但恶性事故还是发生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员朱克华和舞蹈演员赵云鹏在伐一棵水曲柳时，突然树干从中间劈开，在高空断裂，然后从空中砸下，把他们两人砸倒。朱克华的腿骨折，至今留下残疾；赵云鹏的腹部内出血，在火速送往山下就医的途中不幸去世。我们都深受震动，张指导员也心情沉重。就在这一事故发生后不久，我又遇上一次险情：一天黄昏，七八个人各拿一根撬杠，在滚动一根长八米、直径一米的红松。我站在山坡下方喊号子，指挥他们协调动作。不料有人搞错了方向，一使劲，木头不是朝着木材堆滚去，而是朝着我滚来。木头在滚动中不断加速，眼看就要从我身上滚过去，这叫“擗面”，必死无疑。真是千分之一秒的一闪念，我见后无退路，向左右跑都来不及，就冲着向我飞快滚来的木头一跳，

想越过它，但双脚还是被它刮了一下。所幸我凌空扑倒在土坡上方的地上，木头从我脚下滚走。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直到我从地上爬起，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此时我发现，我的棉裤棉袄到处都开了花。收工后，张指导员见我的模样，忙问怎么回事，我说差点“擗面”，他勃然大怒：“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注意安全？！这真要送了命，值吗？……”他的怒气中包含着对我很真挚的感情。我感到温暖，十分激动。只有内心亲近的人才会这样啊！

在六队的干部中，与我们内心最亲近的是队长李福春。我们在北京双桥农场集中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他当时身着军装，大尉军衔，少壮英俊，一表人才。他是和我们同车到达北大荒的。他和我们同吃一样的苦，同干一样的活。真是我们脚上有多少泥，他有多少泥；我们身上流多少汗，他流多少汗。他最为难得之处，是绝不戴有色眼镜看人。记得刚到北大荒不久，一次烧荒，突然风向改变，火势向树林边上蔓延。我们奋力扑灭了遍地的火苗，累得喘不过气来。他这时站在我身边，突然说：“我看，你不像个坏人。”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坏人。接着就讲了几句我的经历。他说：“那你就打起精神。你在原单位怎么样，我不管。反正在这儿，我觉得你不错。要好好干！”对待一个“右派分子”能如此贴心地谈自己的真实看法，这令我非常感动。他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大约是第二年，队上来了一个转业的准尉，同分场的那个蛮横的家伙很相似。他经常对我们恶语训斥，提出一些难以实现的要求，把我们逼上绝路。而每一次李队长都能公正处置。1958年12月，我离六队前夕，他请我到他家吃饭。有酒，有菜，他爱人还为我包了饺子。他为我庆贺，也为我饯行。他说了许多知心的话，还

掉了泪。他赤诚的心，难舍我们在艰难环境里结成的友情。“文革”中，听说他受到猛烈的冲击，罪名是“包庇右派”，“对右派感情太深”。我感到非常难受。几年以前，他来北京，我们见了面。他说：“那时我就想，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在北大荒劳动三两年，还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可是我们这些人呢？从小参军，扛枪打仗，后来陪你们到了北大荒。你们走了，我们留下，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得在那里扎根。现在看到你们的情况都很好，我高兴，我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将来埋在北大荒也值了！”

前年，有两位北大荒的青年干部先后来我家看我。他们都是在北大荒长大的。有一位年纪稍大，约四十出头，他说：“我小时候，认为最坏的人就是右派。我从来没有和右派接触过。”“那这种看法哪儿来的呢？”“大人教的呗！”另一位，略小一些，三十多岁。他说：“我打小就觉得右派是最好的人。他们干活卖力，待人和气，特别喜欢我们小孩，还教我们学文化，学唱歌，学画画。他们走了以后，我老想他们。”“没有人对你说，他们是坏人吗？”“没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产生不同的后果，深深影响着后代。——我常常想到这一点，感慨万端。

1961年春，北大荒各农场的“右派”全都撤离。那时我在农垦局文工团写剧本。有一天，我在虎林火车站见到在850农场劳动的“右派”们登车回京。他们从积雪的田野上缓缓走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有些腰上系根麻绳，手里拄着一根树棍。寒气凛冽，北风呼啸，我真怕一阵风会把他们纷纷刮倒。他们是多么虚弱啊！看到这样一支流放者的队伍，谁能不怆然泪下？谁能不悲天长叹——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责任编辑：白雪）

# 老子故乡话老子

朱秀海

我的故乡鹿邑，就是诞生了中国伟大哲人老子的楚国苦县。曹操被汉献帝封为武平侯，此处便是他的封地。隋开皇十年，才改称今名鹿邑。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写到老子只用了255个字，其中161字用去写孔子向老子问礼，真正写老子的只有94字。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之官也。”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者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即使是鹿邑人，对老子生平事迹的了解也不比司马迁更多，仅仅知道老子诞生在厉乡曲仁里，就是今天鹿邑城东的太清镇，其它便不知道什么了。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老子。老子最终还留下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

读《道德经》，我们会很自然地去找那些自己感到熟悉的东西：“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将欲取之，必固与

之”，“柔弱胜刚强”。又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还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等等。这些早已作为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精华。然而，老子的另外许多我们不熟悉的思想恰恰才是《道德经》中最重要的内容；“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用草扎成的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他甚至公然提出：“常使民无知无欲”，“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其最高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甚而又甚的一番话是：“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从这两千五百年后仍旧惊世骇俗的思想中，我们已经隐隐窥到老子不仅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建立一个以“法自然”为核心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模式。人类哪怕不会去实践老子这一社会理想，它仍

旧会成为我们渴望更合理更美好生活的内心从现实中逃逸的精神家园之一。我们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爱上了那个国度，甚至还可以从老子无为、公平、简政、罢战的社会理想中生发出新的社会理想。人类的心灵就能从老子的教诲中获得温暖、慰藉和希望，人类将拥有新生的动力。

这仍是一个以一斑而窥全豹式的老子。老子的思想远不止此。

不久前我的故乡鹿邑展开了一次全国性的老子学说研究会，与会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不大愿意说出来的感觉：《道德经》是天籁，老子是摩西、穆罕默德、佛陀一类的先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的是一种没有任何坐标系可供参照的语言，只有《旧约》、《古兰经》和佛经的一些最神秘的部分才能与之相比。西方哲人中，甚至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也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他们仍需要用繁琐的推理证明其著作的真理性，而被他们用做推理支撑物的第一证据的真理性，又往往是无法被充分证明的。老子、摩西、穆罕默德、佛陀的语言则像是一些直接来自上天的声音，它们既深奥又坦率，震聋发聩，不需任何证明而又似乎无处不在被证明着。一个人毕其一生研究《道德经》，你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根本的问题是你找不到任何一种尺度去把握它的内涵和外延，更不用说评判它的正误

了，无怪乎孔子问礼于老子后感慨地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至于龙，我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在乎？”

## 二

身为老子故乡人，对其在两千年间遭际的荣辱褒贬是很注意的。

自汉武帝起，“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极大崇敬，其地位基本上没有被动摇过。即使是成吉思汗入主中原，也要先修孔庙，向“孔圣人”致祭。

老子则不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列入“世家”，仅将老子列入“传”，直到东汉桓帝，老子才受到皇帝本人的尊崇，于宫中建祠奉事，派使者到苦县老子祠祭祀，但却没有封“师”封“王”的举动。曹丕篡汉，明令民间不得奉老子为神，“妄为祷祝”。老子受到极高礼遇是在唐代，唐高祖李渊自称是老子子孙，太宗李世民于老子故里建太上老君庙，高宗李治亲幸鹿邑，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命王公百僚和举子皆习《道德经》。到了宋代，老子虽仍被尊为“混元上德皇帝”，却不再受到真正的尊敬了。随着王朝更替，老子越来越同一些民间传说中的神仙搅和在一起。他在仙界的地位升得越高，在统治者和儒家文人眼中的地位就越低。《道德经》成了道教在中国产生的思想渊源之一，他的无私、公平、简政的思想在道教兴起之初还起到了某种革命性的作用。使《道德经》历数千年劫难流传至今，不能不是道教的一大功绩。在这里孔子和老子的命运又出现了重大差异：孔子在庙堂上受到祭祀，老子则在民间享受香火。

还有，曲阜的孔庙、孔林一直

被历代统治者敬为“圣地”，加以重点保护，今日已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古迹和旅游胜地。鹿邑的老子庙不同，两千年间它几建几修，不是焚于兵燹，便是失于倾圮，有时还被皇帝亲自下诏拆毁。今日，老子庙仍是一座一亩见方的土台子，台高丈余，四周围以土砖，台上一个小小的年久失修的四合院，正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大门及左右耳室各一间。正殿内四壁萧然，只供有一轴水墨老子像，几幅隶书的《道德经》悬于正面及东西两侧墙上。使殿内稍有神圣气息的是一只大肚香炉，善男信女们焚烧的香烟终日缭绕不息。

老子对自己在后世的遭际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的，于是他在《道德经》中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然而他并不在意世人对他的冷遇。“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他微笑着说，“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无论外界给予老子的待遇如何，自古至今，他在自己故乡都始终受到最高规格的崇拜。

在世世代代的鹿邑人心中，老子是一位居仙界、长年保护着本土百姓的神。

鹿邑人非常亲切地唤老子为“老君爷”。使他和家乡父老的关系显得极亲密，似乎一下成了他们的“自己人”。不管是本地木版水印的老子画像，还是艺人们走村串户“倒”（意为铸造）出的老子石膏像，老子都被描绘成一个慈眉善目的乡下老头儿，布衣芒鞋，美髯飘胸，就像谁家的老爷爷或外祖父。

无论何年何月，一遇上兵荒马乱或者水旱蝗疫，“老君爷”就会暗暗地保佑吾土吾民。1976年，全国大闹地震，鹿邑人也奉命在户外搭起一座座“防震棚”，“新闻”传开了，内容是说“老君爷”某日半夜

里托梦给县长，说今年天上是他老人家值班，全国都地震，鹿邑不震一下也不行，但不会有大地震，绝对不让倒一间房，死一个人。这个传说对稳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是年鹿邑真的只小震了三次，一个人没死，一间房没塌。1991年淮河流域发大水，位于淮河上游的鹿邑也连降大雨，这时民间又流传起一则“新闻”：“老君爷”显灵了，他让县委书记告诉乡亲们不要惊慌，有他保佑着，鹿邑县城周围25里内照旧五谷丰登。后来果真这两雨就只在外圈下，环绕县城的相当大的一片地区没遭水灾。洪灾过后便是大旱，整个冬天滴雨不见，青苗成片成片死亡，这时“老君爷”又说话了，他让乡亲们放心，明年照旧让你们吃白面馍。果然来年二月贵如油的春雨三天一大下，两天一小下，夏收时又是一连半个月响晴天，庄稼人得了个几十年不遇的好年成。

一年四季，鹿邑城中的老君庙香火鼎盛，他们的目的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人生难题：求子的；想发财的；保佑自己青云直上的；在赌场上大捞一把的。“老君爷”有时是很“灵验”的，若你求的是一个男孩，那被满足的机率总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无望者当然是不愉快的，但决不会因而动摇对“老君爷”的信仰，这信仰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假如你没有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那便是“老君爷”不喜欢你得到它，并不是他不能给你。你首先得想一想自己，是否做了什么于“良心”有亏的事情。

老君庙的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便是给人治病。由于它的隔壁就是鹿邑县人民医院，有人就戏称此处为“鹿邑县第二人民医院”。从将病人送进医院的第一天起，家属便会到老君庙里烧一次香，然后把一张纸片放到地面上，祷告者隔

会几睁开眼看，纸片上面若有一些细尘似的东西，便小心恭敬地收到另一个准备好的纸包里，直到认为“药”量够了，然后将“药”擎到病人身边，让他就庙里讨来的清水喝下，并告诉说老君爷给你下了“药”了。此时病人的精神往往会为之一振。

这一切当然是迷信，却又是一种地方文化，一种民间的信仰。老子在故乡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法力无边的亲人，一个每日每时帮助他们更有信心地面对生活和命运的长者，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似乎在此落到了实处。站在更广阔的时空角度上看问题，我们所说的迷信和文明其实是构成历史文化发展主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迷信中暗藏着文明，一个时代的文明中又总有迷信存在，迷信本身也是文化，它真实地反映着该时代人们的需要、渴望和梦想。

近期鹿邑人得到新消息：日本人已与县政府谈妥，由他们出资重修老君庙，其中主体建筑是一座新修的17层高的老子纪念塔。（塔为佛家之物，不知执政者考虑到也未？）县里也下决心修一条由县城到古厉乡曲仁里老子诞生地即今日太清镇的十里长街，借文化旅游的东风，搞活商品经济。

盛代必有兴造。即使坚持要“和光同尘”、“抱朴守拙”如老子者，也逃脱不了再一次被“兴造”的命运。此事能给故乡人带来福利，他是不会在乎的。他或许还会淡淡地微笑着，举起自己的手指，像在《道德经》中那样朗朗言道：

“道可道，非常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责任编辑：仲文）

## 努力办好刊物 适应新的形势

——本刊记者

《炎黄春秋》为自今年起改出月刊，于新年期间邀请温济泽、戴逸、李普等学者、作家，与本刊编者座谈并听取了编辑情况汇报。本刊1991年7月创刊至1992年11月共出版双月刊9期，发表了160余万字的作品，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件的近50篇，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品60余篇，关于古代与近代历史人物及事件、当代现实题材和海外人士等各类作品各20余篇。其中有不少受到读者欢迎，每期都有2、3篇被3、4家兄弟报刊所转载、摘编或评介。许多同志和有关方面都很关心支持这个刊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薄一波最近说刊物办得“有一股气势”。知识阶层、机关干部和中老年读者都爱读她，不少人四处求购和订阅这一刊物。李政道、韩素音等海外著名人士看到本刊后也欣然为其撰稿，港、台等地文化人士也较欣赏本刊，多次建议向海外发行或出海外版。

座谈中莅会者都表示刊物应更坚决全面地体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四大路线，要适应和赶上改革开放大潮，警惕和防止右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影响与干扰，使刊物与时代同步；对社会上某些文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现象，编者要清醒坚定，努力保持刊物的品位和特色，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即顺应时代主流，又不降入低俗。

座谈中又提出刊物还应扩大读者面，要能吸引广大青年及一般读者。这就要扩大题材范围，增加反映当代现实生活和热点题材的文章，在反映我国古往今来社会政治军事活动的同时，也注意反映各时期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以至民俗民风等多方面的内容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有计划地宣扬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如建筑、服饰和茶、酒等食品文化等等，都应该有所介绍。海外华人、华侨和国内归侨特别是台、港、澳同胞的生活情怀，都应不断反映。少数民族的人物和历史，更应是刊物的经常内容，把四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团结在爱国大旗之下。刊物在主要发表可读性强的纪实文学作品时，还要增加思想性、知识性强的言论和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以保持和提高刊物的品位。

座谈以后，杂志社根据大家的意见研究落实，认为本刊的优势之一是拥有一批熟悉我国历史特别是现代革命史的作者，能够保证刊物内容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本刊的特色之一则是能说真话，能比较客观公允地反映历史和现实，今后更要注意掌握分寸，以积极态度来维护正确事物。在反映历史时，不妨说点正史以外少为人知的事，为读者提供题材、角度和写法都比较新鲜的作品，使刊物更生动引人，力争在新的一年里出现新的面貌。



那是在 1943 年初冬的昆明。

那天一早，陈香梅到驻昆明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采访。她年方 19 岁，是岭南大学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女记者。

虽说是新手，陈香梅已很快适应了采访生涯，习惯于跟其他报社记者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气氛。

本来，她完全可以依靠在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当领事的父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少将司令陈纳德



接近 5000 吨。

陈纳德说：“跟太平洋战区的辉煌战果相比，这或许算不上什么突出的成绩，诸位记者。但对于四面受敌的中国战区来说，它相当于一根动脉血管，片刻缺少不得。”

在详细介绍“驼峰航线”的其他一些情况后，陈纳德又说：“我想我讲得够清楚了，第十四航空队的工作，就在于全面保护这条航线，并不断出击日军。”

因事关军事机密，谁也不能写



陈香梅

## 陈香梅

### 在初恋时

· 杨耀健 ·

亲，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她却偏要自强自立，靠自己的本事闯天下。小姐不做，她要当记者。

她工作得非常刻苦，新闻报道自不待言，副刊还不时发表她的散文和随笔。细心的读者，偶尔还能在刊物上见到她写的一两首小诗。文章虽不起眼，陈香梅却非常自豪，那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自食其力的见证。

这一天的采访对陈香梅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在整个昆明城里，陈纳德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协防滇缅路期间，击落击伤日机数百架，近年昆明免遭空袭，也得益于他指挥的美军航空队。陈纳德航空队威名远扬，曾被中国新闻界誉以“飞虎队”的美称。陈香梅早就想见识一下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2 陈香梅来到了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被允许进入接待室。几分钟以后，陈纳德穿过边门，出现在记者们面前。

以前，陈香梅听见别的记者在私下里称呼陈纳德为“老头子”，她便把他想象成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结果她完全想错了。站在她面前的陈纳德身板笔挺，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他那结实的身躯，紧束在收了腰的毛料军服里，好像是从油画里走出来的骠骑兵，充分显示出将帅风度和军人的魅力。两颗银色的星徽，佩戴在他平直的肩头，与他胸前佩戴的几排勋章交相辉映，耀眼夺目。

陈纳德露出真诚的微笑，他向记者们透露了好消息：连接中印两国的“驼峰航线”，每月的空运量已

报道。

陈香梅很失望，其他记者都匆匆走掉了，她还独自坐在那里。她父亲跟陈纳德有点交情，她今天得接上这个关系，便于下次采访。

“是安娜小姐吗？”陈纳德迈开大步走过来。

“安娜”是陈香梅的英文姓名，她听了又惊又喜，赶紧答应。她是在香港长大的，说起英语来，跟汉语一样流利。

陈纳德说：“你的父亲最近有信给我。问及你姐姐的情况，并提到小姐你也在昆明任职。”

陈纳德的和善态度，打消了陈香梅的紧张，说话也轻松多了。“见到您真高兴，将军，静宜姐曾告诉我不少关于您和第十四航空队的故事。”

陈纳德温和地点了点头，客气

地问道：“如果小姐不急于赶回去写稿，能赏光跟我们一道喝杯咖啡吗？”

陈香梅欣然首肯。

她那时还无从知道，今日的相会竟是她新生活的起点。

3 陈氏姊妹的住宅，是一所租赁的雅静中式庭院，环境不错，上街也方便。

陈香梅的大姐陈静宜，说是来昆明小住，实际上是来当妹妹的监护人。陈老先生对陈香梅的任性颇有了解，不希望她一个人到处瞎闯。另外，老人家也弄不明白，女儿大学毕业后怎么没找到好一点的差使，没到陪都重庆的大衙门里做事。他放心不下，要她也去美国。

两姊妹一见面，又是谈这话题。

陈香梅笑着摇头道：“我不会去美国的，我在采访时结识了陈纳德将军，你们将会看到关于他的连续报道。”

“是吗？”陈静宜问道，“你对他印象如何，还不错吧？”

“他应该得到一个比‘不错’还要好的形容词。”陈香梅说，“陈纳德是一位最优秀的美国军人。”

陈静宜的笑容是意味深长的。她点燃一支美国香烟，吸了一口含在嘴里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怎么认识的？”

“听你的口气，像是在审问我。陈纳德这种人，每个记者都想跟他认识。”陈香梅撇撇嘴，拿起梳子去梳她的头。

静宜含笑盯着妹妹说：“香梅，我看你像是有点迷上他了。”

“大姐，你说些什么呀！”陈香梅猛一震，梳子扭住了头发，半天取不下来。

快20岁的人了，陈香梅仍把对异性的爱慕闷在肚里，从不对外人提及。有朝一日，她说说不定会嫁

给黄毕尔，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她从前在香港跟他认识。他们谈过恋爱，但远远不能称之为亲密。

“听我说，香梅。陈纳德已是个有家室的人了，你不要常去找他，免得招人非议。你也知道，新闻界的那帮人是很敏感的。”

陈香梅又急又臊，冲着姐姐嚷道：“我跟这个人真的刚认识，我想写关于他的采访手记，这对我的前途至关重要。他是随和的人，你一接触他就会知道。”

几天以后，陈静宜搭乘美军运输机离开了昆明，她未能说服妹妹一道去美国。

4 风从南方吹来，吹过昆明城，带来郊外泥土的芬芳，闻上去很香。长途迁徙的候鸟，爬上翠绿色的琉璃瓦，悄悄谛听圆通寺的暮鼓晨钟。

中央通讯社的吉普车，把陈香梅送到第十四航空队驻地，她又一次来这里采访。

陈纳德不在。作为指挥官，他一会儿飞重庆，一会儿飞德里，出席各种军事会议。

出面接待的是新闻官霍顿中校，他负责发布所有的新闻和战报，而关于陈纳德，此人又是最可靠的知情人。

陈香梅提出的，全是关于陈纳德的种种问题。

“啊，安娜小姐的胃口真大！换了别人，我会断然拒绝，可是对你，却是一种例外。”霍顿殷勤地笑着，打开抽屉，把一大叠打印材料递给陈香梅：“这是本人写的一些有关将军的报道，现在全归你了。”

陈香梅急急翻看材料，耳边，又传来霍顿的话语：“除了这些书面材料，假如你有兴趣笔录，我还可以口头替你补充一部分。”

“简直不知道如何感激你！”陈香梅喜出望外，马上摊开笔记本，用英文进行速记。

夜里，邻居都入睡了，只有陈香梅的灯还在黑暗中亮着。霍顿送的材料把她迷住了，她贪婪地阅读，毫无睡意。陈纳德其人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她以前没听说过他呢？

她现在知道了，陈纳德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路易斯安那州度过了童年，1917年8月加入美国陆军，随后转入空军。后来，当了空军中校的陈纳德因患耳疾，提前退役。中国抗战爆发，他最先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旋即组织美军志愿航空队，参加滇缅路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召回美军现役，提升为少将，指挥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印缅战区作战，卓著勋劳。

陈纳德不远万里，援华作战，使陈香梅敬佩不已。现在，她期待与他直接晤谈，以求更深的了解。

陈香梅又去求助霍顿，新闻官答应给安排一个时间。自不待言，他也希望时常见到陈香梅。

5 约见比陈香梅预料的来得快。

一个周末的上午，霍顿打来电话，说是将军愿意见她。半个小时后，陈香梅已如约赶到。

她进门便看见了他。陈纳德的军服军裤都熨出了笔挺的折线，领带的颜色跟他眼睛的颜色相近，皮靴擦得光可鉴人。他领口露出的雪白衬衣也是浆过的，挥发出男用香水淡淡的香味。

“请坐，安娜小姐，咱们是老熟人了。”如同前次那样，陈纳德用和蔼的语调，驱除了陈香梅的紧张。

陈香梅很想知道，这位从小沉湎于打猎、钓鱼的野孩子，怎样成为年轻的飞行教官？他所写的《驱逐机的防御作用》一书，为何竟成了美国陆军航空学校的教材？他那曲折的经历中，还有哪些传奇故事？

她想问及许多，然而一开口，却是新闻记者典型的提问：“将军，有

什么新的消息？”

“有的，但说来让人沮丧。”陈纳德说，“我派了一架飞机去印度接运邮件，但它载回来的却是一批给中国士兵穿的球鞋，不知是谁办的这种荒唐事。我的部下起码有三周没接到邮件了。”

陈纳德想表现得幽默些，但陈香梅听了却不是滋味。有人曾告诉她，将军正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日本人以及驻印度德里的空运司令部里的官僚主义者。

“不提它了，不提它了，提起就让人头痛。”陈纳德说，“我们还是谈点开心的事吧。”

陈香梅立即转移了话题：“将军，您能告诉我一点有关警报系统的情形吗？”

陈纳德容光焕发，因为那个警报系统是他的杰作。它遍及中国西南诸省，由电台和电话联系在一起，一方有警，八方周知。

虽然谈的是些极普通的话题，从陈纳德口中说出来却绘声绘色，很有吸引力。

这次采访定下了以后的格式：采访后总是一道进餐。每次访前，霍顿中校照例限定不得超出10分钟。但这个限定总是被陈纳德打破，有意延长晤谈。

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家宴上，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社交场合，陈纳德尤为健谈，他的学识和见解，给陈香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职业性的关系，日渐发展成私人间的友谊。

6 新春到来的时候，他们仍然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仍然只是在公开场合见面。不过，见面时已不再需要客套或寒暄，坐到一起便是自然的交谈，甚至是继续上次的话题，好像没有一点间隔。

他喜欢从侧面欣赏她那洁净的面容，欣赏她那微微翕动的鼻孔，欣

赏那只不停往笔记本上写东西的灵巧的小手。她是他见过的感情最为纯真的姑娘。

陈纳德渐渐爱上了陈香梅，尽管他很难承认。经常性的往来，使他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刻也不能平静。他竭力想否定这感情的纠结，然而徒劳无益。要不，当他派飞机去轰炸汉口、南京的日军机场，当他召开严肃的军事会议，当他闭门研究敌机的性能时，为什么总会想起陈香梅，甚至听到她那悦耳的声音呢？

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动了密谋已久的“一号作战”，先后进攻河南、湖南和广西，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丢城失地，全线震动。蒋介石电召陈纳德去重庆，商讨陆空军配合。

衡阳失陷之夜，陈香梅辗转卧榻，难以入眠。她有四个妹妹正在桂林上学，近来下落不明。据说，日军先头部队正沿衡阳到桂林的铁路推进，成千上万的难民不断逃离那个地区。

如今，她只能求助于陈纳德了，人们不是说，他是“最接近神的人”吗？

一天早上，霍顿打来电话，说陈纳德已返昆明。陈香梅放下手头的工作，急忙赶到巫家坝机场。

“上周你父亲拍来电报，请我协助寻找你的妹妹们。我已派出特别搜索队去金城江车站，在那儿接应她们。这消息或许能让你愉快，我们会找到她们的。”陈纳德说。

泪水大量涌上陈香梅的眼脸，她一点头，泪珠就成串往下掉。

陈纳德那瘦削的脸上满带倦容，嘴角却浮现着亲切的微笑。他在百忙之中，撇开自己的忧虑和困难，为几个无告的女孩奔走，他的心是仁慈的。

陈香梅心里担心：美军搜索队能从潮水般的难民中找到她们吗？

过些日子，有个电话突然打到通讯社里来。简短的通话之后，听筒里响起嘟嘟声，对方把电话挂断了。可是陈香梅却泪流满面，忘了放下电话筒。

同事们都一下围过来，向她说着安慰的话：“是坏消息？香梅，我们都替你难过。想开点，这是战争。”

陈香梅破涕为笑：“是好消息，搜索队找到了我的妹妹们。因为太快乐，我才流的泪。”

她是天主教徒。她皈依天主，笃信天主，永远赞美天主。此刻，她以同样虔诚的心情，赞美着另一个人：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

7 女儿们俱已脱险，远在旧金山的父亲却心有余悸，他接连来电，要女儿们全部去美国。那个国家位于大洋彼岸，远离了战火，是一块安静的绿洲。

订好机票那天下午，陈纳德请陈香梅到他办公室去喝茶。天上下着毛毛雨，阴郁的寒气蠕动在地图和卷宗之间，蠕动在他们心里。红茶是滚烫的，却驱不走这股无形的寒气。

“听说你们已预订了机票？”陈纳德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陈香梅。“这么说，咱们就要分别了？”

“是的。”陈香梅小声答道，用手捂着茶杯，颤抖得厉害。“我不知道怎样感激您，我会想念您的。”

美军航空队司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尊化石。然而，他那宽阔的胸脯却一起一伏，心潮难平。他期待的不是感激，而是别的。他那深陷在眼眶里的双眼，直愣愣地望着纷飞的细雨。

“听着，安娜。”陈纳德头也不回地说，“如果你有任何不想走的理由，我可以取消你的签证。不过目

前办理签证十分困难，你要考虑一下吗？”

陈香梅一时无法回答。

她抬眼从背后望着窗前的陈纳德，明眸中流露出的那种敬慕神色，是许多男人一生中根本见不到的。她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确想留下来，而他是她想留下来的唯一原因。而陈纳德所说的话，所作的暗示，也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希望她留下。

他在等着她的回答。

几分钟的时间，像是有几年那样长。

陈香梅的嘴唇动了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那是她必然的回答：“将军，我并不认为我真的要走。我打算留在昆明。”

陈纳德慢慢转过身来，发亮的眼睛里隐藏着满怀的喜悦。“那就这样吧。”他说，“可是我还是在想，我是不是干了一件蠢事？”

“这只能由时间来回答了，将军。”陈香梅莞尔一笑，又赶紧低下头去。她凭第六感觉，明白陈纳德喜欢她留下，对她来说，这便是一切了。她还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8 抗战胜利后，陈香梅从昆明调往上海工作，干的还是老本行。1945年12月下旬，在办妥离婚手续后，陈纳德从美国启程，前往上海来找陈香梅。

在他宽阔的怀抱里，她觉得自己软弱得出奇，像个小女孩似的。不知为什么，她还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我真想你，小东西。”陈纳德说。他头一回这样称呼陈香梅，这个爱称专属于她。

这看似水到渠成的联姻，却还得经过几许曲折。

最大的阻力，来自陈香梅的长辈。

陈香梅此时的监护人，是她那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红岩村接见第十四航空队的三名美国军官

定居上海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两位老人都表示反对。

外祖母对陈香梅说：“以你的品貌和条件，肯定有不少门当户对的男人愿意娶你，为何偏要去找一个比你大33岁的外国小老头？”

外祖父认为年龄无关紧要，但是他同样反对陈香梅嫁给外国人。“我翻过家谱，在我们的家族中从来没人跟外国人结婚。跟洋人结婚没好处，他会把你从中国带走。”

陈香梅只能软缠硬磨。

陈纳德则经常上门陪外祖父打桥牌，最终感动了老头子，表示同意。

至于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他们是通过协商解决的。陈纳德信仰新教，陈香梅信仰天主教，为了不得罪各自的主神，他们干脆决定不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1947年10月，在多次来信干涉无效的情况下，陈香梅的父母从美国飞到上海，亲自出马劝阻女儿的婚事。他们觉得让陈纳德作朋友可以，作女婿却不合适。

陈香梅的父亲即将改任驻沙捞越总领事，生拉活扯要女儿随他赴任，担任他的秘书。继母则旁敲侧击，说是等她年纪大些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年龄差距太大，是他们不

赞成这桩婚事的主要原因。

“我知道二老都是好意，”陈香梅说，“但我宁愿跟一个中意者共度五年或十年的日子，而不愿跟一个凑凑合合的人厮守终身。”

眼看这事儿要黄，陈纳德也横下一条心，指名要找岳父大人谈判。

“陈博士，您可能忘了。”陈纳德陪着笑脸说，“想当初我在金城江替您搭救了好几位千金，如今我希望娶一位作妻子，难道算是过分的要求吗？”

就这一句话定了胜负。

1947年底，陈纳德与陈香梅在上海结婚，轰动一时。

四十年代末，他们先去台湾，后到美国定居，共度了10年美好时光。

1958年7月，陈纳德病逝于美国，终年68岁。其创办的“飞虎”航空公司，由陈香梅出任董事长。她积极参与政政，历任美国共和党财委会主任、总统府出口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共和党亚裔委员会主席、总统学者委员会主任等要职，活跃于美国政坛。她还出书40余种，是美国的知名作家。

(责任编辑：白雪)



# 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

——“引洮上山”的回忆 · 杨闻宇·

大跃进年代，甘肃省有的领导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生发出奇想，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胆，就能把洮河水引上多高的山。他们在三年的时间里，耗资数亿，用工6000万，而这项宏伟的“共产主义工程”成败如何呢？请看……

——编者

美丽的洮河，它曾为古老的雍州山水悄悄地增添了不少妩媚。大禹从这里走向鸟鼠山，导渭水而入黄河。洮河里的石门峡、黑甸峡，陡崖峻嶒，水声如雷。每逢夏天，两岸树木苍翠如屏，一排排木筏顺水而下，歌声在峡谷间缭绕不绝……可是，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洮河左岸却是一大片惊人的定西干旱区，赤日曝晒，大地如焚，浮土三尺，寸草不生，“其水源的缺乏，堪称全国第一。”

1958年6月17日，座落在洮

河畔的古城，无数面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12000余人隆重举行“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开工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定西地委第一书记窦明海、省长邓宝珊先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张仲良指出：“引洮工程，标志着甘肃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高涨。……是英雄人民的创举。”

张书记称的“创举”，是要将洮河引过海拔2130公尺的华家岭，灌溉甘肃中部、东部干旱地区的2000万亩土地，总干渠要跨越大小山沟880余条，全长1400公里。单

是总干渠的长度就比世界上著名的苏伊士运河长6倍多，比巴拿马运河长13倍多——而且在两年内要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工程，谁能说不是一项“创举”呢？！

“创举”之下，洮河将折道东流，广漠、洪荒的干旱地域将呈现出一幅瑰丽的图画。每年能增产粮食45亿斤，发电30万千瓦，可植树造林2500万亩，扩大草原1500万亩，养牛25万头，养羊180万只，养鸭300万只，产鱼600万斤，有500公里渠道可以通航。

规模这样宏大，如此轰动全国的“共产主义工程”，最初方案是怎

么提起、又怎么决定的呢？

1958年1月甘肃省党代会期间，定西地区水利局局长梁兆鹏带着几位测量人员，赶到会上向地委书记窦明海汇报了进一步引洮抗旱的打算和设想。吃饭的时候，窦明海顺便向坐在同桌的省委书记张仲良汇报了这项工作。张仲良听得兴奋了，大声地说：“好啊！这个想法不错。一言为定，这个工程由省上抓啦！省上要扩大规模，变成全省的一项重点工程。”

“引洮上山”的巨大工程就这样在饭桌上敲定。1月拍板，6月全面开工，10多万民工就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本来，这项“技术复杂程度和工程任务的艰巨是历史上所少见的”（张仲良语）工程，要进行收集资料、查勘、论证等正常的工作程序。可是，在“跃进形势逼人猛进”的大局下，他们认为这一套程序是“陈规旧习”，创造了“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作方式，6个月内就完成了5年半的任务。

“引洮河和大通河灌溉工程，从元月15日到2月15日，业已踏勘完毕”（《甘肃日报》1958年3月4日）。

“经过千山万水，行程一个月，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渠线”（《甘肃日报》1958年3月26日）。

张仲良在开工典礼上高声赞扬这一工作方式是“思想解放”的成果。

## 二

6月17日开工典礼，17万民工高举着“水不上山不回家”的保证书在洮河畔表示了决心。那雷一样震荡的声音，火一样热烈的队伍，这在古城荒山是从来未有过的场面。这是解放了的甘肃人民的自觉行动，迥异于古代秦始皇修长城时的强迫式的心态。

又岂止是17万民工的热情！全省1260万人民，无不为了“引洮工程”而欢欣鼓舞。开工典礼的前夕，全省便有30万件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医疗物资运到了工地，租居于施工渠线的农民，腾出1500多间房子供民工住宿。会宁县的群众在三天之内捐献了铁锅、蒸笼、案板、衣服等8000多件。

共青团甘肃省委号召全省少年儿童广泛开展“支援引洮上山工程”的活动，儿童们收集废铜破铁、头发废纸还有猪鬃之类，支援“引洮”。他们还用天真的双手制作了2000多盏小油灯。一到晚上，民工住的窑洞和房屋，一下都亮起来了。

全省广大农村男女妇孺的革命热情为什么这样高涨、这样蓬勃呢？陇西县的一位妇女王梅花算是道出了庄稼人共同的心声：

“太苦了！定西要有了水，幸福万年啊！”

洮河东岸，在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的土地上，25个县市，到处是童山秃岭，沟壑纵横，终年风沙侵袭，平均年雨量不过200公厘，从1644年到1906年间，发生大小旱灾114次，省志、州志、县志上，随处是“大旱，民饥，多卖子为奴”，“民饥馑，饿殍载道”，“积尸梗道，臭不可近，人相食，甚有碾骨挖尸者”的记载。

洮河上山以后，将把35亿立方的水送往干旱区，2000万亩土地将变成水浇地。除了灌溉，还可通航、发电。在高耸入云、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上，可以行驶重二十至二百吨各种船只。古城到董志塬，河道的落差是700公尺，沿河将建立一百多个大、中型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五十余万千瓦。

面对这样一幅图画，谁能不动心呢？

那时候，热情豪放的甘肃人民，

将会昼夜响彻着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我们伟大的明天——共产主义的歌声！

日子越苦，人们的梦幻越香甜。这是大自然长期压抑在甘肃人民胸脯上所形成的一场大梦。难得的是，沉浸在梦境里的17万民工，在两年多的岁月里，确实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惊人力量，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写下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篇章。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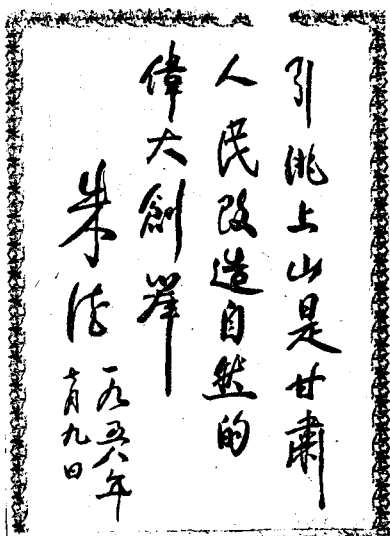
整个河道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施工的。你简直难以想象：十几万民工来到高山大壑里，没有房住，挖洞穴居；没有菜吃，下工后到四山挖野菜；没有床，睡在地上，没有防雨的衣服，自己编蓑衣。在九甸峡、拉马崖坚硬的岩石上，人们用的什么工具呢？一把锤，一根钎子。在关山、宋家山、宗丹岭进行深劈工程的人们用的什么工具呢？镐头一把，铁锹一张。人们又从家乡拿来绳子、木料、门扇、铺板，亲手做成几万件工具。没有炸药、铁、水泥、石灰，自己办下了600多座工厂。没有修理工具的设备，便垒石为炉，柴草作炭，石头当砖，镢头代替锤子。

石门峡到九甸峡，一连18峰，鬼门关、雪崖山、转角崖、野虎崖、玉皇峰、老虎嘴，一峰比一峰险恶。工地长42公里。河道设计在半崖上，距洮河水面180米。靖远工区的共产党员康映辉、共青团员李珍，两个人腰拴一根长达一百多公尺的绳子，像壁虎一样贴在崖上，他们放上钎子，一锤打下去，身子要晃动许多次才能打第二锤。就在这危险的环境中，人们爬上爬下，抡起过千万次小心翼翼的铁锤。半个月的工夫，才在崖腰上劈开一条半尺宽的小径。

宏伟的工程规模、高涨的革命

热情,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447位代表参观了引洮上山工程。国务院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及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以很高的评价。动工半载,全国共有20个省、自治区650多名代表前来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也特地来视察。他指出:“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想敢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的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

在会川工程指挥部的山崖上,刻写着朱德同志的题辞:



#### 四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几乎一直是在“反保守”、“反右倾”的批判声中、斗争声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

为了完成土方任务,陇西工区一位头头发明了“引水冲运”的新

花样,而且说什么“水流哗啦啦,一流一千八”,扬言一天就能完成1800方土。指挥部工务处李鸿章处长把那位头头叫来当面质问:“你说一流一千八,我问你:你说一千八百方水是多少?”问得那位头头张口结舌。针对引洮工程,甘肃省委提出的口号是“苦战两年,改变甘肃落后面貌”,李处长怎么思量也觉得不现实,于是就说:“我看这个工程是‘18年的王宝钏’,三五年不可能完成。”他的这些言论,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有人画了一张名为“骄傲的处长”的漫画,漫画里李鸿章叼了个大烟斗,烟斗冒黑烟,烟里裹着的文字是“我除了不知道我几时死之外,天下事我全知道!”侮辱性的大批判,似乎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也似乎是维护“正确的革命方向”的最有效的手段。

批判可以暂且堵住人们的嘴巴,而真理的光芒,总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透漏出来。

工程施工已经一年零两个月,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和三位苏联专家来到现场,苏联专家他们是:勃列索夫斯基,斯拉维扬诺夫,罗斯托莫夫。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性问题:

“提供的设计资料不足,并且不精确……目前已在长达400公里左右的战线上施工,但是所控制的灌溉面积和它的范围还没有弄清楚……”

苏联专家的意见措词虽然平和,内容却相当尖锐。有些是明显含有否定性质,有些简直像是在教诲小学生,有些意见是在“泼冷水”。苏联专家姑且不论,水电部的委员孙辅世和水电部工作组的成员,敢于这样直言不讳,的确是要有一些胆量的。在那个丝毫见不得“民主”的年月里,那些头脑发热而又手中有权的人,是随时随地准备

将“右倾”帽子甩向任何人的。

现实是铁冷的,无情的。引洮工程干了还不到半载,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已经悄悄地演变成“四边”政策了,增加了一条“边修改”。

1958年11月25日,《甘肃日报》报导: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现在采用绕线、深劈等方法,“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作为明渠”。

规模如此宏大的工程,就这么轻率地变来变去。深劈之时,最大深劈竟达219米,最大一处开挖方量达2300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简直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又放弃深劈,重新恢复了部分隧洞。

奔流了数千年的洮河是挺牛气、挺倔犟的。最无情的教训是洮河将要脱离原有河道的那个“古城水库”。

古城水库容量为三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是山上运河的起点。倘若拦不住滚滚的洮河水,“洮河上山”将永远是纸上谈兵。1959年5月里第一次“土法”截流,经验不足,发生决口,未获成功。7月初第二次“洋法”截流,据说是工程质量良好,总算是成功了。一月之后,因人为的“破坏事件”,这次截流又“流产”了。10月21日,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数万民工又掀起了第三次截流。

第二次截流中所谓的“破坏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古城水库上的负责人是折永庆、梁兆鹏。8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槽,炸散一次堵塞一次,怎么也无法导流。堰坝新砌,外侧厚度不足。洪峰水位扑着往上涌,距堰顶只有一米上下了,工地上两万多民工组成了抢险防洪突击队,



拼命地加高加宽围堰。告急的电话打到省上，副省长李培福代表省委电示折永庆、梁兆鹏继续采取紧急措施，保证水库安然无恙。洪峰越来越猖狂，考虑到两万民工的生命安全，在危在眉睫的形势下，折、梁只好临阵决策：决口排洪。

省上得知了“决口”的消息，李培福当即在电话里对引洪工程局发火：“查！谁干的？！这是反革命破坏事件。”事件发生后，引洪工程局党委先后举行了两次扩大会议，各个工区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群众会，对人为决口的“破坏事件”，以及隐藏在引洪工程各部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你们能扒开围堰，却动摇不了我们引洪上山的决心！”

最后，撤销了折永庆工程局副局长长的职务，梁兆鹏背了个警告处分。揭露和批判“右倾”思潮的斗争，这只是一个小小插曲，比这个更冷酷的事例，工地上多的是。笔者在这里愿意为尊者讳，愿意“广结善缘”，留有余地。

巧合的是，正当古城水库发生“破坏事件”的时候，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孙辅世，对引洪工程提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

“修改”建议：“抬高古城水库大坝20米”，以便增大库容，为调节水量创造条件。这样，古城水库坝高将是62米……淹没农田7000亩！

工程上马不到两年已经是难以为继了，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时，省委书记张仲良在会上下达死命令：“引洪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它集中地反映了全省人民摆脱更穷更白面貌的迫切愿望，和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两个“只准”，两个“不准”，堂堂的书记心里发毛了。

到1960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受到饥荒困扰的引洪工地上的民工，又投入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高潮”。

## 五

1961年8月8日，《甘肃日报》上出现了介绍“洮河两岸”景观的一则消息，并附有四帧景色秀丽、幽雅恬然的风光照片。

文字也罢，照片也罢，“引洪上山”的音讯突然没有了，仿佛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引洪上山”之事。其实是“干了两年，下

了三年”，上马何其仓促，下马何其艰难，这时节正处于异常痛苦的“下马”阶段。报纸上只字不提，这是政治上的需要，是宣传上的“常识”。

后来的权威性的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三年间耗费6000万工，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挖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实际是个“亏心账”，在那个大到“共产风”、随意“平调”的年月，那么多慰问品送到了工地，民工吃一大碗羊肉泡馍，交5分钱的调料钱就行了，民工一个月吃粮竟达90斤。在宗丹岭劈山填谷时，有个民工开玩笑说：“咱们吃下的面粉合起来，能把眼前这个峡谷给填满。”类似这样的消耗，并未计算在1.6亿元之内。因为那是那个最不善于“算账”的年月。

有人说：“引洪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是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恐怕主要指的是死人之事。工期拖到后期，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了多少？30年过去了，至今无从稽考。最易于牺牲生命的，要算是工伤事故；工伤事故里，被炸药炸死的最多。600公里业已动工的沿线分成12个工区，每个工区都有一、两座自设的陵园，埋葬在这荒山野沟里的民工，总数不下2000余众。

埋葬在洮河畔的，不仅仅是一群年轻的生命，更是埋葬着甘肃人民蓬勃的、炽烈的、火一样的热情，也埋葬着人们无比美好的理想，一片巨大的真诚和信任。

水电部在总结35年来的水利建设经验中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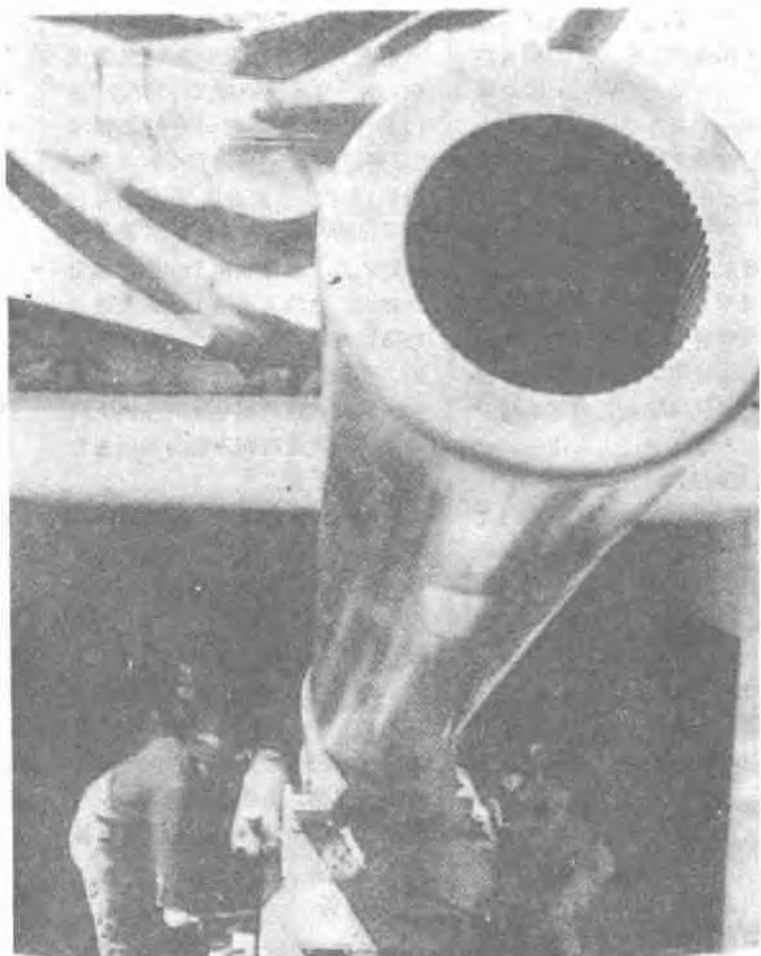
兴建引洪工程是一大蠢事！

（责任编辑：刘家驹）



# 金门岛的秘密

· 竹繁 ·



1992年11月7日，是金门岛军民不同寻常的一天。

11月6日上午9时30分，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叶竟荣中将宣布：金门地区从1992年11月7日零时起解除戒严，结束已经实行长达36年之久的所谓战地政务，实施地方自治，军民分治，还政于民。

从此，一直是反共桥头堡的金门岛，将以新的面孔呈现在海峡两岸同胞的面前。人们憧憬金门的明天，但却不会忘记它的昨天，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历史作证——

**教训惨重：我军9  
千被全歼  
首次炮击：“国军”  
四将遭伤毙**

金门岛又称吾州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与厦门隔海相望。

金门岛又分大金门与小金门。大金门东西宽，南北狭，形同哑铃，面积为120多平方公里。东距大金门2公里，西距厦门6公里的小金门面积只有10多平方公里。

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九军中的6个团的兵力担负起了进攻金门的重任。这些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虽然都立有赫赫战功，具备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却与全军其他部队一样没有两栖作战的经验。根本不懂潮汐、船舶等诸多因素在两栖作战中的重要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指挥员犯了兵家大忌，打了一场无准备、无把握之仗。1949年10月24日晚7时，一场既缺乏渡海船只又没有经过认真研究的进攻金门岛的两栖战斗仓促开始了。由3个团组成的第一梯队分别

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后，在航渡中即遭到金门岛上敌炮火的猛烈拦击。登陆之后，船只因退潮全部搁浅，只有几十艘木帆船在人推肩扛的推动下离开了金门岛。谁知这些返航的船只，先是遭到敌滩头的炮火袭击，接着又遇到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后来尚未击沉的几艘又莫名其妙地误入敌舰的潜伏区，被我炮群误为敌增援船队而全部击沉。运输第一梯队的船只一艘没回。船只严重缺乏，后续部队无奈，仅运送了4个连上去增援。这样，尽管我两批登岛部队临危不惧，英勇战斗，但因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以失利告终。我两批渡海部队的9086人（含船工、民夫等350人）大部分阵亡，少数被俘。针对金门失利问题，11月8日，毛泽东指出：“以三个团去打敌人三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在这场攻守战中，国民党军虽然也付出了伤亡9000余人的沉重代价，但由于守住了金门，所以便以胜利者自居，又是修整战场遗迹，又是建纪念碑，好一番宣扬。我军虽有报一箭之仇的打算，但后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剿匪任务繁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决定停止解放金门的任务。

如果说，我军攻打金门的失利成为国民党军一时得意的资本，那么，我炮击金门的威慑则极大加剧了国民党军的恐惧感。

这场炮击并非为了报9年前金门失利之仇，也不是要占领金门，而且运用“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战术以达到严惩蒋军警告美军之目的。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导演的一场精采的活剧拉开了序幕。

8月23日17时30分至18时55分，我强大的炮兵部队在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对金

门实施炮击，在85分钟的时间里发射炮弹3万余发。在这次炮击中，国民党军遭到重大的伤亡，“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赵家骧和“澎湖防卫部”中将副司令吉星文被击毙，2名少将被击伤。还毙伤其它官兵6000余人，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海上运输线濒于中断。炮击开始时，台湾为刚刚上任的美驻台协防司令斯奈德而举行的宴会刚开始。获知这一消息后，宴会立刻中止。从此，这位司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有6周时间不曾与其同去台湾的妻子见面。

炮击！封锁金门。这场以军事手段导演的政治战和外交战的基本目的实现后，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发表了“打单不打双”的文告，以给对方一个喘息自救的机会。之后，每到双日便成了金门守军忙于补给的日子。1979年1月之后，我方虽发表公告停止炮击，但不知是习惯成自然，还是心有余悸，从台湾到金门去的船队还是逢双日露面。

### 奇特政务——

## 军政合一“联保” “自由”岛上无自由

“台湾战地政务委员会”是台湾当局强化对金门地区的统治，使之适应战时需要的最高军政组织机构。该会的主任由金防部司令兼任，秘书长则由金防部政战部主任兼任。政务会在金防部的严格督导下执行台“国防部”制定的战地政务。金门县政府则在政务会的政策指导下，具体实施政务。县长由台“国防部”派现役校级军官或相当校级的退伍军官担任，副县长由金门县党部主任担任。

在金门的乡镇，公共场所和交

通枢纽，都遍布着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处”和“福建省调查处”的特务以及金防部的宪兵和金门县的警察。金门警察局还把警员派驻到每个村落。在渔民比较集中的村子还指派“渔民管理员”执行特务、警察任务。“居民户口查察记事卡”是从乡到村都必须建立的；在本邻内找三户以上做“联保人”是金门每个居民都必须办理的，如有变动，必须办理补（换）保手续。如发现违者，将会受到所在警察所的处置。

在金门，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金门政务会规定：“居民外出留宿，应填外宿表”，经联保人、邻长、战斗村警员签名盖章后，送村、里办公处的干事审查、登记，加盖副村、里长印章方能外出。申请人到达外出地点，还要申报户口，办理留宿登记和接受当地警特的追查。如要从金门到台湾，手续就更为复杂，先交纳手续费，再经过村里、乡镇和县政府民政科、警察局安全室、民防总队等5个单位逐级盖印，最后还要由“金防部”批准发“出口证”，方能动身。每次一般限期不超过3个月，如果逾期则要向驻台北的“金门民众服务站”申请。从台湾去金门，则必须要持有两证：一是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核发的“出口证”，二是金门的“入口证”。这样似乎还不放心，为了防止岛上的居住者中混有嫌疑分子，金门的宪兵、警察还经常以“突击演习”抓“共军水鬼”，“搜查逃跑水兵”等为借口，突击查户口，如果遇有特殊情况，各种检查的名目就更为繁多。

金门岛上的生活是十分沉闷和压抑的。为了防止岛上的军民收听来自大陆的信息，台湾当局规定，岛上的5万名国民党驻军和居民都不能拥有收音机。自1949年11月以来，金门一直实行宵禁，岛上的所



▲蒋介石先生写的“毋忘在莒”

有居民都必须听“钟声”作息。每天晚上一到10时，街面上便成一片漆黑。岛上只有一座电视台，而且是军方的，当地居民在“工余”时，要不时穿上蓝色的民防制服去参加军事训练。岛上的清规戒律颇多。居民不准聚众，不准养鸽；婚葬、拜佛等集体活动也要事先“申请”，经核准方能举行。在城镇的街巷、码头，白天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放哨。有关安全部队名目繁多的检查常年不断，连篮球、排球、塑料桶，甚至乒乓球都要进行检查，因为一切有浮力的物品都可能被偷渡大陆者利用。金门方面规定，渔民经亲朋好友担保，方能领到“渔民证”，编入渔民队。每次出海前一天去乡镇公所开具证明；出海时要随带渔民证，身份证，接受检查站的检查。出海时间也有严格限制，早上6时至当日下午5时为出海时间，所有渔船必须按照统一编号和在指定的海域作业，然后以当天规定的灯号、旗号进港。为防止接近大陆时出现叛逃事件无法拦截，对作业海域进行

了严格限制，规定海域不得超出大金门3000米以外，外海捕鱼需在距大陆10000米以外。同时还规定不准在海上过夜的渔船返港，所有渔船必须都锁扣在岸上，桅杆、篷帆、篙橈要全部取下交给驻军看守。如果要讨小鱼或要到海滩上养殖海蛎，必须要申请报领“渔民证”，在海滩劳动时要持此证。似乎作完这些之后还不放心，又规定，必须要建立以船为单位的“海上反共爱国小组”，指派曾受过特务训练的“政工人员”督导渔民执行“反共爱国行动准则”，强制渔民进行“心战策反”和收集情报等活动。

#### 军中防叛——

### “保防细胞”层层安 不择手段设“防线”

为了稳住军队，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台湾当局在军队中采取了繁多的措施和手段。

一是层层安插“保防细胞”。这些“细胞”实际上就是台“国防部”、“总政战部”安插在部队中的特务。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打上小报告，不是受到监视跟踪，就是被收审判刑。因此人人自危，连平时最知心的朋友在相互交往时也得时时刻刻不忘戒备。

为了防止军人“心理防线的崩溃”，台湾当局还在军队中坚持进行“莒光教育”，灌输“爱国必须反共，反共就是爱国”的反动思想。1951年冬季，蒋介石在巡视金门时，将“毋忘在莒”五个大字题于太武山的石崖上，其目的就是梦想田单复齐的典故重演，不忘反攻大陆。

二是建立和巩固军中“心防”战线。制定多项防范措施，加强政治控制，防止发生“匪谍案件”是国民党军巩固“心防”战线的主要内容。如规定部队每月结合保防教育，发动官兵检举揭发军中的“匪情”，如发现有私藏“严禁品”者当场逮捕，按“通共罪”论处。

三是实行防“叛逆”奖惩措施，

凡未经批准私自外出超过 27 小时者，即作逃亡论处。私自向第一线海岸沙滩接近者按“叛逃”论处，重者就地处决。知情不报者按“叛逃者同谋”论处。同时，对易发生“叛逃”的十种人员明确提出要严加控制，如：平时沉默寡欢的；遭受记过处分的；工作消极牢骚怪话的；与上司不和经常抗命的；在大陆有亲属的；对政治现状不满的；隐瞒游泳能力或游泳超 600 米的等。

四是建立政战“互助组”，实行“以兵制兵”。

### 罕见丑闻——

## 特约茶室有名堂 稳定军心用军妓

金门，不仅战略地位有其特殊性，而且岛上的人口结构也特殊得很。由于青壮年大多数都流到了台湾，老人与小孩在当地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作为台湾当局与大陆对峙的前沿阵地，金门岛上的军人众多，约占岛上人口的半数，而且多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于是岛上的年轻姑娘就成了风毛麟角。如果谁家有个姿色诱人的姑娘，就无疑等于有了株摇钱树，非开店不可。因为有漂亮姑娘开的小店，生意必定兴隆，顾客中自然多是军人，登门买东西是假，去逗逗女孩开心是真，动手动脚，欲占便宜的事也时有所闻。这样，金门的百姓越来越滋长了对驻军的强烈不满。

怎样既能解决金门岛上军人的性饥渴，稳住军心，又能平息百姓的不满？现在无从考证是出于哪位高参的主意，1956 年在金门岛成功村出现了第一家由金防部管理的“军防部特约茶室”。以后这类的茶室不断增多。这些“特约茶室”实为“军妓室”。这些“茶室”早期都是由台国防部统一办理，大概是顾

及到名声，从 1984 年始，则由各防卫部承包给了民间的“商人”。军妓的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由商人回台湾招募，二是在台湾被判刑的年轻女犯，女犯如到“外岛劳军”还可折抵刑期。70 年代轰动台湾高雄地区的鸳鸯大盗中的女主角，在判刑后就到金门当上了军妓，她所在的“茶室”一时竟门庭若市，好不热闹。在每个“茶室”的门前都有一张写着“请先买票，凭票入场”的牌子，一张票一般在 150 元至 200 元台币之间。可能是僧多粥少的原因，有的小姐平均每天要接客 30 多人。每逢春节，在这些茶室的门前常常会出现这样两副令人寻味的对联。

一副是：金门厦门门对门

大炮小炮炮对炮

另一副是：大丈夫致命沙场

小女子献身报国

用军妓稳定军心毕竟是丑事。1992 年台立委陈水扁在立院严厉抨击了金门军妓问题。很快国防部宣布“茶室”全部废除。

取代“茶室”稳定军心的措施是放宽官兵休假探亲和其亲属登岛参观的限制。

▼马山观测站，清晰地看到厦门的风光

### 金门开门——

## 卸去盔甲着常服 广迎游客当财神

解除戒严后的金门，将成为旅游观光热点。台湾有关当局正在全力投入，着手经营这一热门路线。

令人颇感神秘的金门，虽说没有人类现代化文明的精琢，但它有洁白的沙滩甜蜜的水质，典雅的古厝和醉人的清风，还有可一睹大陆厦门远景的特殊地理条件……这些诱惑力将会吸引众多的游客。

目前在台湾办理金门旅游，手续不繁，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影印件两份，交纳 12500 元台币就可实现金门旅游梦。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祥和，或许不远的一天，金门岛上的游客可以直接过海到近在咫尺的厦门、鼓浪屿一游；同样大陆的游客也可从厦门悠闲地去饱览一下金门岛上的秀丽景色和风土人情。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金门岛将成为玉手巧联海峡两岸同胞的友好天使。

但愿这一天早日成真！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泸沽湖有个神秘的土司夫人

·字心·

她，聪颖，美丽，16岁那年，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为实现自己的治彝方略，把她打扮成“文成公主”，做了泸沽湖的土司夫人。十年含辛，终于握持了那片王国的权力。她品赏了人世间情欲和权欲的无尽欢悦，也领略了那13年劳动改造苦涩的滋味…… ——编者

泸沽湖有很多谜。比如说，山上为什么不见花？水里为什么不见舟？又比如说，他们的走婚制起于何时？等等，在当地政府举行的类似新闻发布会的座谈会上，越叙述越玄乎，我有些失望了，挨我而坐的杨正明区长悄声对我说，隔这里不远住着一位夫人，她是泸沽湖末代土司的二太太，要是我愿意，他让人领我去看看。

我当然想去，问明路径，便独自前往。

在沿海乡农机站隔壁，有两间不算太小的屋子。靠北面的一间是供销社的小商店。屋里黑糊糊的。我走近了，才瞧见一个老妇人立在柜台边上抽烟。

她没有问我买什么，却打听我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话里夹着成都口音，听起来很亲切。

我一一回答了。她

她长长叹了口气。“我没有福份回到成都去了。”她说。眼神迷惘而凄凉。若是擦尽密布眼角的皱纹，这双眼睛却也令人百看不厌。

“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我问她。她回答说16岁来泸沽湖，今年六十有三了。她邀请我到她屋里的锅庄边坐下来

她自然就是我急于探望的土司夫人了。

她叫曾淑明。父亲曾光宇，国民革命军24军的经理处主任。1943年新年，曾淑明在学校饰演秦松夫人的晚会，曾光宇去了。他跟学校说这台戏极好，值得刘主席动步。刘文辉其时身兼西康省主席，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他去了，倒也属于分内之事，并且跟着一群人，这群人里头就有后来给曾淑明带来一生磨难的泸沽湖的土司喇保臣。

这位自称成吉思汗十四代孙

的喇保臣，本来叫做喇鸿嘉，他统领泸沽湖的48个村落，36个伙头。喇土司可谓马背民族的真正传人，为了征战的需要，他保留着一副剽悍的身驱和铁一样的筋骨。年逾40，他对鸦片烟绝不染指，喝酒也相当节制。只有女色，他分外贪婪，像猪膘和牛头肉一样不可须离。此刻他的眼神老是往台上飘去，那位婀娜的相国夫人让他有点魂不守舍。

刘文辉统统看在眼里。

次日，省主席举行了家宴。规模之小，绝无仅有，来宾只曾淑明的父母。

曾光宇夫妇从主席官邸回来，曾淑明母亲站在女儿的书桌旁边，容光焕发地说：“你的福气比妈好，快去收拾收拾，明天让你去攀一门大亲。”

曾淑明睡不安生了。

她接触过一些社会新潮，在学校里，成绩很好，她志在名牌大学。听说北京大学迁到昆明，与清华和南开合为西南联大，她高中毕业后，选中的便是五百里滇池。她很想穿越龙门，在岩石上一站，远眺滇池烟波，思索一翻聂耳是如何纳入那磅礴气势的。说实在的，在她少女的憧憬里，已经萌发了对家庭的嫌怨。她父母迎来送往的，在这支有名的双枪部队①里，不是黑道便是红道，鸦片与抢劫并重，她常常感到压抑和不可名状的恐怖。她早该离开这儿了，只是翅膀还没有长硬。如今认了这门干爹，黑色天堂的梯级她又往上爬了几步，她心里很沉，一晚到天亮她都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噩梦。

第二天，曾光宇夫妇带上曾淑明来到刘公馆。对于一位部属的家庭，接连两日举行家宴，在刘公馆极为罕见。刘文辉却笑容可掬地说：“光宇。我是有点越俎代庖了，我已经将淑明许配给泸沽湖土司喇保臣了。”

在刘文辉的撮合和主持下，当晚就举行婚礼。“光宇用不着备办嫁妆了，”刘文辉在婚宴上说：“我已通知军械库给保臣准备100条步枪和50箱弹药，这就算我送给干女儿的礼物吧。至于保臣呢，你客居省城，归期迫在眉睫，还有很多要办的事，别的不用铺排了，但定情的信物还是需要的，这也是你们泸沽湖的风俗嘛。”他看定喇保臣问，“你那颗大印带来了么？今后淑明就是你的掌印夫人了，这颗印就让她管起来。何况她在校读书成绩优良。”刘文辉最后补充说，“她笔下很是可以，今后无论省府和军部与泸沽湖的文书往来，我这里都认定由她履行其事。”

婚礼并不草率，鸭绿江饭店灯火辉煌，迎门插立九九八十一面彩旗。土司婚娶，彩礼本该有九匹马、



△土司夫人正在售货/马都翠摄于1989年

九头牛、九驮银子九件布，八十一面彩旗权且作了客居在外的代替。军政要员都来了，这是一次难得的盛况。

曾淑明的蜜月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喇保臣率领马队西行，除去通都大邑，他绝不住宿。抵达泸定，已经是除夕的傍晚。他叫马队在铁索桥头停下来打野过年。喇保臣戎马半生，他深知他的武器弹药和马背上的美人都可能招来灾祸，宿营在旷野，依山傍水，有所依托，没有压倒的力量对他无可奈何的。只是苦了新婚的妻子。天苍苍，野茫茫，星月点灯，大地作床，这样的日子她从未经历过。

在昏暗的薄明中，我依稀捕捉到了她的忆念之情。我很想提出一个问题：“你爱这位末代土司吗？”未及试探，她倒明白表示：“我那时候什么也不懂，”曾淑明说，“说实在的，我害怕他这个蛮子，可在鸭绿

江饭店的第一夜我又任他摆布，可后来，总是心甘情愿地当了个蛮子的俘虏。”她深深地出了口气，我明白她非常怀念那段日子。26岁的她其实就已守寡，那是1953年，十年的婚恋实在过于短促。

应该说保臣真恋实情地爱着她。他讨回的不仅仅是供他淫欲和观赏的女人。他并未忘记刘文辉的吩咐，到时候他会让她保管那颗大印，这就是泸沽湖土司的半月衙门。为了旅途的平顺和新婚妻子的得失，殚精竭虑，他实在付出了一男人的幼劳，表现了泸沽湖土司的大度与精明。他把贴身的两个婢子暂时留在雅安了，尽管朱娜姆和朱银贞露出幽怨的眼光。拿得起放得下，这是喇保臣角逐人生的军事学。有

①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 由刘文辉任军长。双枪是指他的士兵持在身上的两支汉阳造步枪，一支鸦片烟枪。

了曾淑明便有了刘军长的支持，而他的土司宝座便得以安如磐石，他对她百个依从千个小心，是新婚的爱恋，也是统治的需要。将情欲和权欲揉搓在一起的婚姻生活，喇保臣第一次品尝，分外够劲，他觉得有滋有味。

只是到了康定，才发生了波折。

康定是西康省名义上的省会，因为刘文辉的政治和军事的实体都在雅安。但这里又设置了一些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保臣不得不在这里停些日子。庞大的马队这回住进了马店。他和曾淑明则落榻在汪家锅庄。

她闲在家无事找事，起身踱两步，信手扒拉着买回的什物。她突然一惊，怎么会有小人鞋？五双尺码不同的藏靴出现在眼前，她顿时愣了。

喇保臣从省政府归来已是深夜。他见她尚未睡，并且一脸焦烦，转动的目光一当在娃娃们的藏靴上溜过，他什么都有底了。他赶忙伏下身去，几乎半跪在曾淑明腿边说：“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来不及告诉你，我是结过亲的，家里还有个太太，做了这么多年的土司能没有个土司太太么？”他见曾淑明故意闭上眼睛，又说，“在雅安我就要告诉你的，可刘军长说，由他作干爹的出面，想来刘军长一定对你和你的父母说清楚了。”曾淑明张开眼，这段说明简直天衣无缝。

她很现实，刘文辉有一整套扩大势力范围的方案，经营泸沽湖计在必成，闹着回雅安会有什么结局？生米已经煮熟成饭，二房就二房吧。人生磁场的功利和瓜葛无处不在，曾淑明已被这片磁场吸住了。

从康定启程，马队的行列里添了两乘软轿。他们绕过贡嘎山，选择了由九龙到木里一线。时而背负山脊，时而跨越急流，一路风寒热

浪，历尽险阻和艰辛，在茅草和砂砾地上足足走了二月挂零。抵达泸沽湖，萤火虫都冲出花苞来了。

泸沽湖居住着在晋代撰写的《华阳国志》里称作“摩梭”的一群人，相传远在古代是纳西族的先民。他们保留着母系社会残留的“阿肖婚”，男不娶，女不嫁，双方各居母家，其婚媾关系是由男方到女方走访，晚上在女方过夜而实现的。但土司出于统治的需要，历来实行的依然是以父系为中心的男娶女嫁。曾淑明有幸来到这片女人当家做主的土地，却无缘获得自由自在的命运。她是喇保臣的如夫人，在土司衙门外住了三天，才由喇嘛寺择出吉利的日子穿着黑衣黑裳走进一对石狮子相望的土司府大门，再被引入为二房太太准备的西厢偏房。

原配夫人喇拉初自视血统高贵而妒意十足，经常有意给曾淑明出一些难题。千里风霜和沿路的艰险，似乎锻炼了曾淑明。她如果乞怜于喇保臣，往后她就只能像一只小猫一样蜷躺在他的腿上了。她认定她在这个土司的王国里，应该谋得自己的位置。刘文辉临别赠言，要求她谨记她是刘主席的干女儿。那么，抱住干爹这棵大树，她在泸沽湖便站住脚了。

在康定上路之后，她大都坐在软轿里。四个轿夫里头有个叫白大安的，过去是刘文辉的副官，行伍出身，不太检点，一次酒后失态，惹得三姨太疯癫一阵，差点送掉小命。这回发配抬轿，暗中监视喇保臣，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对于曾淑明当下的处境，他十分同情，自然怜惜中也不无爱慕。刘主席仿效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将曾淑明嫁给喇保臣，他颇有烦言，说过一些不得体的话。眼下，他内里的豪侠之气升起来。他凑机会对曾淑明说：“你跟我走，我带你离开这个叫你伸不起腰的地方。”“往哪里

走？”曾淑明问他。他拍拍藏在他长衫里的十二响：“我带着两支快慢机，当年凭着它救过刘军长的命，就是用枪尖子也可以把你顶出这个鬼地方。”曾淑明摆摆手：“从康定出来，我们走了二个月零七天，你算算该有多少路？”白大安一脸白麻子，常说麻子点点多，他也属于那一类极有主意的人。“三小姐，难道你不晓得我跟军长闯过很多地方么？”他提起曾淑明在家里的称呼，当然为了博得她对他的信赖。他说，“这里走捷径到卫城只不过300里，一天一夜就赶到了，那里驻有伍培英师长的一个营，营长殷大庭和我拜过把，他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插上翅膀远走高飞。”曾淑明不出声。他又说：“你不是想读书么？我会效劳，成都重庆我都有把兄弟，钱不用发愁，资中那一战，就算趁火打劫吧，我留下了十多根金条。”曾淑明还没有动心。她深谢白大安的好意，她请白大安带走一封信，这是她写给父母的。

白大安一上路曾淑明便也动了身。她去的是一个名叫鸟之洛的海岛。土司衙门又叫它海堡，是喇保臣五月端阳过转海节消停歇息之所。曾淑明却也喜欢这个地方。方圆不足一里，但集泸沽湖各种动植物的大全，这里濒临湖滨的花园，还有别具一格的养鹿场和麂子栖息的小林子。曾淑明只有对经堂不在意。喇保臣多次央她跟他一起去经堂祈求来生的福缘，曾淑明总是说，我这辈子都还没活够呢，来生隔我老远老远，还轮不到我去考虑它。她尽力打扮自己，却又不随意给对方以满足，喇保臣每次乘兴而来，兴未尽而去，身子离开了，半颗心却都悬吊在海堡上。

丈夫不在之际，她就骑一头骡子在海堡上乱跑。跑腻了她学会打枪，冬日刚尽，野鸭也飞来了，她端起卡宾枪，胡打乱射，耗费了不

小子弹，后经人点拨，她的技艺逐渐长进。野鸭子太密集了，有时一粒子弹射出去，往往一响三中。她心花怒放，于是朝天放枪，等野鸭子惊起，选中一只从天空击落。后来她抛开卡宾，用短枪射击，只要在射程之内，无不手起鸭落。到来年转海节的时候，她已练就了左右开弓，在宾客面前大出一番风头。

一个人的位置要自己去博取，她深信这一点。但骑骡挂枪的事，毕竟体现不出她的价值。她在泸沽湖攫取的目标，刘文辉早已描画出来，把土司府的大印拿来握在自己的手心里。直至今日，她还没有见过这颗大印是什么样子。她只晓得喇保臣外出便随身带，而一回到泸沽湖，大印便落进了搁在原配夫人喇拉初房的黑漆描金的牛皮筐子里，这是曾淑明所不能容忍的。她无论如何不能屈居于这胖妇人脚下。

她想起了白大安。只有他的高招才能让刘军长关注她的泸沽湖的处境。

这样的日子终于来了。

西昌飞马传书，命令康边彝务指挥喇保臣带上秘书曾淑明克日赶赴西昌行营。他明白刘文辉的用意。这是追那颗土司府的大印给还是没有给曾淑明掌管？

这颗大印是康熙二十九年清王朝册封他的先辈时随着圣旨送来的。在一方青铜上用蒙文刻有“左所土千户之印”七个花纹般的字体。他管辖的百姓，其实谁也识不得这七个字，但纳贡交粮以及进行战事的布告，只要有了它便会产生神奇的力量。在好几次争夺土司衙门的厮杀中，喇保臣的祖先和喇保臣自己，尽管处于不利的形势，但由于没有丧失这颗大印，终归保住了自己的权力。他看得重，依靠他生存和发展的贵族也看得很重。他的原配夫人出自喇系旁支，尤其重视这颗大印，屡次放出风来，喇保臣土

司衙门她家有半边。这个支系地盘小，人丁也不兴旺，却是有名的野牦牛，打起冤家来，不要命也不要魂。从外边回到泸沽湖，喇保臣就考虑这事。刘文辉是他的支撑，扶持曾淑明坐上掌印夫人的位置，势在必行。贵族们是他的基石，他又不能不慎重。

眼下却是不能再推了。

在从泸沽湖启程去西昌的当日，他按远行的旧例取出了放在原配夫人房里的大印。他拿在手里掂了掂，立即交给了曾淑明。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做得很秘密，只是没有避开阿宗文。曾淑明却不管，她偏要大事张扬。她骑上白腿黑骡，身着玉蓝色衣裤，拦腰系上一根软绸腰带，土司大印便挂在腰带上。还有两支二十响，分别插在两肋。

西昌也有一个湖泊，叫做邛海，在汉代就很有名，那是丝绸之路的南线。历史烽烟与黄尘，在这条古道和这座古城都洒落过不少值得后人凭吊的事迹。邛海只及泸沽湖的三分之一，秋色却相当迷人。渔舟点点，飘荡在镜一样的湖面上，月光映照渔火，站在芦山顶上往下眺望，灯月交辉，光焰迷离，闪烁着一种泸沽湖所没有的丰饶和富丽。刘文辉驻蹕在伍培英师部，那就是他的行营，一所宏大的庙宇，建于元代，位于芦山半坡。

喇保臣和年轻的妻子，下榻在刘文辉寝居隔壁。不知为的是谈事情方便，还是表示亲近与恩宠。三姨太来了，白大安也来了。白大安又挂上了少校军衔，一身高级呢料军装，马靴齐膝，走起路来气势逼人。但他对三姨太和土司夫人是柔和的，分外彬彬有礼。刘军长似乎忘记了旧隙，他叫白副官从公务里边抽出身来，务必陪同两位夫人尽兴游乐。

泸沽湖的彝务，刘文辉暂时放在一边。他现在要理顺的是大凉山

挨近大渡河一带的纠纷，有关谈判和会议，刘文辉统统请喇保臣土司参加。

曾淑明乐得玩个痛快。本来年纪轻轻，冥冥中伸出一只手将她拖上政治和权术的战车，如今有得这个闲日，哪怕吃喝玩乐是生活的变形，她也要留下这变形的魔方了。

在邛海泛舟很乏味，尽管飘在水面的是一叶真正的小舟，而不是泸沽湖上的独木槽。蛮荒的风已经把曾淑明吹野了。喇保臣陪她来过一次，仅仅是一次，过后的殊荣和福分全给了白大安副官。

这段光阴，曾淑明埋在了心里。这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岁月！

喇保臣白昼的空闲极少，但他还是抽出功夫领上曾淑明寻觅了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马背之根。南城的白塔寺建于元代，是一支一代天骄征服当年建昌卫的见证。喇保臣给曾淑明看的，依然是祖先的赫赫战绩。忽必烈的铁骑到达这里，误入草泽，伏兵万箭飞来，全靠这个民族的神勇化险为夷，从失败驰入又一个胜利。刘文辉在对募区的经营中，深谙诸葛亮之道，攻心为上。喇保臣从干泰山那里学到了这一手。他在妻子面前从不炫耀自己的权力和能量，但对祖先的雄方大略和叱咤风云，无不一一描述。曾淑明眼前升起了大漠炊烟，她景仰丈夫的血液流淌之源。风吹草低的景色太壮美了。

“我当时想的……”曾淑明对我说，“不是土司的掌印夫人有多威风，我来到这样的家庭，成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我就该为这个家去冲去拼去吃苦坐牢。”这也许就是她悲剧所形成的内在因素。潜在的思想力量太巨大了，曾淑明其实至今都没有理清她心路的历程。她的日子过得太艰难，忙于柴米油盐，她像是还来不及总结自己的一生。

刘文辉的南巡结束了，明日就



要转程回雅安。西昌的国民党党部特地为刘主席举行了这座边城极难得的一次舞会。本来说晚七点开始的，却推迟到九点。刘文辉把两个钟头给了干女儿。一个多月过去了，尽管天天相见，但曾淑明与干爹单独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据说在后来对曾淑明历次的审讯中，她都讳莫如深。

“刘文辉到底给你说些什么？”我问她。她依然叼着一支烟，这已经是我对她的第三次拜会。“哎哎，有什么嘛！”她苦笑着，“刘文辉问我，喇保臣待我怎么样？我当时哭了。刘文辉心慈口软，他安慰我，说他考虑到二十四军的前途多一些，对不住我，让我做出了牺牲。后来又提到我的家庭，他说我的母亲已经过世，父亲为了筹备薪饷到成都开办银行去了，又在那里娶了一门亲。”我插话问：“既然只说这些话，审问你你为什么不说？”她不高兴地瞥我一眼：“你脑袋瓜怎么搞的哟！我为什么要交代？”她说，“交代了他们也不信，还要追我更严重的问题。”我试探地问，“刘文辉就不提那颗大印？”她说：“怎么不提？刘文辉讲，泸沽湖是个乱糟糟的世界，他就让喇保臣镇住那一方。鞭子长了赶不动羊，他才把我嫁到泸沽湖，一手抓住喇保臣，一手把大印攥紧。”我有些苦笑：“这本是情理中的事，你不说人家也会这样想嘛。”曾淑明不同意地摆着头：“总之，说了就没有完。”她同时自作聪明地笑起来，“那是个无底洞呵，”她又说，“我能交代清楚么？越扯筐筐越大，我拿什么去装嘛？”

她为了不该隐瞒的隐瞒，得的多还是失的多，恐怕谁也搞不清楚。

会见结束，她跟着刘文辉走进康边屯垦委员会的礼堂，党部的舞会在这里举办。

在乐曲声中，搂住她的竟然是

一位黄发碧眼的男人。

“Miss 曾，我认识你。”说着美国英语的高鼻子男人，笑望着曾淑明。她的英语还没忘，但毕竟是幼稚园的程度，寒暄过后，两人说起道地的四川话。

“原来，你就是那个洛克！”曾淑明惊喜地说。她佩服地盯住这个独自住在蛇岛的美人。

蛇岛距曾淑明蛰居的海堡，只不过 10 里之遥，月明之夜也能依稀望见，不过土司衙门深似海，这次邂逅实在是他们一生里难得的机会。吉尔洛克是个怪人，他已经在蛇岛上住了整整 8 年。曾淑明问他：“你不寂寞吧？”她听说有个美国人在岛上观察泸沽湖的气象和研究泸沽湖的风情，她实在觉得这个怪人有点没事找事。吉尔洛克回答说：“你是为了你们的刘主席，而我是为了我的美利坚。”他蓦地停住步，握着曾淑明的手一紧，“美利坚要进入世界。”曾淑明见他碧蓝的眼水里闪烁着晶亮的火星。心想：这是个有毅力的人。她把身子倾向洛克，乐曲变了，节奏疾速，随着洛克卷入一阵快乐的疯狂……

西昌往回返，取道木里。喇保臣带着妻子，还有刘文辉派给她的联络副官白大安，一行在李门公家里住了半个月。李门公是木里的土司，势力比较强大，跟喇保臣有联盟，白大安凭借自己的机敏，暗中告诉曾淑明，喇保臣大夫人娘家的野“牦牛”可能在半路拦劫土司衙门的大印。喇保臣这次在西昌得到了“康边彝务指挥”的正式委任，有了刘文辉这个硬后台，李门公也不敢随便使坏。可是白大安又听说李门公近日和滇军有勾结，说不定彝务指挥的委任恰好刺激了他，他为了势力的扩张，完全有可能串通几头“野牦牛”夺下喇保臣的大印，作为皈依云南军阀的见面礼。这层意思他不便向喇保臣说明，于是又暗

中给曾淑明陈述利害，寻找一个借口，由曾淑明催逼丈夫连夜向泸沽湖赶路。

夜风飏飏，漫天飘着牛毛细雨。喇保臣轻骑简从，除了白大安、曾淑明和他本人，就带了四个随从。奔到牦牛山下天已薄明，七人七骑皆累得不行，往青草地上躺，人畜都不想起来。

就在这当口，枪声响了。

后退不可能有出路。白大安凭着自己丰富的战斗知识，观察出对方在垭口只有十来条步枪，回头招呼一声喇保臣，便策马尾随曾淑明冲上山垭口。速战是短枪的优势，两个人四支枪，又是神枪手，对方有的被击毙了，没有击毙的则趴在地上抬不起头。

保住了印，还得有掌印的人。曾淑明目前挑不起泸沽湖的江山，喇保臣无论如何要保住。他当机立断给曾淑明指出翻过山去卫城的路。那里住有伍师长一个营，营长殷大庭是他的拜把兄弟。他解下扎在腰上的一条黑色缎带，抛给曾淑明说，这是我跟殷大庭结拜的信誓，我那兄弟一见，掉九个人头也要带兵前来。他催促曾淑明赶快上路，然后在山垭口停下，一面对付残留的敌人，一面接应往山垭口奔来的喇保臣。

山下的兵力过于悬殊了。喇保臣的随从纷纷倒下。

喇保臣终于撤上山口来了，但坐骑受了重创，他变成了一名步卒。白大安这时身上腿上叫血染红了……

次日天明，曾淑明和白大安的把兄弟殷大庭赶来。李门公的人撤走了，白大安躺在血泊中，一脸煞白，嘴唇还在轻微蠕动，随又无力地闭上……

牦牛山的事情发生之后，原配夫人喇拉初的地位摇摇欲坠。丈夫差点丢了命，而积极参与劫夺大印

的就有几头“野牦牛”，他们都是她的嫡亲弟兄。泸沽湖土司的大印，经过这次事故，自然落到曾淑明的掌握中。她依旧住海堡上，议事和进行战事的决定都在海堡上。

曾淑明的大脑复杂起来了，她要强制自己装很多很多东西。土司衙门的法规，无论纳贡上粮，无论坐堂审案，她都要熟悉。土司衙门的管辖，无论田产人丁，无论金银细软，她都要知晓。还有千丝万缕的礼尚往来，什么时候给邻近的土司和头人送猪膘肉，什么节日请亲友和诸位伙头吃牛头饭，都要依照祖宗的规矩办事，一点不能差错；还有屯垦委员会的烟土，省府和军部的银两与药材，虽然每年只送一次，但数量大，筹集很困难，伤神费力，占据了太多的时光。

日子不知不觉中过去，只有收到屯垦委员会转来刘文辉的信件，她才记起自己是个外来人。除去土司衙门收租、断案和分配劳役，如何回复刘文辉，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其实回信的内容，通常很简单。刘文辉只要求她准确无误地表述清楚，一是喇保臣的动向，一是喇保臣的忠贞不贰。她每次的报告，都获得刘文辉的满意，其奖掖便是她接踵而至的三个儿女的生日都有屯垦委员会送来的衣物和在泸沽湖不可能见到的玩具。

她不会往外飞了，实际上成了这里的第二号人物。她说话算数，她尝到了驾驭权力的欢欣与亢奋。

我有幸参加了泸沽湖的锅庄舞会。杨区长邀请我，我又邀请了曾淑明。那悠扬的竹笛，那婉转的歌喉，那柔曼的舞姿，还有那沉沉的夜色和炽烈的篝火，都让人缅怀过去和向往来日。我想她会高兴的。她到了舞会，绝不下场，并且心不在焉，兴味索然。

她26岁守活寡。当时泸沽湖地区搞民主改革，因为土司衙门的

大印未能交出，怀疑是她隐藏的，说她想变天，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判处她8年劳动改造。她失去的实在多一些。我想她会耿耿于怀的，但我误解了她。我告别泸沽湖同时告别她的时候，她像个朋友一样地拉住我的手，深深地叹了口气：“我能怨谁呢？怨刘文辉么？刘文辉深明大义，后来起义了也没有忘记泸沽湖，他通过屯垦委员会告诉喇保臣，在泸沽湖迎接解放军的第一张标语就是我写的。怨喇保臣么？”她又说：“他后来走得远远的，当了省政府的常委，我代他受过，他命好，我命薄，一切都是命，我认命，谁叫他是我丈夫呢？”她说，“嫁鸡随鸡嘛，我的错他的过，我都认了，我都包了。”

那个蓝发碧眼的洛克也一直在思念着曾淑明。曾淑明至今仍在怀念喇保臣。

吉尔洛克是一个研究人文的科学工作者，1955年回国后他写了三本书，都是关于泸沽湖的，一本是关于泸沽湖和散居在泸沽湖畔的部落的起源的，一本是关于人们普遍关注的阿肖婚即所谓母系社会的考证的，还有一本不知写的什么，有人说是他对一个女人的萦怀思念。倘若真有那么一本书，能够让洛克有所惦记并刻在心上的，自然是末代土司的掌印夫人了。

1955年深秋，洛克告别泸沽湖前夕，他特地上岸拜会过曾淑明。曾淑明其实早已离开海堡，迁到了新建但又未全部竣工的土司衙门。泸沽湖刚解放，开明的喇保臣便由人民政府安排了职务，几乎没有落过家，一个会接着一个会，一个参观接着一个参观，曾淑明过着寂寞而烦躁的日子。

洛克来见，她极高兴。

“你来给我排遣寂寞吗？我谢谢你。”她说。

“不，”洛克说，“我是来商量你

的去留的。”

“我能去哪儿？”曾淑明问，“我父亲母去世早，雅安和成都都没有我的家，我能去哪儿？”

洛克眸子灼亮灼亮：“你为什么不应该想走得更远一些？比如说去到大洋彼岸……”

“太遥远了。”她说。

“香港怎么样，八年前我在那里小住过，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同在那里逗留几年。”

彼岸也好，香港也好，她依然摇摇头：“无亲无故，对我都是一样的陌生。”

在蛇岛的三天三夜，他们确乎玩了三个通宵。跳够了，唱够了，到了白天先是大睡，大睡起来之后，便挂在洛克手弯里在蛇岛上转悠。

“当年在康定，我本有机会不来泸沽湖的来了；来到这儿，我本有机会走的又没有走。”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现在面临又一个机会，不该来的来了，该走的没走，那就留下吧，我就留在泸沽湖吧。”

“为什么？”洛克固执地问。

“为什么，”曾淑明反问说，“你是研究人文的，请你自己去找回答，谢谢你，吉尔洛克，我谢谢你，祝你一路不安，好吧，你走，祝你一路不安。”

吉尔洛克走了，抱着他著书立说的资料，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异常遥远的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

曾淑明也走了，在吉尔洛克走后的第4年，她怀着对儿女的依恋和对来日的不可逆料，去到了隔西昌50公里被多少年风霜雕凿成千奇百怪的黄林之畔的劳改营地。

我也得走了，在曾淑明洗心革面13年从农场返回泸沽湖的第18个年头，我在这里逗留3天之后，拥有一片人生的错综复杂，有曾淑明的，有喇保臣的，有吉尔洛克的，也有作者本人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来辉武与“红兜肚”

——《国宝之光》之二

荏苒 晓寒 方美

## 走自己的路

1989年初，来辉武郑重地写下了弃政从医的的辞职报告。

一个青年共产党员提出要辞职，不坐铁交椅，不端铁饭碗，不愿吃“皇粮”，这虽算不上叛逆不道，却叫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消息一传出，就象他那四层楼的小房子起了火，液化气罐爆炸了似的，一传十，十传百。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也比不上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神速。商业局大院从干部到工人，从领导到群众。从职工到家属，到处议论纷纷。有善意的不解，有同情的担心，有友好的惋惜，也有无知的嘲弄，恶意的诽谤。凡此种种，唾沫星子淹死人。1986年，他在户县曾被排挤受到了种种议论的压力，旧观念的冲击，流言蜚语的暗伤……他从痛苦与孤独中挣脱出来，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萃中汲取了营养，精神深处得到升华和净化。对小官大官升官降官，他一笑了之。当干部，拿工资，天经地义。干部终身制，这是传统制度，多年规矩，在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谁敢动，谁敢碰？他却一脚把金筷子银碗踢掉了。咋能叫人不纳闷？叫人不疑惑？

无私心际宽，来辉武是冷静的，泰然的。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爬上了上坡。辞了职是精神真正的解脱，有利于实现自己的追求。一切劝说、议论和责难，他都置之高阁。他没有心思和精力“打内战”。人们精力内耗了，还能干啥事？多少年多少事的教训哪！他会用事业的成功回报的。把自己的抉择告诉妻子时，她哭了，哭得伤情，哭得伤心。谁叫她是来辉武的妻子呵！对他最了解的莫过于她。一切困难、艰辛，她默默地承受着。

无钱难倒英雄汉。来辉武向来把钱看成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人没钱不行，钱多了也害死人。他曾听过一首打油诗：“人为钱东奔西走，人为钱早起迟眠，人为钱廉耻不顾，人为钱血汗劳干；拿钱能运动事情，拿钱能求来官员，用钱能买通神路，用钱能买通机关；有了钱吃穿不愁，没有钱难免饥寒，有了钱说话气粗，没有钱闭口无言。”这是否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未曾深究，他只感到，身上无钱腰杆软啊！

想到钱，他有过多多少少苦衷啊！他辞职后没有了收入，借的钱全花在事业的追求上，他走南闯北地拜师求教，买火车、汽车票需要钱；购

买各种名贵药材需要钱；最原始的研究器具、药碾、工具需用钱买；图书、资料、报刊，没钱买不来。为了钱，他跑断了腿，磨烂了嘴，不爱看的脸色也看了，不爱说的话都说了。好在亲朋至友中也有热情支持他的。如今已是借了一河滩，能借的人全都借过了，能凑的也都凑完了。

他债台高筑，负债已有数十万元，不小的数目啊！他已临到穷困潦倒无计可施的境地。他这对钱淡泊的人，钱倒成了他事业上的拦路虎。如果继续干，万一不成功，后果不堪设想；不干，半途而废他决不甘心。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他思来想去还是来到曾借过一次钱的朋友家。两人闲谈了一阵，他没好意思开口，便退了出来。第二天，他又去了一个朋友家。朋友深知他，“无事不来家，来家准借钱”。未等他开口，就好心好意地劝说他，不要再执拗了，“好好的干部不当，弃政从医，瞎折腾啥哩！”他耐心地听着。在回家的路上他脚步沉重，感到异常孤独和痛苦，才想起那首打油诗的现实性了。

在辞职后那段岁月，来辉武住咸阳每周去户县，临走时妻子给他烙6个大饼，一天一个。严冬寒天，

馍还可放的时间长些，天热了，不几天，馍就长毛了，发霉了。妻子爱他、疼他，把馍馍换成了大饼，变了花样，叫丈夫少吃些发霉的东西。近两年了，8个春夏秋冬，每天都是开水泡馍，外加一点盐，多简单的餐饭啊！有时发霉的大饼上，长出了绿毛毛，在灯光下泛起幽幽绿光。这绿光和黄色的电灯光遥相辉映，陪着他，从黄昏到三更，从三更到晨曦。黄光、绿光照映着他那逐渐消瘦的脸膛、深陷的眼窝和眼里红红的血丝。不到40岁，正当英年的三秦汉子，眼角过早地留下了鱼尾纹。左邻右舍，要好的朋友，看到他日益垮下来的身体，半是担心半开玩笑地说：“你操劳研究别人长寿，这样下去自己的身体会抢拖垮的。”他听了，憨厚地笑笑。富兰克林为研究雷电，被雷电击死了，给人类带来了科技进步，诺贝尔研究炸药，被炸药炸伤了一条胳膊，成为一代伟人。为发扬他的科学精神，设立了诺贝尔奖。他虽不能与这些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相比，但这种伟大的精神是相通的。他来辉武的发现、发明、创造如能让整个人类都能长寿，即使累病了，累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他，相信自我，在20多年的生活实践中，他想干的事，他要干的事，还没有哪桩是失败的记录。他信心满怀，决心走自己的路。

## 叩开“生命之门”

昼复昼，夜复夜，来辉武在感觉与理智、清晰与迷惑、有序与混沌的交织中摸索着，搜索着，他与中草药相依，与药碾相伴，与医书同眠。身居斗室，思想却在高天阔地间飞翔。

来辉武在县委时，有次熬中药，他又一头钻进工作中。不知过了多久，火炉上的中药熬焦了。砂锅里

冒出的黑烟，弥漫了斗室，才把他从书桌文件堆中唤醒。从那时起，他就多次琢磨，是否有不用熬药、不用打针的治病方法？

清代唐容川说：“设人体之气偏盛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

人生百病，分为内病外病。人体五脏六腑之病称内病；体表、外伤、经络之疾，称外病。内病与外病，亦可内治，亦可外治。我国医学理论把药物的四气五味归结为“气为阳，味为阴”。薄气者入阳走表，味厚者入阴走里。内治者，服药须先入胃，经消化道分别清浊再输送到全身，药物之糟粕不能入于经脉，能入者乃是药物的气味。

来辉武的思绪在祖国医学的病因病理中游转，对“内病外治、外病外治”的认识清晰了，明朗了。

他在先人遗留的《山海经》、《楚辞》及著名医药学专著《中藏经》、《肘后备急方》、《本草纲目》、《外科大成》中，看到了“药衣疗法”、“药被疗法”、“药榻疗法”、“香佩疗法”及“药枕疗法”等的文献资料后，坚定了他的信念。

“内病外治”是祖国医药学传统疗法中重要之一种。《黄帝内经》载有“用桂心渍酒以熨寒痺”、“白酒和桂涂风中血脉”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金匱要略》中内病外治的论述更多，火熏令其汗、猪胆汁蜜导法、小儿疳积点药烙之、雄黄熏法等。晋、唐、宋、元的医学著作中，对内病外治概括、总结、升华成理论体系，应是清代内病外治大师吴师机。

20年前他去省城，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1955年出版的吴师机的《理瀹骈文》，翻看了内容，爱不释手，如获至宝，他摸了摸口袋，犯了愁肠。口袋里钱所剩无几，买了书，就没回家路费。不买，怕失之

交臂再难找到。他在书摊前几度犹豫，徘徊。最后铁了心，买下了。奔波了一天，才搭便车回到家中。

《理瀹骈文》是吴师机集我国内病外治大成，融多年治病经验撰著而成。吴师机其人，中过举人、进士，视功名如粪土，弃官不作，重返故里，自制膏药治病救人。每天求医之人“地去一二百里，人来五六十船”，多则月内有两万余人登门求治。膏药治病简便，收费低廉，有时竟一贴而愈，他被赞誉为“吴一贴”。

医者，理也。药者，瀹也。吴师机说：“凡病多以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经文内取外取并列，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外治之药切近皮肤，能彻到肉理之中，亦能将药之气味透过皮肤直达经脉，摄于体内，融于津液之中，与之合而为一，具有内外一贯之妙。正如吴师机说：“切于皮肤，彻于肉理，摄于吸气，融于渗液。”

吴师机的“内病外治”分三焦分治法和膏药法。上焦之病、中焦之病和三焦之病。病在外者贴敷局部，病在内者贴敷要穴，病之局部者贴敷局部，病之广泛者贴敷要穴。中焦之病“以药切粗末炒香，布包敷脐上为第一捷法。”药物不经脾胃，故不伤害人体而影响水谷精微的输布。药物有攻伐，但绝不会损五脏、阻气血、偏阴阳。一贴膏药可以拔毒外出，抑邪气以内消，调升降，安五脏，能营卫，培元气。这“调节经脉”、“平衡阴阳”的道理真是百试不爽。

人体是由内、外、上、下、里、表和四肢百骸、皮毛组成一个整体。医家辩证施诊所用外治法，使药物经皮肤透入，粘膜吸收，经络传导。“药切粗末炒香敷脐上”之法，无针刺之痛，无服药之苦，又无手术的煎熬和对身体的损伤。是“简、便、廉、验”的治病之术。华佗一把刀

子，扁鹊一根银针，李时珍一副草药，吴师机一贴膏药都能救命于人！

来辉武深刻认识到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蕴藏着深刻、朴素而丰富的辩证思想，综合治本，整体疗法和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观。他体会到，局部治病，为下医；整体治病，为中医；综合治本，调动体内气能治病为上医之理。中医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异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奇特之花。来辉武决定采用“内病外治”的手段，进一步解决病的机理与配方。

来辉武无数次地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寻访长寿老人，用他们的养生之道验证培补元气、扶正驱邪的道理。他一次次高价买了一张张古旧陈老的药方、秘方、验方，从中寻求培补元气的良药。他一次次地钻进秦岭，在深山老林中，悬崖陡壁上寻找、辨识，采回一味味中草药。斗室里堆满小火炉、小铁锅、药碾、药罐。他捏把盐，洒点醋，喷点酒。他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明知凡药三分毒，却一次次地亲口尝药。设备虽然简陋，但选理、选法却一丝不苟，十分严格。

来辉武研究中草药寒、热、温、凉的药性。《黄帝内经》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热能退寒，温次于热，都能助阳强身。寒能去热，凉次于寒，都能清热泻火。他撮五味，研究中草药辛、酸、甘、苦、咸不同药味。《黄帝内经》称，“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后人进一步发展，辛能散能行，酸能收能涩，甘能补能和，苦能燥能泻，咸能软能下。《黄帝内经》以五味归五脏，称“酸入肝、辛入肺、甘入脾、苦入心、咸入肾”。阐明了五味与人的关系。

来辉武陶醉在氤氲弥漫的药香里，深信研制的多种药物混配成药

粉粉的芳香气味，定会成为助阳气，养阴精，理气活血的辟秽之品。敷之体外可舒经活络，内医五脏六腑之病，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目的。

吴师机说：“病在内者敷要穴、病之广泛者敷要穴”。要穴是何处？他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还得向先贤们请教。斗室里桌子上立个赤条条的泥巴人，它是仿造北宋王维一那个青铜人制做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内联五脏六腑，外络皮肉筋骨，上下贯通，遍布全身，把人体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他专注地望着，着了魔似的忘掉一切，还在泥娃娃身上戮眼睛、刻道道，还傻笑，嘴里念念叨叨像虔诚的教徒念经那样。不知过了多久，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泥娃娃身上戮了多少个眼睛、道道？他寻找人体的全息穴位，探求生命之门。他说，夜深人静时可以看到经络亮起幽幽的冷光，而那些穴点则闪出七彩的光芒。有一次，他飘驰的思维凝结了，游移的目光聚中了，他死死地盯注神阙穴。那穴七彩的光芒慢慢地扩大了，发亮了，比所有的穴点都亮、都大。那就是人体的黄金穴。

神阙俗称肚脐眼。上有天突、膻中、上、中、下脘，下有气海、石门、关元，同通任脉，称阴脉之海。《甲乙》称脐中，禁不可刺，刺之死不治。《太素》称环谷。《外台》称气舍。《循经考穴》称维会。而《医经理解》称无神居之阙庭。《金元针灸》称神之所舍。神阙是生命之门。父精母血，珠胎暗结。胎儿靠脐带系之母体。经神阙得营养得精气得血得骨，从微小的受精卵开始发育、成长。《经穴名考》说神是心灵，是生命力，阙是君主居城之门，是生命力居住的地方。胎儿坠地，脐带脱落，关闭了这个生命之门。

古人认为，神阙无所不至，通

达气机，补虚泻实，可升可降，能培补人之正气，调节脏腑阴阳。现代解剖学可见，肚脐周围皮下脂肪少，角质层稀薄，脐下两侧有腹壁下动脉、下腔动脉，腹网膜布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络，药物通过表皮皮肤毛孔、汗腺、脂肪腺、以及细胞间隙或表皮角质细胞、细胞间质等多种途径被吸收并输布全身。神阙穴，生命之门可重新开启。

来辉武把散发着芳香气味的药粉粉倒进铁锅里，熬成粘稠的黑膏药。晾凉，摊在布上，贴在自己的肚脐上。暖烘烘的，一股热流从丹田升起，慢慢向全身扩散着。可揭膏药时，疼痛难耐。他说真是活拔毛。他看着那黑糊糊的膏药，望着漆黑的窗外，皱起了眉头。

沉寂的夜，窗外是咸阳古道。渭水河畔，头道堰，二道堰，望去愈显苍茫，一首孩提时的民歌在耳边响起：

哎个姑娘来俏生生，  
红袄袄，红兜肚，  
毛茸茸的黑眼睛，  
……

曲调在夜空中盘旋飘荡，红兜肚三个字却落在来辉武的心上。他想起孩童时兜肚上还绣着蜈蚣、蛇蝎。捂在肚脐上，能遮风防寒。他从药碾中倒出碾好的清香药粉粉。小心翼翼地装进白布中，缝成一个兜肚。这兜肚长不过一尺，宽不过半尺，厚不过三分，重不过三两。他撩开自己的衣襟，把兜肚捂在肚脐上。热乎乎的感觉和贴膏药一样。戴取方便多了。

来辉武说，抓住元气，抓住内病外治，抓住四气五味和神阙穴。这都是从祖宗遗产里挑拣出来的。他不过把那些东西揉了揉，搅了搅，变了变花样。他说得太轻松了，发明、发现是创造，综合是更高层次的创造。关键是药物的配伍要十分严谨，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否则不但不能治病，还有危险。

## 兜肚 的神奇和轰动

红兜肚诞生了。

红兜肚，是来辉武总结了500多位百岁老人的长寿规律，综合了500多年来长寿的秘方、验方、民间药方，由50多种中草药研制而成。巧合的“5”，还因为它的发明者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5，又是农历5月初5生日。阴阳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有五官，内有五脏。手、脚有五指。5! 5! 5! 美好的象征。来辉武把他发明、创造的小裹肚起名叫“505神功元气袋”。

当1988年505呱呱坠地时，医学界表示沉默，患者表示沉默。在坑蒙拐骗比比皆是、伪劣产品泛滥的当今，沉默表示了慎重和严肃。他喜欢慎重和严肃。他信奉科学，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他是从慎重和严肃的路上走过来的。他已走过了原始实验的阶段，把白布裹着药粉粉的505送给年迈的妈妈、岳父及不少的至亲好友试过了，他们都说管用。然后又把505送给我国的医药界权威，送到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陕西中医学院、西苑医院、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专家进行观察。来辉武说，无论如何，请试一试，观察观察，无副作用。他掀开衣襟，亮出贴在肚脐眼上的红兜肚，拍拍，憨厚地笑笑，就是这个！教授、专家闻了闻很香，捏了捏，布袋子里装的药粉粉。好吧，就观察观察吧。

来辉武拜访了第四军医大学年近70的吴一纯教授。老教授身体不适，躺在床上说，自己近来气喘、腿软，饮食不佳，上下楼已感吃力了。来辉武请老教授为505神功元气袋做鉴定，请他戴上试试，有利而无一害。来辉武态度恳切，笑容

可掬，使老教授盛情难却。他戴上505，不知不觉间。一股温热从脐中升起，渐贯全身。不几天，老教授饭量增加，不气喘了，上下楼也方便了。老教授暗暗惊喜称奇，才严肃认真地考察505。惊奇的并非吴教授一人。数十名专家、学者对505进行了系统的临床观察和分析研究。结论是：505神功元气袋属国内首创，将中医内病外治保健产品的研究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综合研究成果处于世界同类项目的领先地位，填补了祖国医学保健事业的空白。

无独有偶。又经过数百万名患者严格的使用，他们赞誉505为“神奇的裹肚”、“传统医学之结晶”、“祛病强身之瑰宝”。有人说这是医学的奇迹。他嘿嘿一笑，他说，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元气袋？它扶正培本，平衡阴阳。他看重的不是奇迹，而是疗效显著，能减轻病痛。

505药袋子神了，奇了，神奇之处何在？

经陕西、山东及北京等地的中医药研究单位对2205个病例的临床观察和用现代化高新技术的仪器仪表进行的242项药效学实验报告，揭示了505神奇的奥秘。

崇红、张瑛、王益民、刘昶用纯系BALB/C的小白鼠实验，505可提高细胞，液体细胞免疫和细胞吞噬功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刘昶、王益民对Wister大白鼠实验，可提高精原细胞数，增加精子数量，增强精子活力，抑制性腺功能减退，促进生殖功能，延缓衰老。

王益民、刘昶对昆明小白鼠贴敷实验、老龄小白鼠贴敷对照实验，505能显著增强体力和耐力，提高机体抗疲劳和耐缺氧功能；505能提高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动，防止自由基对机体危害，预防心血管病和老年病。

崇红、张瑛对大白鼠贴敷对照实验，505药粉能减少浅表组织渗出，抑制炎症，促进浅表外伤愈合功能。

张文高等对39例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用LDB—1激光微循环血流计测定神阙、印堂、劳宫等穴位，505对微循环有直接调节、改善的功能。

张文高等用WGHS—40B型数字红外线辐射温度计检测，505对气海、印堂、左劳宫、命门、肾俞等穴位有升温调节作用，具有温肾助阳益寿功能。

张文高等37例老年及老年前期慢性病患者对比实验，测定心搏量、心搏指数、心输出量和心脏指数等心脏泵血功能指标，505能促进泵血功能指标增加，功能改善，特别是椎动脉供血改善更为明显。

王益民、刘昶、崇红、张瑛还做过过敏、刺激、中毒、副作用等实验，结论全是零。

505中的药粉粉是由50多味天然名贵中草药调配而成。仪器检测，药粉的挥发物中含有酮、醇、酚、醛、酯等60多种化学成分。

报告，稍微繁长的报告，是现代仪器仪表测试的科学报告，它揭示了505神奇的机理，还有众多的临床研究、观察，总有效率为98%、99%、100%……多少个100%啊！

来辉武与陕西及有关省市医院的临床工作者合作，观察了505对常见病的临床效果。陕西中医学院一组872例的观察表明，本疗法对胃肠功能紊乱的治愈率可达78%，对慢性腹泻、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等也有很好的效果，505对痛经及经血不调的效果可达90%；对失眠、腰肌劳损、低血压、阳痿、遗尿等也有较好的疗效。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淑芳副主任医师等人验证，进一步说明对乙状结肠镜

证实之慢性肠炎、脾肾阳虚的泄泻效果尤为突出，认为该方具有温肾助阳、温中散寒、调畅气机的作用。中国老年报载文，把 505 神奇功效归纳为：

胃炎、胃痛，药到病除；  
减肥、增重，双向调节；  
便秘、腹泻，双向治疗；  
尿急、尿频，一戴就灵；  
健肾、调经，男女皆宜；  
要得小儿安，常把药袋拴；  
咳嗽、气管炎，克星在眼前；  
降压、安眠，缓解冠心；  
五劳、七伤，对症治疗；  
祛病、强身，益寿延年。

再看看 60 多万患者的来信吧！

美国马里兰州安娜女士来信，说她受噪音污染患了精神不安、失眠、肠胃不适及一系列功能紊乱症，长期吃药未能见效。使用 505 一个月，不用药物便可入睡，10 多年的头痛再未犯过一次，长期消化功能低下的毛病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河北易县中学教师隗福平来信，说他患有胃溃疡、胃下垂 20 余年，头晕、头痛服药无效。带了 505 五天后，胃就不痛了，胃酸减少，食欲一天比一天增加，头晕头痛减轻，失眠现象没有了。精神充沛，他终于战胜了病魔，高兴极了，喊出 505 万岁！还用 10 张大红纸写出 505 神奇威力，张贴在大街小巷，投稿《保定日报》。

杨虎城将军部下 74 岁的郭安振来信，说他患有气管炎、哮喘，以致卧床不起，求医花了数万元。是 505 使他重新站了起来。他说毛主席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来厂长给了他第三次生命。

西北国棉一厂院长泰的来信，说他患晚期鼻咽癌，七窍出血，口

吐黄绿水，不能说话，眼睛睁不开，生命垂危。505 使他吃东西不再呕吐，睡觉正常，开始说话，行动自如了。

云南邹慎鍾是 90 岁的老太太，长期瘫痪，使用 505 重新站起来了。

上海×××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 17 种慢性病的离休老干部，使用 505 后身体大大好转了。

陕西刘××患有严重阳痿、肾虚，影响了夫妻感情。505 使他们夫妻言归于好了。

西北大学邹××患了痛经病，505 使她经期不再像过鬼门关那样了。

湖北罗律 1 岁多的女婴儿，时常腹泻、感冒发烧，505 使她体重增加，身体长高了。

……

难怪，三秦大地的、外省的、国外的、白色皮肤的、黑色皮肤的、黄色皮肤的人戴上它；国会的政治家、计算机旁的科学家、医学专家、学者、企业公司的老板、研究人员戴上它；从事写作的作家、记者、编辑和艺术家戴上它；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病的、无病的戴上它；城市的、农村的、有钱的、没钱的全都戴上它。擦开制服、西装、T 恤衫和土布褂，瞧，这不是中国年画上骑鲤鱼大胖娃娃的 505，就是光秃秃的前额、白生生胡须老寿星的 505。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会响起胖娃娃和老寿星的欢笑声。在这笑声中，一切因官衔、地位、权力、名声、贫富而产生的隔膜、偏见、矛盾、敌视和距离都消失了。人会潇洒，会因一种共同的追求而亲近融洽，品味到健康长寿的温馨。

1991 年 6 月来辉武在第 14 届世界发明家博览会上

难怪，仅两年的时间，505 畅销国内外，并荣获 36 项大奖。

1990 年 4 月，在北京首届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上获《神农杯》优秀奖；

1991 年 5 月，在法国巴黎第 82 届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获发明铜奖；

1991 年 6 月，在美国纽约第 14 届世界发明家博览会获发明家奖；

1991 年 11 月，在泰国曼谷获中国星火计划项目展示会金奖；

1992 年 1 月，在印度尼西亚获金奖。

1992 年 5 月，中国星火计划成果在墨西哥展出获金奖。

奖，铜奖、银奖、金奖、大奖 36 项奖。他珍惜它，那是社会对 505 和来辉武发明创造的尊重和认可。他把它，还有国家众多领导人的题词，都摆放在展览室里。他更喜欢的是“甘为良医，无私奉献”和“惠泽病家，为善最乐”两幅题词。把它挂在自己办公室里，天天能见到，抬头能看看。看着这两幅题词，他憨厚地笑了，笑声伴着厂歌格外动听：

505 元气袋，

神奇的功效，

华佗的气派，

造福全人类，

益寿情满怀。

朋友们！来来来，

用我们智慧的双手开创祖国医学新时代，

用我们无私奉献给人类送去温馨的爱。

# 湘江战役中的 白崇禧

· 黄汉星



五次反围剿后，红军长征来到湘江畔，蒋介石精心组织了30万兵力企图在湘江以东一举全歼红军，并吃掉桂系。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打破了蒋介石“一箭双雕”之计，又利用红军的指挥失误，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从而成功地保持了桂系的实力和地盘。

编者

1934年11月上旬，十万红军压境，仍温暖如春的南宁，人心惶惶，到处呈现出备战的气氛。

清晨，民团开始操练。一队由职员组成的民团常备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省政府大门出来，唱起了民团进行曲：

中国省份二十八，  
广西子弟最刚强！  
天生会打仗，  
……

在满城的操练声中，广西绥靖公署的客厅里，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在紧急磋商对策。

白崇禧身着戎装。他刚从湘桂边界视察回来。此刻，他正向李宗仁汇报桂林、平乐两区民团的组训和三线碉堡赶修的情况。最后，白崇禧向李宗仁：“德公，十万共军倾巢而来，南昌行营又心怀叵测，已关乎广西生死存亡，想德公必有定策了！”

“我连日和革命同志会以及参谋部的人谋划，他们的意见，最后可概括为两个字……”

“德公！”白崇禧一听说两个字，忍不住打断了李宗仁的话，“崇禧此次去桂北视察，也思考应敌方略，也想得两字，待我写出来，看看和大家意见如何？”说着，就在李宗仁办公桌上取出一张信笺，捉笔疾书。

李宗仁接过白崇禧那张信笺，然后打开抽屉，取出一张直行信笺，一起放在桌上。李、白二人低头一同观看时，只见白崇禧写的是“让路”，李宗仁写的是“送客”，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好，好！健生深思熟虑，既然大家意见相同，我决定，”李宗仁神色庄严，一字一板，“即以‘让路送客’作为我们应敌的指导纲领。请健生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统一贯彻。”

三天以后，李宗仁在自己的别墅宜园主持了桂系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刘斐、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副军长夏威等。

叶琪站在大幅军事地图之前，以棍指图：“共军目下主力已到郴

州、宜章地域。南昌行营判断，共军将沿萧克故道<sup>①</sup>，经兴安、全州间西窜。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决定，取捷径集中主力于黄沙河、零陵、东安地区，与两广部队协力包围，实现南昌行营歼灭共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之意图。现委员长已电令我军以主力部队速出道县以北，与追剿各军协同，严密防堵。”接着，白崇禧侃侃而谈：“共军倾巢西窜，目的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三是占领四川。我判断，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内部四分五裂，利于他们割据。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贵州山多，便于游击。第一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广西组织严密，立足不易。”

“当初萧克、王震所部到郴州地域后，是准备由零陵渡江的，由于湘军及时防堵，才改从湘江上游的广西境内渡江。现在，共军主力又

<sup>①</sup> 指以萧克为军团长的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1934年夏所经过的湘南桂北路线。



到郴州，南昌行营和追剿军总部准备将主力 15 个师集结于零陵至黄沙河一线，名义上说要和粤桂两军联合，围歼共军于湘水以东地区，实则是逼共军进广西，也是逼我们和共军主力决战。”

众将领点头称是。白崇禧表情激动：“南昌行营表面上将薛岳、周浑元 8 个整师划归追剿军总部指挥，实则另有企图！”他拿出叶琪手中的指示棍，直指地图：“薛岳向零陵前进，周浑元随湘军之后尾追，就是要监督湘军向前，和我们一起夹击共军！”

“广西搞自卫，主要靠民团，我们是寓兵于团。主力七军、十五军，总数才 3 万人。以 3 万人，抗击共军 10 万，弄不好就会被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那时中央军乘虚而入，广西就不堪设想。因此，在这次湘江战役中，我们不仅要反共，更要防蒋。防蒋还要超过反共。”白崇禧加重语气，“德公高瞻远瞩，确定我们的总方略是‘让路送客’，这四个字可说是字字千钧！这是应付当前时局，保全我们自己的最正确的指导方针！”

会议经过讨论，根据总的应敌方略，决定采取只能截击、追击，绝不堵击的方针；网开一面，让出桂北，确保桂东。

最后，李宗仁用平稳有力，不紧不慢的语气说道：“让路送客”，是我和健生最后商定的方略。从总体看，这是防御性质的，但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我们的目的是：既不能让共军在广西立足，要把祸水送出广西；又要防止将另一股祸水引来广西，让中央军侵占广西。为了及时掌握战机，我宣布：由白副总司令驻四集团军桂林行营，全权指挥！”李宗仁环视大家，“此役关系广西生死存亡，诸位身负军队、民团、政府之重责，必须服从指挥，同心协力，忠勇奋发，务必达到我们

既定的目标！”

全体起立：“遵命！”

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郴州地域时，中央红军总参谋部即已掌握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企图。对此，彭德怀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迫敌改变部署。中央则率主力迅速从零陵过江，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粉碎敌人的网堵。对这个调动敌人争取主动的重要建议，当时位居中央的领导人根本未予考虑，仍坚持一、九军团为左翼，三、八军团为右翼，五军团为后卫，军委一、二纵队居中，带着大批辎重，沿二军团路线，作搬家式的转移。从 1934 年 11 月中旬初占领郴州，至 11 月中旬末，部队只到达宁远、蓝山地域，而敌人则抓紧时机，进行合围部署，已对红军形成战略包围的态势。1934 年 11 月 19 日，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发出加速合围部署的电令。何键欣喜地说：“共军行进路线，无一出我预计，张罗以待，定可歼。”

和何键相反，白崇禧所思考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11 月 20 日，白崇禧通过长途专线，和李宗仁密商湘江撤防之计。

电话挂断后，白崇禧随之命令参谋长：“令电十五军将重武器及所有辎重立即转移龙虎关！步兵轻装，听候命令行动！”

桂军撤防，湘江空虚，正是红军安全通过龙虎关抢渡湘江的极好时机。可惜，当时红军并未掌握这一情报。11 月 23 日，红军渡过潇水后，令九军团南下道州，夺取江华。11 月 25 日，北起永安关，南迄三峰山，红军才分四路向湘江地区进军。湘江战役自此正式开始。

11 月 27 日下午，红军两个先头团占领了界首至屏山渡 30 公里

湘江的全部渡口和徒涉场。

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这一消息，对于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南昌行营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副总司令：南昌行营的电令，要求我军以主力沿湘江北上，与湘军共同夹击。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熟知白崇禧性格的叶琪进言道。“共军主力目前已经集结在四关之内，文市、水车至古岭头一线。永安关外只是后卫部队。”白崇禧斩钉截铁地说道：“立即令夏威师向新圩、文市攻击！同时，从平乐紧急车运韦云淞师至兴安，加强兴安的守备！”

“南昌行营的电文如何答复？”叶琪问。

“南昌行营要我打头，我偏打尾。我估计，从新圩、文市方向截击共军后续部队，绝不会冒共军大队回头增援的风险，而只会逼使共军快走。更重要的是可以守住湘桂边界，阻止中央军入桂。”

白崇禧命令桂军向新圩出击，确实给红军一个很大的威胁。原来新圩以北几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向湘江前进的必经之地。

为了掩护党中央和后续部队八个师安全通过，三军团五师的两个团被迫打阵地战，人员和装备又都处于劣势，战斗之艰苦，可想而知。激战一天，桂军伤亡数百人，只占领了红军前沿的几个山头。眼看中央军即将从永安关进入广西，白崇禧在桂林坐不住了，于当晚赶到恭城，责问夏威：“是什么部队阻击我们？为什么不能打垮他们？”

“是共军的主力，彭德怀的第五师。有不少广西兵，一部分中层官佐也是广西人，打得很顽强，死得很。我军占领的前沿山头，共军几乎都是战死的。”夏威回答惶恐。

“我们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又无须顾虑共军大队

的增援。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加派飞机支援你们。”白崇禧命令道，“把预备队全部用上，正面加强火力，轮番冲锋，同时以大兵力迂回侧后，使共军首尾不能相顾。务必打垮新圩共军，迅速前出至文市、古岭头一线！”

从11月29日开始，夏威按白崇禧的部署，对红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在桂军的疯狂进攻面前，红军逐个山头与敌争夺。又经一天浴血苦战，双方尸横遍野，红军以重大代价，掩护党中央和后续部队的大部通过了古岭头地域。当他们最后撤离阵地时，自师参谋长以下，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当桂军前进至古岭头，截断红军通道之时，有人建议红军立即丢掉坛坛罐罐，日夜兼程，迅速渡过湘江。可惜，这个建议未被当时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所接受，红军仍按常规行军，以至坐失时机，招致全盘被动。红军八军团和全军总后卫13师的西进通道即被桂军切断。久经沙场的13师处险不惊，以猛烈的火力，向古岭头桂军发起突击，全师冲过了古岭头。但随后跟进的八军团两个师，因是长征前才刚刚组建的新部队，缺乏战斗经验，只有一部冲过古岭头。

战况于当天晚上上报到桂林行营，白崇禧闻报甚喜。

“我判断，明天将是这次战役结束的一天。”白崇禧命令叶琪，“明日以会攻界首为目标，同时派飞机封锁渡口，轰炸渡河共军。总之，务必在湘军到达之前，占领界首和凤凰嘴。”

待叶琪将命令发出后，白崇禧即驱车前往兴安，坐镇指挥。

但是，出乎白崇禧的意料，对界首的会攻，一开始就遇到了红军的坚决抵抗。双方伤亡很重，桂军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中午，红军陆续撤离湘江渡口，

桂军随之占领界首和凤凰嘴，与南下的湘军在咸水会合。

白崇禧心满意足地对叶琪说道：“自南昌行营俭亥电下达后，现在，我们拿下了界首和凤凰嘴渡口，一切都好说话了。已到反驳南昌行营俭亥电时候了！”12月1日下午，刚从兴安返回桂林的白崇禧，踌躇满志地对叶琪说道。随即口授电文道：

“南昌委员长蒋、南宁总司令李、广州陈总司令、衡州何总司令：顷奉委座俭亥电，拜诵再三，慚悚交集。”

随之，白崇禧夸张地回顾了桂军在整个战役中的部署及新圩进击之经过，然后转入正题道：

“委座电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早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日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讥，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威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兵守河，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

白崇禧越说越激动，索性站立起来，在办公室来回走动：

“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共匪虽多，欲求安全通过桂境而不遭我军痛击者，无此理也。道程虽远，飞机不难侦察。周司令浑元所部，本日已入桂境，亦可令其实地调查。究竟何军与匪决战，战斗经过几日，共匪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便明真相矣！”

稍停片刻，白崇禧继续口授

道：

“至示以遵照云樵、恢先计划，速为亡羊补牢各节，当遵令执行。唯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貽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电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百倍，何至此与职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至此，白崇禧长长舒了一口气，自觉已将蒋介石驳得体无完肤了，乃作结论道：

“至于此后追剿，仍当竭尽全力，与匪周旋，功罪誉毁，不暇顾及也。白崇禧叩，东戌。”

叶琪禁不住喝采道：“痛快淋漓，真好文章！”随之命令机要员：“立即以特急电发出！”

蒋介石看到这个电文，直气得发昏章第十一，大骂“娘希匹”不止。最后，为要继续利用桂军追击红军、进行湘桂黔边战役，才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咽下这口恶气。12月7日复电李宗仁：“贵部与匪主力激战五日，具见官兵奋勇，深堪嘉慰。希与友军切取联络，努力穷追。特复。中正虞西①。”

此后，桂、蒋矛盾日益激化，互相明争暗斗，两年后的1936年，终于爆发了两广“六·一”事变，广西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为名，行公开反蒋之实，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后话。

（责任编辑：仲文）

（黄汉星：曾任桂林地委党史办主任，主编《红军长征过广西》丛书。）

① 虞西：7日17—19时。

來輝武教授真誠奉獻



# 505 神功系列 保健品

## 第二十五屆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首選醫療保健品

陝衛藥材字[1989]006號  
陝衛藥宣字[1992]4-028號



來輝武

●廠址：陝西省咸陽市505信箱（秦齊北路5號）  
●電話：215592 ●電掛：8286 ●郵碼：712000

●本廠北京經銷部：北池子二條5號院  
●電話：01-5122916 ●郵碼：100006

●上海聯絡處：南蘇州路185號  
●電話：5250560 ●郵碼：200002

●哈爾濱聯絡處：中山路益天賓館  
●電話：224001-557 ●郵碼：150001

●瀋陽聯絡處：和平區砂陽路19號  
●電話：560760-450 ●郵碼：110001

祛病強身505 內病外治神功袋  
國內國外首創 世界領先水平

505神功元氣袋是根據中醫傳統保健養生和內病外治理論，參考歷代保健醫方和經驗精心研製首創的產品，組方合理，具有平衡陰陽、調整氣血、通經活絡作用。經藥檢部門按質量標準檢測合格。基礎研究與臨床觀察較系統。經陝西、山東及北京三個中醫藥醫藥研究單位臨床觀察一千二百零五例，表明對消化系統多種病症如胃院痛、胃炎、慢性腸瀉等療效突出。對婦科月經不調特別是痛經有良好的保健治療效果，對腰肌勞損、呼吸、心血管、神經、精神、泌尿等系統及兒科部分慢性病症也有較好的作用。對中老年虛損衰弱和多系統慢性病症的常見症狀有較好療效。安全、無毒副作用，無致敏和皮膚刺激作用。

本綜合性研究成果處於同類項目研究的國內外領先水平。



榮獲 英國明治世界發明家獎 法國巴黎發明家獎 倫敦世界發明家獎  
中國醫藥發明家獎 中國醫藥發明家獎 中國醫藥發明家獎 中國醫藥發明家獎

### 中國咸陽保健品廠榮譽出品

統一刊号：CN11-2817 定價：2.98元